

# 為了活下去

IN ORDER TO LIVE

★  
脫北女孩朴研美

A North Korean Girl's Journey  
to Freedom

Yoonmi Park 朴研美著 謝佩奴譯

mark

一個長於北韓黑市世代的女孩，  
歷經苦難終於逃離家鄉，卻在人口販子的掌控下，度過兩年生不如死的歲月。  
她的故事是一則活下去的故事。

吳曉樂 作家、阿盈 文字工作者、苗博雅 社會民主黨全國委員 不吝背推薦

更多电子书免费下载就在[www.aiyadu.com](http://www.aiyadu.com)



## mark

這個系列標記的是一些人、一些事件與活動。

---

---

**mark 118**

为了活下去：  
脱北女孩朴研美

作者：朴研美（Yeonmi Park）

译者：谢佩姣

责任编辑：潘乃慧

封面设计：三人制创

校对：吕佳真

出版者：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全理法律事务所董安丹律师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In Order To Live by Yeonmi Pa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Ltd, London

Text copyright © Yeonmi Park 2015

Photographs courtesy of Yeonmi Park

Map illustration by John Gilkes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Books Ltd, London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初版一刷：2016年8月

---

# 為了活下去

IN ORDER TO LIVE



脫北女孩朴研美

A North Korean Girl's Journey  
to Freedom

Yeouni Park 朴研美 著 謝軍蛟 譯

## 推荐序一

# 在黑暗的隧道里看到微光

阿泼

在见到真正的脱北者之前，我读了不少朝鲜相关的书，几乎如出一辙地，会谈论金氏领导人的权威，谈到洗脑教育，谈到饥饿，谈到各种不堪，还有逃亡。或许因为如此，当那个清瘦束着头发的女孩说着自己的故事时，我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知道她简短的谈话里会出现的词汇、句子，也约莫猜得到逃亡路线：进中国，往中南半岛逃，再到南韩。在这种南朝鲜交界区旅行，脱北者的故事分享与朝鲜罪恶的介绍影片，绝对是套装行程之一，短短十分钟，满足大家猎奇的眼光。

独独有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这个女孩再三强调：不要拍照，拍了也不要上传网络。她不希望自己朝鲜的亲人遭殃。这短短的警告证明，脱北者在自由地区所做的指控与分享，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那些脱北者的故事或出版，大都隐其名，才能放心说出那些血泪经验。我突然有些愧疚，因为了解到，听这些读这些故事，其实很奢侈。

《为了活下去》作者朴研美或许是极少数愿意以真名，且站在福斯面前诉说经历的人。逃到南韩后，为了寻找姐姐，她上了电视，而后，到国外演讲分享，被朝鲜当局视为眼中钉，公开抨击她，并对付她在朝鲜的亲人。但朴研美无所畏惧。

我不免注意到，这个女孩非常年轻，一九九三年出生，换句话说，她出生在冷战结束，苏联抽手对朝鲜援助的饥荒时期。然而，饥饿虽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痛苦，跟其他脱北者或朝鲜书籍相比却非全部。因为她的父亲游走中、朝边境走私，在一个将资本主义视作敌人的社会，

朴研美的父亲却轻巧操作商业手段——一直到他被逮捕。因此，我们可以从作者在朝鲜的童年，看见一个除了谈论政权社会以外的人的生活、父亲外遇、夫妻吵架、初恋，甚至如何在封闭的环境中收看南韩影剧、偷听南韩流行音乐……除了政治，我们跟随著作者的诉说，理解了朝鲜的生活样貌与历史。

作者父亲游走边界这部分的描述很精采，而作者与母亲逃到中国，在东北生活的篇章更是吸引人——容我省略一个十三岁小女孩逃离朝鲜，必须经历过什么磨难，并承受哪些痛苦——我曾经在中国东北的延边旅行，这里是朝鲜自治州，多的是不同时期来的朝鲜族，亦有脱北者。《为了活下去》一开头，作者提到中国这边做饭的香气都会飘到对岸，让我想起在图们时，也看见朝鲜人从河的那头看着中国这边的热闹。这样一个地方，会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何种交易，产生什么经济活动，是否有自己的派系秩序，都让人好奇。逃到东北的朴研美，就进入了这种黑暗的、地下的、不可明说的经济活动里，又因为她逃离的时间，刚好是北京奥运时期，边境有不同的管制方法，也就造成不同的结局。这本书像是呈现某种不可碰触的田野资料，带我们看到不能看见的底层暗里。

我曾听中国朋友提过，脱北者要是被捉到，会将铁丝穿过他们的肩膀，再把他们送回去。我以为这是个以讹传讹的恐吓之词，不料，真的在这本书里看见。

逃出朝鲜，逃离中国，再转往南韩的过程不必多说，值得一提的是，脱北者在南韩社会的适应问题与生存困境，虽然也屡屡被提起，但作者以另外一种典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或许能提供不同的参考。

这本书是由作者与另一英文写作者共同合作完成，很难说有什么文

学技巧或韵味可言，文句如同许多第一人称叙述一般直白无奇，但有时候生命本身就是文学，不需要花俏点缀，像是第一章，母亲对作者说：“就算你以为旁边没人，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她以自身经验警告作者不要乱说话，那会替自己酿祸。诸如此类的话语或词句，偶尔在故事里出现，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看到微光，沉重感也少了些。

（《介入的旁观者》作者）



## 推荐文二

# 里头的每颗字砖，都入过荒境，也得过侥幸

吴晓乐

脱北者的故事，过去不只朴研美的，未来也会有愈来愈多的脱北者，加入这个主题的书写。而他们所看见的真实故事与观点，也许和朴研美并无二致，也可能会南辕北辙。在同一个情境之中，因为不同的位置，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证。他们很可能分享共同的伤痛，却也有各自殊异的幸福。是以，在走进这道风景之前，也许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位脱北者的故事，除此之外，这更是朴研美的故事。

研美字里行间都留下了“情非得已”的处世哲学。为了换取一家四口的温饱，研美的父亲铤而走险从事国家严禁的买卖行为，最终被朝鲜政府查获入狱，成了研美伯伯眼中“为家族带来麻烦跟耻辱”的存在。研美的姐姐恩美找上陌生的门路，只求在鸭绿江的彼岸谱写新的人生剧本。至于研美，她和母亲为了找寻下落不明的恩美，只得诚惶诚恐地走上恩美可能行过的路。每个行为，都是选择，更是生存之道。

常言道，自我决定，自我负责。是以，若想逃离一个欠缺自由的国度，而在边界附近遭到击毙；或是从事不见容于共产政权的贸易行为，因而连累了宗族长幼——当下，最直观的了解往往是，既然有所选择，自然要为这些决定付出代价。但若把视角逐渐抽离，又不免要困惑，上述所称，背后必然有个加强的缺省是，对自己的人生，我们真的能够有所选择。问题是，谁能狂妄地言称，时时刻刻，日子均都属于自己。

研美的故事，俯十皆是这般“半点不由人”的无奈。她那么直接地刻

画出，那些日子不属于个体的时刻，人类要如何为了生活，被逼得做出选择。

例如研美与弘伟的关系，虽有金钱与性的输送，却也有患难中的相濡以沫。弘伟生在中国东北，营生的方法是将朝鲜女子卖入中国农村人家。遇见研美之后，弘伟偶有暴行，但在一些场景中，又见到他是如何在人生的窄缝中，竭力要给研美撑出一个喘息的空间。

研美的文字清晰地照见了，那些交织在个人与大时代之间，种种的情非得已。这里的情，可以指为情境，也不妨说是情感。正因整个大环境均非单薄人意所能预料，因此，跟随而来的情感与所有人间诸事，自愿非自愿，也陷入无法分说的失语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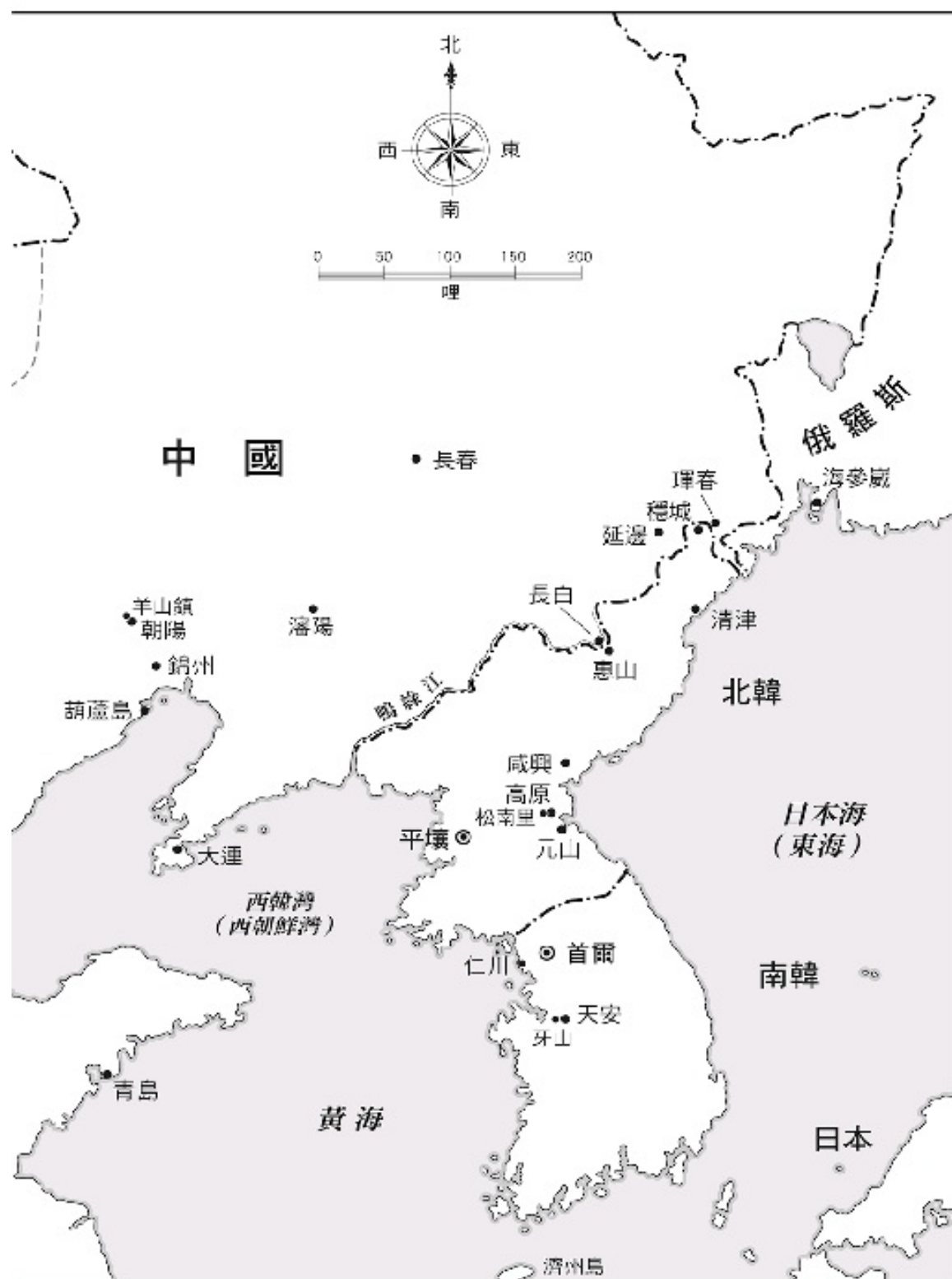
对我而言，好的书写一定要起到干扰与骚乱的作用，让读者难以安逸于一个观点上，不得不思考每一人事的必然与偶然。研美的文字即做到了这点，她不停地抽换位置与场景，要我们眼睁睁看着价值快速的流变。读者才刚信服于一个人的恶，又在下一秒钟目睹了他的义行；反之亦然，那些我们以为即将要伸出援手的人物，也在细微处表达了他们的冷目。此回书写是研美的初试啼声，她却并没有回避掉“复杂性”的挑战，而是直面处理，让断简残编归于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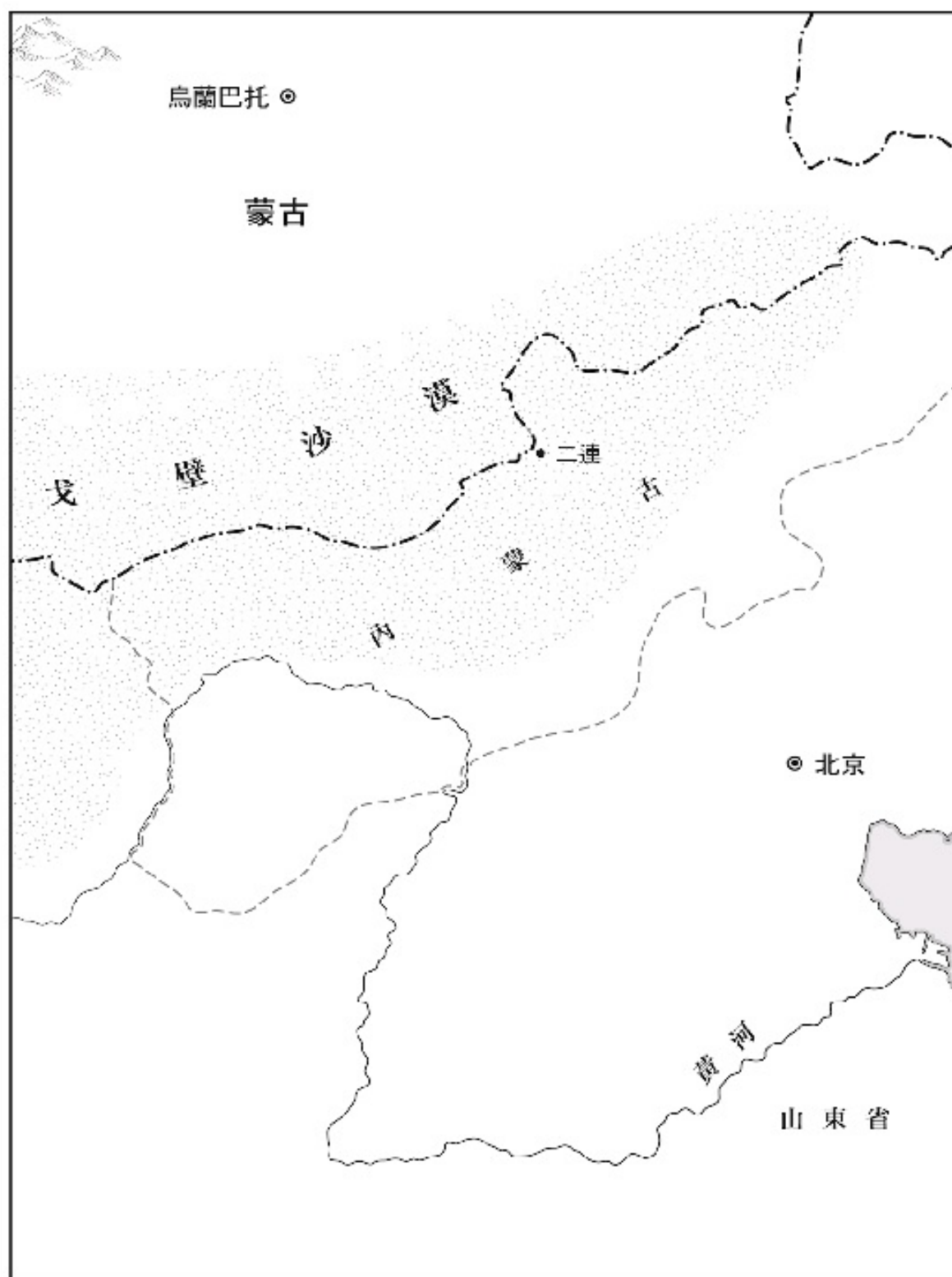
最后，若要向研美的叙事致上最基本的敬重，请容我拒绝指称这是一个深具启发性的故事。如同历史学家亚历山卓·瑞瓦斯基（Aleksandr Revalskiy）在无数个夜里审视祖国历史，包括俄国入侵车臣与车诺比核爆，只能发出喟叹：“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许这就像是生了一场小病一样，足以使人免疫他人的过错。”从研美的人生中挖掘出意义或价值，好让自己得到慰藉，让现世更趋于安稳，或许是人类一种难以免疫的反射动作。但我更想呼告的是，不要在金苹果落下时，疏忽

于以银网子承接。这本书的问世，最珍贵的部分无非在于指引我们看见，在惚D得已之中，一个人要怎么活，他还能怎么活。

对于研美以及其他，甚至无法活到能把自己故事写下来的脱北者而言，脱北不仅仅是一个议题，而是每日睁开眼睛，他们都得与人生进行的讨价还价。阖上这本书时，请小心轻放。里头的每颗字砖，都入过荒境，也得过侥幸，终于来至你的跟前。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作者）





献给我的家人

以及在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斗士

# 目录

推荐序一：在黑暗的隧道里看到微光 / 阿泼

推荐文二：里头的每颗字砖，都入过荒境，也得过侥幸 /

吴晓乐

前言

## 第一部 朝鲜

1 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

2 危险的历史

3 燕配燕，雀配雀

4 斑斑血泪

5 敬爱的领袖

6 梦中的城市

7 最漆黑的夜晚

8 朝鲜之歌

9 黑市世代

10 中国的灯火

11 姐姐失踪

## 第二部 中国

12 黑暗的彼岸

13 与魔鬼交易

14生日礼物

15骨灰

16绑架

17天上掉下来的面包

18跟随星星的指引

## 第三部 南韩

19自由之鸟

20美梦与噩梦

21求知若渴

22上电视

23奇异恩典

24回家

志谢



我们靠着说故事活下来。

——琼·蒂蒂安（Joan Didion）

## 前言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我跟我妈在漆黑的寒夜中跌跌撞撞爬下鸭绿江的冰冻河岸。鸭绿江是朝鲜和中国之间的界河，沿岸陡峭多石，我们上下都有巡逻员，两边一百码外也有岗哨，在里头站岗的卫兵只要看到有人偷偷越境，就会毫不留情开枪。没人知道过了河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为了活命，大家都想尽办法要逃到中国。

当时我才十三岁，体重不到三十公斤，家住在位于朝鲜和中国边境的惠山市。一个礼拜前，我才因为肠道感染入院，医生却误诊成盲肠炎，帮我割了盲肠。因为伤口还很痛，我连走路都很吃力。

带我们越境的朝鲜掮客坚持当晚就得动身。他买通了几名守卫，要他们放水，但他不可能收买这一带所有的守卫，所以我们得非常小心才行。我摸黑跟在他后面，因为走不稳，只好用屁股滑下河岸，结果碎石也跟着我噼哩啪啦砸下来。他转头瞪我，低声叫我小声一点，可惜太迟了，只见一名朝鲜士兵的黑色身影从河床爬上来。如果对方是被收买的边境卫兵之一，他大概没认出我们。

“回去！”士兵对我们大吼：“快滚！”

我们的带路人爬下去跟他交涉，只听到他们交头接耳的声音。带路人单独走回来。

“我们走！”他说：“快！”

时值初春，天气渐暖，冻结的河面一片片融化，但我们走的这段河流又陡又窄，白天晒不到太阳，所以还够坚硬，撑得住我们的重量。但愿如此！带路人拨了通电话给另一边（中国方面）的人，然后悄声对我

们说：“跑！”

带路人开始往前跑，但我已经吓到全身发软，两腿不听使唤，两手抓着妈妈不放。带路人只好跑回来，一把抓起我的手，拖着我横越结冰的河面。走到坚硬的地面之后，我们开始拼命往前跑，直到看不见卫兵才停下来。

河岸黑漆漆的，但中国长白市的灯光在我们眼前闪烁。我转过头，匆匆再看一眼我出生的地方。那里一如往常又停电了，放眼望去只见漆黑死寂的地平线。走到空旷平原上的一间简陋小屋时，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

逃离朝鲜时，我没有幻想会得到自由，甚至不知道“自由”代表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一家人如果继续留在朝鲜很可能没命，不是饿死，就是病死，要不就是在劳改营里受虐而死。饥饿已经超出可以忍受的程度，只要有一碗饭吃，要我冒生命危险，我也愿意。

然而，除了想活命，我们逃出朝鲜还有别的目的。我跟我妈一直在寻找我姐姐恩美（Eunmi，编按：此书中作者亲友的名字皆是音译）的下落。她比我们早几天逃到中国，但之后音讯全无。我们希望她会在河的对岸等我们，可是来接我们的只有一个秃头中年男子，他跟住在中韩边界城镇的许多人一样，都有朝鲜血统。他跟我妈说了几句话，就带她绕到小屋后面，我在屋前听到我妈向他苦苦哀求：“不要！不要！”

我感觉大事不好了。我们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说不定比我们逃离的地方还要可怕。

这辈子我最感激两件事：一是我出生在朝鲜，二是我逃出了朝鲜。这两件事造就了现在的我，谁要拿平凡安稳的一生跟我交换，我都不

要。然而，我的人生故事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复杂曲折。

我跟数以万计的朝鲜人一样，逃离了家乡，在南韩定居。南韩仍将我们视为公民，仿佛封锁边界和将近七十年的紧张冲突，从未将南、朝鲜分开。南、朝鲜人有相同的血缘，说着相同的语言，只不过朝鲜没有“大卖场”、“自由”，甚至“爱”这类字眼，至少不是世上其他地方理解的“爱”。我们唯一能表达的“爱”，就是对统治朝鲜三代的金氏王朝的敬爱。金氏政权封锁了外界所有的消息，还有电视、电影跟广播讯号。朝鲜没有网际网络，没有维基百科。市面上所有的书，都在宣扬我们国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即使朝鲜人至少有一半属于赤贫阶级，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朝鲜政府甚至不称自己是朝鲜，而是朝鲜。而朝鲜才是真正的韩国，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乐土，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二千五百万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服务。逃出朝鲜的人很多都自称是“脱北者”，因为拒绝接受自己的使命、为领袖奉献生命的同时，我们就抛下了自己的责任。朝鲜当局称我们为“叛国贼”，要是我设法回国，就会被抓去枪毙。

朝鲜政府不只对内封锁消息，对外也一样。政府禁止国内人民接触国外媒体，也不让外国人得知朝鲜的真相。朝鲜之所以有“隐士王国”之称其来有自，因为朝鲜政府极力保持神秘，不让外界得知国内的情况。唯有我们这些逃出朝鲜的人，才能说出封锁国界背后的真相。然而，我们的故事在不久之前仍然鲜为人知。

我在二〇〇九年的春天抵达南韩。那年我十五岁，身无分文，教育程度相当于只有小学二年级。五年后我进了首尔顶尖的大学就读大二，主修警察行政，日渐意识到我出生的地方迫切需要司法正义。

我在许多论坛上谈过我逃出朝鲜的经过，描述人口贩子如何把我们

母女骗到中国，而我妈为了不让看上我的掮客欺负我，牺牲了自己。到了中国，我们就开始寻找姐姐的下落，但还是毫无所获。后来我爸也逃到中国，跟我们一起找，但几个月后，他没接受治疗就罹癌过世了。二〇〇九年，基督教传教士救了我们，带我们到蒙古与中国的边界。在某个永无止境的冬夜，我们从那里徒步横越冰天雪地的戈壁沙漠，跟随着星星的指引，迈向自由。

这些事确实发生过，却非事件的全貌。

从横越鸭绿江逃到中国，到抵达南韩展开新生活的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本书面世前，只有我母亲知道。这段往事，我几乎从没跟其他脱北者和我在南韩认识的人权斗士提起。我总认为，只要不承认这段不堪的过往，它就会自动从记忆中消失。我说服自己，很多事根本没发生，甚至教会自己遗忘这些事。

然而，开始写这本书之后我发现，少了完整的真相，我的生命就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意义。在我母亲的帮助下，过去在朝鲜和中国的记忆像一幕幕遗忘已久的噩梦场景，重回我的脑海。有些场景清晰得吓人，有些却模糊不清，或像一副乱七八糟、散落一地的纸牌。写作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回忆的过程，也是设法厘清这些回忆、赋予它们意义的过程。

除了写作，阅读也帮助我整理我所认知的世界。抵达南韩之后，一有机会接触世界经典名著的译本，我就开始大量阅读这些书，后来也渐渐能直接阅读英文书。动笔写作后，我偶然读到作家琼·蒂蒂安的一句名言：“我们靠着说故事活下来。”即使我们两人的文化背景悬殊，这句话却敲醒了我，在我脑中回荡不已。我想通了。有时候，唯一能走出回忆的方式，就是把回忆变成故事，重新理解那些难以言说的事件对我们

的意义。

在迈向自由的旅途中，我看过人性的险恶，但也亲眼目睹人在悲惨境遇中相互扶持，甚至牺牲自己的人性的美善。我知道人为了活命，有可能丧失一部分的人性，但我也知道，人性的光辉永远不会熄灭，只要得到自由的氧气和爱的力量，就能再度点燃。

为了活下去，我做过各种选择，这本书就是我的种种选择串成的故事。

# 第一部 朝鲜

# 1 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

鸭绿江就像一条巨龙的尾巴，夹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迤迤流入黄海。惠山市这边的鸭绿江流向白头山（亦即中国的长白山）的山谷，这座二十万人的城市就散落在高低起伏的山丘，以及遍布原野、树林和墓地的高原之间。鸭绿江通常水浅又平缓，入冬就会结冰。我们这里也是朝鲜最冷的地区，大半年都是冬天，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四十度，身体要够强壮才活得下来。

对我来说，惠山就是我的家。

河对岸是中国长白市，那里的很多居民都有朝鲜血统，边境两边的人家交易往来已经有好几代。小时候，我常站在黑暗中遥望对岸长白市的灯火，好奇家乡以外的人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每逢节日或中国农历新年，看见五颜六色的烟火在黑丝绒般的夜空中齐放，我们都觉得好刺激。我们这边从来没有那一类的活动。有时候我走去河边提水，如果风刚好往这里吹，我甚至闻得到河对岸人家的厨房飘出的饭菜、油面和水饺香。风也会把在对岸玩耍的中国小孩的声音传送过来。

“喂，你们在那边会饿吗？”对岸的小男生用朝鲜语对我喊。

“才不会！闭嘴，中国胖子！”我对着他们喊回去。

不会才怪。其实我好饿，但说出来也没用。

我太早来到这世上。

我的母亲才怀胎七个月，就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生下我。我出生



时不到一千四百克。惠山医院的医生告诉她，我实在太小了，“活不活得下来很难说”，医院也爱莫能助，只能看我自己的造化。

我母亲不管帮我裹多少条毯子，都没办法让我的身体暖和起来。于是她把石头烤过再放进毯子里为我保暖，我才总算撑过来。几天后，我爸妈就把我抱回家照顾。

我姐姐恩美大我两岁，所以这次我爸一直盼望是个男孩。朝鲜是父权社会，负责传宗接代的是男性。爸爸虽然有点失望，但很快就释怀了。通常跟小孩最亲的是妈妈，我哭的时候却是我爸才知道怎么哄我。在爸爸的怀里，我才觉得受到保护和疼爱。不过，无论我爸还是我妈，从小都教我要以自己为荣。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山坡上的一间平房里，山坡下的铁轨像生锈的脊椎贯穿这座城市。

我们住的房子又小又冷，跟邻居只有一墙之隔，所以隔壁任何声响我们都听得到，晚上还会听见老鼠在天花板吱吱叫、东奔西窜。但那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因为我们全家都在一起。

漆黑和寒冷是我对这世界最初的记忆。漫长的冬天，家里最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小壁炉，烧着木柴、煤炭或我们找得到的任何东西。我们在炉火上烧饭，水泥地板下安装了管线，可以把烟输送到房子另一边的木头烟囱。传统的暖气系统应该能让屋里保持温暖才对，但终究敌不过冰冷的夜晚。睡觉前，我妈会在壁炉旁边铺一张厚毛毯，全家人都钻进毯子里，我妈第一个，再来是我、我姐，我爸最后，所以他离壁炉最远，也最冷。太阳下山之后，四周就暗到什么也看不见。在这里，一连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没电都很正常，再加上蜡烛又贵，所以我们都摸黑玩

游戏，有时连在被子里我们都能闹着玩。

“这谁脚？”我妈会边问边用脚趾戳。

“我的，我的！”恩美兴奋地喊。

到了冬天，无论早晚，惠山市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烟，甚至夏天也是。我们这个街坊很小，很有人情味，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只要看到哪家的烟囱没冒烟，我们就会去敲那家的门，问问有什么状况。

夹在两边住屋中间的小路没铺柏油，窄到无法行车，不过反正这里的车很少，所以也无所谓。附近的人到哪都靠两条腿，少数负担得起的人会骑脚踏车或摩托车。下过雨后，马路变得滑泞不堪，街坊小孩最爱在这时候玩抓人的游戏。可是我的个子比同年龄的小孩小，动作也比较慢，每次都追不上他们，很难融入大家。

我开始上学之后，有时恩美为了保护我，还会跟大一点的小孩打架。她个子也不高，但很聪明伶俐，既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的保镖。下雪时，她会背着我爬上附近的山坡，然后把我放在腿上，双手抱着我。我紧紧抓住她，跟着她边叫边笑用屁股滑下山坡。只要能跟她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

夏天的时候，所有小孩都会跳进鸭绿江里玩水，但我从没学过游泳，只能坐在岸上看其他小孩往波涛中泅泳。有时，我姐姐或我最好的朋友莹子（Yong Ja）看我一个人，就会带些她们在河底找到的漂亮石头给我。有时，她们会一人一边拉着我去浅滩泡水，再把我带回岸上。

莹子跟我同年，我们住在同一区。我喜欢跟她作伴，因为我们都很会发挥想像力打造自己的玩具。虽然在市场上买得到一些工厂制造的洋娃娃和其他玩具，但通常都很贵。所以我们就自己用泥巴捏碗盘和动物，甚至还有迷你坦克车。朝鲜国产的军事玩具都很大型，但我们女生

迷的是纸娃娃，可以花好几个钟头用厚纸板剪娃娃，再用剩下的纸做娃娃的衣服和围巾。

我妈有时会做纸风车给我们。我们把纸风车插在铁轨上方、我们称为“云桥”的人行铁桥。过了几年，生活变得更辛苦也更复杂之后，我走过那座桥时会想，当初看着那些风车迎风转动的我们有多快乐。

小时候在家乡，我听不到在南韩或美国会听到的轰轰机械声，也听不到垃圾车的运转声、车子喇叭声，或到处在响的电话声。我听到的都是人发出的声音，例如女人洗碗的声音、妈妈叫小孩的声音、一家人吃饭时碗筷铿锵碰撞的声音。有时，我会听到朋友挨爸妈的骂。那个年代，没有震耳的背景音乐在放送，大家的眼睛也不会黏着智慧型手机不放，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那是在如今居住的现代社会里很难找到的东西。

在惠山市的家里，我们的水管一年到头几乎都是干的，所以我母亲通常得把衣服搬到河边去洗，洗完再搬回来放在温暖的地板上晾干。

因为街坊很少有电，每次电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心得拍手叫好，大声唱歌，即使是大半夜也会爬起来庆祝一番。当你拥有的那么少，一件小小的东西都会让你开心到飞起来。这是朝鲜特有的生活中，少数让我怀念的地方。电当然不会来很久，每次电灯一晃、电又断掉的时候，大家只会说“好吧”，然后认命地回去睡觉。

即使有电，电力也很弱，所以很多家庭都自备升压器，帮助家里的电器转动，但这种升压器经常会烧起来。三月的某天晚上，我爸妈不在家，我们家的升压器就烧了起来。当时我还是个小宝宝，只记得自己醒过来就哇哇大哭，有个人抱着我穿过浓烟和火光。我不知道救我的人

姐姐还是邻居。有人跑去通知我母亲，她慌慌张张跑回来，但我跟我姐已经安全地逃到了邻居家。我们的房子付之一炬，但爸爸很快地靠着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

后来，我们在小院子里辟了一块菜园。我妈跟我姐都对园艺没兴趣，但我跟爸爸都很爱莳花弄草。我们在里头种了南瓜、包心菜、小黄瓜和向日葵。爸爸还在篱笆周围种了漂亮的吊钟花，我们都叫它“耳坠子”。我喜欢把那种长长的娇嫩花朵挂在耳朵上，假装戴了耳环。我妈问我爸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土地种花，但他每次都当耳边风。

朝鲜人跟大自然很亲近，自然而然发展出一套预测天气的技能。我们没有网络，加上电力不足，通常看不到政府在电视上播放的气象报告，所以只好自己想办法。

在漫长的夏天夜晚，左邻右舍都会坐在家门外乘凉。没有椅子，大家就坐在地上看夜空。如果星星满天，就会有人说：“明天会是好天气。”其他人都会喃喃附和。如果星星不多也不少，就会有人说：“看来明天是阴天。”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气象预报。

每个月最棒的一天就是面食日。这天我妈会到镇上买机器压的生面条回来。我们把买回来的面条摊开放在厨房温暖的地板上烘干，这样才能放久一点。对我和姐姐来说，这天就像在过节，因为我们会趁面还软软甜甜的时候偷拿几条来吃。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代中的朝鲜大饥荒还没重挫家乡之前，朋友都会在这天来我们家一起吃面。在朝鲜，什么东西都应该互相分享。但后来，我们家和国家的状况愈来愈糟，我妈就叫我们把其他小孩赶走，因为家里的东西不够拿来分给别人了。

日子好过时，家里的一餐有饭、泡菜、豆子和海带汤，但生活拮据

时，这些东西都吃不起。有时我们会直接跳过一餐，大部分时间只能吃很稀的小麦或大麦粥，或是豆子，甚至把发黑的冷冻土豆磨成粉，塞进高丽菜馅做成饼。

我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朝鲜，跟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爸妈儿时看到的朝鲜很不一样。他们年轻时，人民的生活基本需求都由国家照顾，食、衣、医疗都是。冷战结束后，过去支持朝鲜政权的共产国家一个个转向，由国家掌控的朝鲜经济快速崩溃，朝鲜人突然间变得孤立无援。

那时我年纪还太小，不懂一九九〇年代为了适应国家遭逢的巨变之际，大人的世界陷入什么样的窘境。我跟姐姐睡着之后，爸妈有时会因为烦恼该怎么做才不会让全家人饿死，而担心得睡不着觉。

我很快就学会一件事：不管偷听到什么都不能说出去。大人教我不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质疑任何事，只要照政府教我的去说话、做事、思考就对了。我甚至相信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能看穿我的心，我脑子里的坏思想会害我受到惩罚。就算他听不到，到处都有眼线在窗口偷听或在学校操场监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班”（邻里监督单位）的一员，听到不当言论都要通报。大家活在恐惧之中，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祸从口出”的亲身经验，包括我母亲。

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金日成逝世时，当时我才九个月大。朝鲜人把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伟大领袖”当神一样崇拜。他铁腕统治朝鲜长达近五十年，虔诚信徒（包括我母亲）还以为他会长生不死，他的过世引发人民强烈的悲痛，也在国内引起不安。他的儿子金正日虽然已经被选为接班人，金日成过世留下的巨大空缺，还是让所有人紧张不安。

国丧期间，我母亲背着我到惠山市区有如广场的金日成铜像前，跟



每天涌入的成千上万名群众一起为陨落的领袖痛哭哀号。哀悼者在铜像前留下花束和一杯杯米酒，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和悼念。

那段时间，爸爸有个亲戚从中国东北（那里很多居民都有朝鲜血统）来看我们。他是外国人，所以不像我们把“伟大的领袖”当作神一样崇拜。某天我母亲哀悼回来，永树（Yong Soo）叔叔说他刚听到一则传闻。平壤政府宣称金日成死于心脏病发，但叔叔说他听朋友讲，有个朝鲜军官告诉他才不是那么一回事，领袖真正的死因其实是“火病”。这种常见的病，无论在南朝鲜都是指“精神或情绪压力造成的疾病”。叔叔还说，金日成有意与南韩展开对话，儿子却与他意见相左……

“不要说了！”我妈阻止他：“什么都别再说了！”她很难过，叔叔竟然敢散播金氏政权的谣言，逼得她不得不对客人无礼，叫他闭嘴。

隔天她和好姐妹又去悼念领袖。献上花束时，她们发现有些祭品遭人破坏。

“世界上就是这么可恶的人！”她的好姐妹说。

“没错！”我妈接着说：“你绝对不敢相信敌人散播的恶毒谣言。”于是她把昨天听到的谎言告诉好姐妹。

隔天她走在云桥上时，看见有辆貌似公务机关的车停在我们家底下的巷子里，车子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她立刻知道大事不好了。

那群人是人人害怕的保卫部便衣探员。保卫部就是朝鲜的国家安全局，掌管国内的政治犯集中营，并负责调查危害政权的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只要把你带走，你就会从世上消失。更要命的是，这些人不是本地人，而是总部派来的。

一名资深探员在门口见到我母亲，就把她带进邻居家（他借来充当讯问室）。两个人坐下来，他看着她，眼睛有如黑色玻璃。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他问。

“知道。”我母亲说。

“所以你是从哪里听到的？”他又问。

我妈说她是从爸爸的中国亲戚那里听来的，亲戚则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

“这种谣言太可恶了！”她发自内心地说：“那是敌人散播的谎言，故意要摧毁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你认为自己哪里做错了？”他冷冷地问。

“长官，我应该去跟党组织通报，不该只跟一个人说。”

“你错了。”他说：“你一开始就不该把这些话说出口。”

我妈心想这下她死定了。她一直赔罪，哀求对方可怜她还有两个小孩，饶她一命。我们韩国人会说，她摩擦双掌，一直哀求，磨到两只手都快破皮了。

最后，对方用教人冷到骨子里的狠厉声音说：“不准你再提起这件事，连朋友、丈夫、小孩都不例外。如果再提起，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之后他也质问了永树叔叔。妈被质问时，叔叔心惊胆战地跟我们在家里等候。我母亲认为那次她能逃过惩罚，都是因为叔叔向探员证实，我妈听到他说的谣言时有多么生气。

质问结束后，探员开车离去，我叔叔也返回中国。后来爸爸问妈妈秘密警察找她有什么事，她说她不能说，从此没再提起。我爸一直到死，都不知道那次我们家差点大祸临头。

多年后，我母亲才告诉我这段往事。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她送我去上学时从不说“路上小心”或“当心陌生人”，反而总是提醒我“管好你的嘴巴”。

在大多数国家，妈妈都会鼓励小孩踊跃发问，朝鲜却是例外。我懂事之后，母亲就警告我说话要小心。“要记得，研美，”她轻声对我说：“就算你以为旁边没人，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妈妈不是要故意吓我，我却感觉有股巨大的恐惧和阴霾将我笼罩。



## 2 危险的历史

我想我爸如果在南韩或美国长大，一定会变成大富翁。然而他出生在朝鲜，家族背景和忠党爱国就是一切，努力工作也没用，只会让你有更多工作要做，让你不断为了存活而奋力挣扎。

一九六二年三月四日，我父亲朴津识（Park Jin Sik）出生于朝鲜的工业大城咸兴市。来自军人家族，家里又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照理说他应该很具优势，因为在朝鲜，你能得到的机会都由“出身成分”决定。二次大战后金日成即位，彻底推翻了把人民分为地主和农民、贵族和平民、僧侣和学者的传统封建制度。他下令对全民展开背景调查，彻查个人家谱。在“出身成分”制度下，全国人民依其对政权的效忠程度分为三大类。

地位最高的是受人尊敬的革命分子组成的“核心”阶层，包括农民、老兵、为朝鲜打仗或捐躯的军人的家属，以及拥护金氏家族并协助其巩固权力的效忠者。地位第二高的是“基本”或“动摇”阶层，包括曾住在南韩或在南韩有家庭的人、前商人、知识分子，以及尚未确定是否彻底效忠新政权的人。地位最低的是“敌对”阶层，包括前地主及其后裔、资本家、前南韩士兵、基督徒和其他教徒、政治犯家属，以及所有与国家为敌的人。

要爬上更高一层比登天还难，但因为莫须有罪名被打下最低阶层却是轻而易举。从我父亲他家的例子即可印证，一旦丧失了原来的地位，所有附加的好处也会跟着消失。

我爷爷朴章奎（Park Chang Gyu）从小在惠山郊外的农村长大，当时韩国仍是日本的殖民地。

韩民族四千多年来都一脉相传，但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个韩国。据传，早在西元前二三三三年就有一个名为“朝鲜”的王国，意思就是“晨曦之国”。这名字虽然抚慰人心，我的国家却少有太平之日。朝鲜半岛位在几个帝国的交叉口上，几世纪以来得抵抗满洲、蒙古，甚至更远的外侮。二十世纪早期，日渐扩张的日本帝国利用武力和条约，一点一点将韩国并吞，最后在一九一〇年占领整个韩国。两年后，朝鲜的第一位领导人金日成出生；十一年后，我的爷爷出生。

日本人在韩国实行暴虐统治，不但大肆破坏韩国文化，还把我们变成自己国家的二等公民。他们禁止人民说朝鲜语，接管我们的田地和工业，人民忍无可忍，挺身反抗日本殖民，却惨遭殖民当局的武力镇压。金日成的父母跟很多韩国人一样，举家横越北边的国境，前往当时仍属于中国领地的满洲。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代初入侵满洲之后，我们未来的伟大领袖加入了反抗日本殖民的游击队。但二次大战开打时，金日成加入了苏联军队。朝鲜文宣上说，金日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击败了日本人，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其实人在离战场很远的某个军事基地上。

我成长期间，我们很少讨论当时家里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在朝鲜，过去的任何历史都可能酿成危险。我对父亲家族的理解，都来自我爸跟我妈说的少数往事。

二次大战爆发时，我爷爷在惠山市府的财政部门替日本长官工作。他在那里认识了奶奶郑慧顺（Jung Hye Soon）。当时她也在市府工作，从小被阿姨带大，是个孤儿，认识我爷爷之前都过得很苦。他们的爱情很不寻常，因为韩国人的婚姻通常都是由父母安排，但爷爷、奶奶婚前

就已认识，而且还互相喜欢。

二战期间，爷爷一直从事公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后，苏联军队进驻韩国北部，美国军队接管韩国南部，为超过七十年的南北分裂拉开序幕。美、苏沿着北纬三十八度，专横地在南朝鲜之间拉起一条虚拟的分隔线，将朝鲜半岛切成朝鲜和南韩两个行政区。美国指派反共流亡人士李承晚飞往汉城，推选他担任大韩民国的第一届总统。在朝鲜，当时已是苏联军队少校的金日成则获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袖。

苏联很快把所有适合的人选抓来成立一支朝鲜军队。我爷爷也丢了公职，变成人民军的军官。

到了一九四九年，美、苏双方都撤回军队，将政权交给他们各自扶植的领导人，可惜过程并不顺利。金日成是斯大林主义者，实施极端民族主义路线的独裁统治，他决定在一九五〇年夏天利用苏联的坦克车和数千军队攻打南韩，进而统一南、朝鲜。在朝鲜，学校都教我们，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朝鲜战争，而我方军队则奋勇抵抗美帝的邪恶入侵。事实上，美军重回韩国是为了及时保护南韩，而联合国军队也在此时派军支持，很快就将金日成的军队一路逼到鸭绿江，要不是中国军队杀进来，把美军逼回三十八度线以南，美军差点就接收了韩国。这场无谓的战争打到最后，至少造成三百万韩国人死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大半国土夷为平地。

一九五三年南北双方同意停战，却从未签订和平协定。直到今天，双方基本上仍处于交战状态，南朝鲜政府也都认为自己才是全体韩国人的合法代表。

我爷爷是财务官，朝鲜战争期间从没开过枪。停战之后他继续留任

军队，携家带着到处调动。我父亲（在五个小孩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出生时，他刚好驻扎在惠山以南约一百八十哩的咸兴市。退役之后，政府把他们一家人安置在惠山。爷爷是退役军官又是劳动党员，出身成分良好，政府为了奖励他对国家的贡献，安排他在军营贩卖部（为军人家庭供应物资）担任财务经理。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也跟朝鲜经济一样发达起来。

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间，中国和苏联投入大笔资金帮助朝鲜重建。朝鲜山区产煤，矿产丰富，一直以来都比南韩更富裕，工业化程度更高，因此也比南韩更快从战火中复原。相较之下，以农业为主的南韩恢复得就没那么快。然而，这种情况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开始翻转。当时南韩蜕变成制造业中心，朝鲜采用的苏联式制度却逐渐土崩瓦解。朝鲜的经济都由国家规画掌控，没人能拥有个人财产（至少台面上），田地都是公有，只是还可以种些蔬菜拿到管制严格的小市场贩卖。政府提供人民工作，也负责发放薪水，并分发大多数的配给食物和生活用品。

我爸妈成长期间，这种配给制度仍由苏联和中国资助，很少人挨饿，但也没人飞黄腾达，除了菁英阶层。另一方面，政府的配给跟不上人民对各种物资的需求，例如进口服饰、电子产品、新奇食品。优越阶级虽然能在国营的百货公司接触到这类商品，但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想买外国烟酒或日本包包的一般民众只好到黑市交易。黑市商品通常都从北边的中国输入朝鲜。

我父亲在一九八〇年前后入伍，当时他才十七、八岁。朝鲜中上阶级的男性都要服十年兵役，但如果你关系够好，最多可以减到两年。不过，爸爸入伍不到一年，就因为阑尾破裂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控制感染

引起的并发症，他开了四、五次刀，兵役也从此画下句点。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可能祸患无穷，因为朝鲜男性如果没有军事背景，通常找不到好工作。但他回到惠山之后，爷爷看他无事可做，建议他去学财政，后来考上了惠山经济学院。他的兄弟姐妹也都表现不错，二哥朴进（Park Jin）就读于惠山的医学院，大哥朴东日（Park Dong Il）是咸兴的中学老师，姐姐嫁到平壤，在那里当女服务生，妹妹则在惠山求学。

不料家里却在一九八〇年受到严重打击。东日大伯被控强暴学生、企图杀害妻子。我一直不知道详细的状况，也不知道指控是否属实，但最后他被判二十年劳役。要不是爷爷有人脉，他很难逃过死刑。非政治犯在死前获释在朝鲜很常见，这样政府才用不着把尸体运回家。因此，服刑十二年后，东日大伯就因病获释，回到了惠山。家里从来没人提起他的过去。印象中他身体虚弱，话很少，对我一向很好。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过世了。

在朝鲜，一人犯下重罪，全家都会被视为罪犯。爷爷家一夕之间失去了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

朝鲜的三大阶层底下又分成五十多种小类。长大之后，当局也会持续监控、调整你的阶层。街坊邻居和地方警察组成的监视网，让你和家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地方政府和全国各大组织都存有你的资料，这些资料决定你可以住在哪里、上哪间学校、到哪里工作。出身成分高人一等，就能加入劳动党，进而获得政治权力，这样的人能上好大学，得到好工作。出身成分差，就等着到集体农场一辈子种田割稻，遇上饥荒还可能饿死。

长子因谋杀未遂入狱之后，爷爷人脉再好也挽救不了他的事业。儿子入狱不久，爷爷尽管没接到正式的开除令，还是丢了军营贩卖部的饭



碗。幸好另外两个儿子受到的影响不大，最后都完成了学业。二伯朴进从惠山医学大学毕业后，到惠山医学院当教授，后来到医学院担任管理职。他成绩优异，政治手腕高超，即使家族蒙羞，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父亲拿到了经济计划的学位，而且跟祖父一样受雇到惠山市政府的财政部门工作。但短短一年后，市府重整，他就丢了工作，蒙上污点的出身成分终究对他造成了影响。

爸爸知道除非他想办法加入劳动党，否则未来就会一片黯淡。于是，他决定到当地的铸造厂做工，卖命工作证明他对政府的忠诚。后来他跟工厂的有力人士创建了良好关系，包括厂内的党代表，没多久就拿到了党员证。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爸爸也开始从事另一项副业赚些外快。这种行为简直是跟天借胆，因为国家管制范围以外的交易都是非法的。但我爸有些异于常人之处，一来他天生具有创业家精神，二来他生性乐观，没把规定放在眼里。除此之外，天时地利也帮助他把事业做得更大。这样的荣景至少维持了一阵子。

惠山跟中国之间的跨国界交易早有长远的历史，这里的黑市虽小但很热闹，从鱼干到电子产品，什么都卖。一九八〇年代间，女人可以把食物和手工艺品拿到简易市场上贩售，但一般交易仍是懂门道的人才从事的地下活动。父亲加入了一个规模日渐扩大的黑市商贩团体，这些人到处钻共产经济体制的漏洞，想办法赚钱。我父亲一开始的野心不大。他发现他可以用七十到一百元在惠山黑市买到一盒高级香烟，然后用每根七到十元的价格卖给朝鲜内地人。那时候，一公斤米就要大约二十五元，可见烟有多值钱。

政府对国内旅游的限制愈来愈多，要出城得通过多道文书手续。首

先，我父亲要先拿到工厂的准假单。他会花点小钱请医生帮他开病单，然后告知上司他得出城几天去接受治疗。拿到上司开的证明之后，他再去找警察，塞钱请他们发给他旅行许可。

接着，我爸会坐火车到没有大型黑市的小镇。他把香烟藏在袋子里、全身上下，还有每个口袋。旅程中他得一直移动，以免碰到警察搜身，这些警察随时都在搜查走私品。如果不幸被逮到，警察会没收他的香烟，或者拿警棍威胁他交出身上所有的钱。这时我爸就得说服警察，让他赚点零头对大家都好，这样他才能常常出现，给爷们带来香烟。警察往往被他说动。就说我爸是个天生的推销员！

我知道他宁可选择像高级公务员这样更安稳、规矩的生活，但命运不由人。在其他国家，我爸会顺理成章成为一名商人，但在朝鲜，那不过是求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他也因此成了罪犯。

### 3 燕配燕，雀配雀

我爸爸的生意从香烟做起，没多久也卖起中国成衣，当时成衣的需求量很大。一九八九年夏天，他到朝鲜东岸附近的小城高原做生意，顺便去找以前在惠山认识的朋友边民植（Byeon Min Sik），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我父亲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朋友的妹妹谦淑（Keum Sook），也就是我母亲。

她比爸爸小四岁，出身成分跟他一样差，而且也不是自己造成的。爸爸是因为大哥入狱才受到波及，她则是因为祖父曾在日本殖民期间拥有土地而蒙上污点。这个污点延续三代，我母亲一九六六年出生时就被划入“敌对”阶层，菁英阶层享受的特权都跟她无缘。

我的外公边雄旭（Byeon Ung Rook）来自韩国最北边的咸镜北道，家里不算特别富有，但拥有的地产刚好足以被视为地主。一九三一年外公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家道中落。同年，日本决定向外扩张，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在那里成立了满洲国，该地就在韩国边境以北。

过去早就有数十万韩国人在满洲定居，这段边境的边防是出了名的宽松。一九三〇、四〇年代日本占领中韩两地期间，在两边来回更加简单。

一九三三年，我外公才两岁大，全家迁往中国满洲，跟咸镜道只隔着一道图们江。二次大战爆发时，外公还只是名学生，但一样上战场打仗。我母亲不知道他加入了哪支军队，因为他从未提过这件事。

战争结束后，他继续留在中国，但经常回朝鲜家乡。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他去了一趟稳城，他父亲曾



在这座边境小镇置产。他在镇上遇到了正要去苏联当伐木工的一群人，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餐。对方一直灌他酒，后来他终于摆脱他们，独自走回下榻的旅社，但因为醉得太厉害，就躺在铁轨上睡着了。隔天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稳城的一家医院里，少了一只手和一条腿，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了医院。有人告诉他，他睡着时被一辆火车辗了过去，要不是有一名铁路管理员发现他，把他送到医院，他早就没命了。

他留在朝鲜继续疗伤。他整只手都没了，但腿还能装上义肢，学习不用拐杖走路。等到他复元时，朝鲜战争已来到尾声。平心而论，这次他可说是因祸得福。要不是因为受了重伤，他势必会参加这场夺去三百多万条人命的战争。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投下的炸弹，比二次大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战场投下的炸弹还多。他们轰炸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把主要建筑都摧毁殆尽，甚至炸掉了水坝，将作物淹没。造成的损害难以想像，到底有多少百姓死伤，没人知道。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为孤苦无依的伤残人士成立疗养院。外公就是在稳城的一间疗养院认识了我外婆黄玉纯（Hwang Ok Soon）。她是名孤儿，来自如今划入南韩的一个小农村，她父亲在殖民时期是抗日分子。她十岁那年，父亲被捕，从此音讯全无。后来家人丢下她，她只好自力更生，辗转来到中国图们市（当时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农家做工。

日本投降、韩国独立之后，她重返祖国。不幸的是，南朝鲜分成两半时，她刚好住在共产党统治的朝鲜。一九五二年，她在东海沿岸清津市的一家军火工厂工作时遇到了炮轰，一条腿被炸伤，不得不截肢。

她被送往疗养院养伤，在那里学会使用木头义肢。虽然她年轻也还

单身，但身体健全的人不太可能娶她这样的残障人士，所以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找一个跟她同病相怜的结婚对象。我外公显然也有同样的打算，他走遍了北部省份的疗养院，想给自己找个老婆。根据外婆的描述，她看到外公在走廊绕来绕去，觉得他很可怜，心想：“这个人缺手又断脚，如果我不嫁给他，他永远找不到老婆。”

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她跟着他北上横越一百五十哩，跨过中国边境回到他在珲春的家。一九五六年，外婆怀了第一胎（我母亲的姐姐）。她虽然住在中国，却从没学会中文，过得很苦又很想家，而且她想吃海鲜想到快疯了，尤其是清津口味的章鱼。最后她再也受不了，横了心抛下丈夫自己去找章鱼吃。外婆是个很情绪化、个性强悍的女人，一旦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谁都拦不住她。外公除了顺着她，也无可奈何。

清津以前是一个小渔村，但日本人把它变成一个工业港，朝鲜政府也努力要把它重建成制造中心和军事中心。我的外祖父母认为那不是适合创建家庭的地方。他们都是金日成的忠诚拥护者，担心边境地区散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受走私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诱惑。

于是他们搭火车往南走，打算找个农村落脚，在那里落地生根。因为如此，我母亲的娘家后来才会在高原定居。高原是个小城市，邻近一片广大肥沃的三角洲，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周围是稻田和果林，毫无热闹港口的腐败习气。照理说，这应该是个全新的开始，但他们来到高原的时候，正好遇上金日成下令全面扫荡阶级叛徒。全国人民都要接受调查，确定其忠诚度并记录其出身成分。不幸的是，外公是老实人，跟调查员坦承他父亲在稳城有地。从此之后，他就被贴上“坏成分”的标签，也被剥夺了入党和出人头的机会。国家分派他到纽扣工厂工作。

我母亲的姐姐一九五七年在高原出生，后来家里又陆续多了三名成员，先是两个男孩，再来是我母亲，她是老幺，在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十六日来到人世。他们后来跟爸妈一样，都成了金日成的忠诚拥护者。

我母亲不但成绩优异，而且有副好歌喉，还会弹乐器，手风琴和吉他就是她的玩伴。朝鲜的宣传影片中，常会出现穿着传统韩服的美女，鲜艳上衣和高腰长裙让她们看起来像翩翩起舞的花朵，她们会唱高亢而哀伤的歌，听的人莫不感动落泪。这就是我母亲的拿手专长。

她年轻时想从事表演工作，但学校老师说她得先用功读书，考上大学。外公也不赞成她从事表演，于是她只好专心读书，背诵那些歌颂伟大领袖和他儿子金正日（他选定的继承人）的诗词。

像她这种出身的朝鲜女人，很少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我母亲很会读书，她考上咸兴市附近的一所学院。如果有得选，她想当医生，可惜只有家世好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想读的科系。校方要她主修无机化学，她也读了这个科系。毕业之后，党干事派她回高原的化学工厂工作，她被分配到一个低阶职位，负责制造加在肥皂和牙膏里头的香料。几个月后，她获准请调到另一家工厂（制造成衣外销到苏联），担任更高的职位。

尽管经历了他人眼中的种种挫败，我母亲从未质疑国家对她的掌控。她跟在边境城市长大的朝鲜人不同，从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或外国的思想，从小到大只知道国家教她的事，一直是纯正、自豪的革命主义者。此外，我妈还有一颗诗人的心，她对官方宣传品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真心相信朝鲜是世界的中心，而金日成和金正日拥有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她甚至相信是金日成让太阳升起，而金正日在我们神圣的白头山一间小木屋里出生的那天（他的出生地其实是俄罗斯），天上出现了双

彩虹，还有一颗闪亮的新星。她已经彻底被洗脑，因此金日成过世后，她陷入了恐慌。对她来说，那就像上帝本人死掉一样。她担心“地球要怎么继续转动？”，因为大学教的物理定律充斥着从小灌输人民的政治宣传。多年以后她才发现，金日成和金正日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是仿效苏联的斯大林，逼迫人民把他们当作神一样崇拜。

一九八九年母亲认识父亲时，她还住在家里，也还在成衣厂工作。他每次到高原处理黑市生意，都会来哥哥民植家借住，久了就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民植也住家里，所以爸爸常看到妈妈，但两人除了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其实很少交谈。

当时朝鲜没有“约会”这个概念，我们的社会对男女关系非常保守。在西方长大的人或许会觉得谈恋爱是很自然的事，但并非如此。我们是从书上和电影学会怎么谈恋爱，要不就只能靠平日的观察。然而，我爸妈那个年代没有模仿的对象，甚至没有形容心里感受的语言，只能从心上人的眼神或说话的语调猜测对方的心意，男女交往最多只能在私底下牵牵手。

我不知道我爸对我妈的感觉，但她的美貌一定让他眼睛一亮。妈妈身材苗条而结实，颧骨突出，五官细致，皮肤白皙。而且她反应快，意志力强，一定深深吸引了爸爸。

我妈对我爸的印象就没那么深刻。她在她的眼中长相一般，身高不是特别高，但她哥哥民植跟她说，他这个朋友养得起老婆。有句话可以形容我爸这样的人，“他就算到石头山也死不了”，意思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有办法挺过来，活得好好的。

依照传统，他们的婚事由双方家庭安排。

有一次，我爸到高原做生意，爷爷陪着他一起去。他们认为两人平均分摊风险比较安全，这样要是碰到警察搜身，两人身上都不会藏太多香烟或钱。安全抵达高原之后，他们就借住在民植家。

祖父很快就注意到我妈，还看见她跟我爸交换意味深长的眼神。他跟我外公坐下来讨论婚事，双方都觉得他们很适合，因为两边的出身成分都不好。我们这里都说“燕配燕、雀配雀”。以我爸和我妈的例子来看，新郎和新娘都是雀。婚事谈成后，男女双方得知彼此婚约已订，故事便到此结束。

婚礼没什么特别之处。母亲穿上传统韩服，父亲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家准备了一桌宴席招待亲朋好友。之后，母亲搭火车到惠山的新郎家吃了一场类似的宴席。没有正式的婚礼，我父母只带着身分证到警察局登记结婚，就这样。

韩国有另一句俗语说：“线随针走。”通常男人是针，女人是线，所以女人跟随丈夫回家，不过女人不冠夫姓。对很多女人来说，这是婚后唯一能保留的一点点独立自主。

## 4 斑斑血泪

我父母婚后的头几年一帆风顺。两人搬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屋，那是当年爷爷退休之后军方分配给他的房子。屋子破旧不堪，但父亲开始为成员逐渐增加的一家子整修房子。妈妈很快就怀了姐姐，恩美在一九九一年的一月出生。

父亲离开了铸造厂去找别的工作，以便有更多时间经营副业。除了香烟，他还在惠山的非正式市场买了糖、米和其他商品，再搭车到其他乡镇卖钱。他到东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元山做生意时，会带玉筋鱼干回来卖。韩国人喜欢把这种小鱼当作小菜，在内陆省份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后来这也成了我爸的热卖商品。

我妈从小在乡村地区长大，远离外面世界的影响，对黑市交易一无所知，甚至对商业交易也一知半解。一九九〇年代一切改观，饥荒和经济崩溃迫使人民开始贩卖各种商品，只求存活下去。但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对朝鲜人仍是个肮脏的字眼，金钱也是一般人不齿谈论的龌龊话题。

如今，她却嫁给一个靠金钱交易维生的商人，难免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可是她也像很多爱国的朝鲜人一样，懂得把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分开，不去理会其中的矛盾冲突。后来她自己也变得很会做生意。一开始或许不太习惯，但她渐渐发现我爸比其他人精明能干，跟着他学，自然也就学会了。婚后不久，我妈就开始帮忙我爸在惠山的合法和地下市场买卖商品。

虽然他们过得比大部分邻居要好，但从来打不进所谓的“菁英”阶



级，除非你跟政府高官有往来，不然很难累积到那种财力。不过，他们的收入足以让他们到纪念碑林立的首都平壤旅游。当时恩美还是小宝宝，我妈穿着从中国走私进来的时髦服饰。她喜欢名牌包包（虽然是中国仿冒品）、日本的女性上衣，还有高级化妆品。我们逃出朝鲜许多年后，我还取笑她是朝鲜的芭黎丝·希尔顿。不过，她的打扮并不夸张，只是很有时尚品味。

尽管赚了些钱，我妈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怀恩美时，怀孕后期在家里还得砍柴。医生说，这就是她第一胎八个月就早产的原因。我们猜想我之所以比姐姐更早产，是因为我妈怀胎七个月还拖着煤炭横越铁道桥。

运煤也是我爷爷经营的地下事业之一。他丢了军营贩卖部的工作之后，在惠山的某个军事机构找到保全的差事。那栋楼的储藏区存放了很多煤炭，祖父会放我爸妈进去偷煤炭。他们都趁晚上偷溜进去，再背着煤炭穿过漆黑的街道，过程不但辛苦，而且动作一定要快，因为一旦给错误的警察逮到（意思是用钱买不动的警察），最后的下场可能是去坐牢。某天晚上，我妈过桥时突然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隔天生下一个跟小鸡一样大的宝宝，那就是我。

根据朝鲜的标准，我爷爷和我父母都是罪犯。我爸靠买卖商品赚钱，但在其他国家只会把他当作一名商人。为了在自己国家自由旅行，他拿钱贿赂薪水不够养家活口的官员。我爷爷和我父母确实偷了国家的东西，但政府也偷走了人民的一切，包括自由。

如今看来，我家人做的事不过只是超前了时代。我在一九九三年出生，当时朝鲜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已经崩溃，贪污、贿赂、偷窃，甚至市场资本主义渐渐成为朝鲜生活的一部分。危机解除后，唯一不变的是

金氏政权对人民残酷无情的集权统治。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虽然感觉到日子一个月比一个月难熬，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国内完全禁绝外国媒体，报纸也只报导金氏政权的正面消息，不然就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敌人的邪恶阴谋。然而真相是，在我们的封锁国界之外，当初创建朝鲜的共产强权陆续切断了对朝鲜的援助。一九九〇年苏联解体，莫斯科取消对朝鲜产品的“优惠关税”，经济大衰退一发不可收拾。少了补助的燃料和商品，国内经济逐渐停摆。政府无法让国内的肥料工厂继续运转，也没有燃料可供卡车将进口肥料运往农地，农收当然也直线下滑。同时期，俄罗斯几乎彻底切断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中国虽然持续援助了朝鲜几年，但他们也经历巨大的转变，并增加与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韩和美国）的经济合作，所以也切断了对朝鲜的一些补助，努力累积强势货币以利出口。朝鲜早已负债累累，想借到钱也难。

一九九四年金日成过世时，饥荒已经重创北部省份。政府大幅删减配给，人民有时甚至根本等不到配给。

这个时候，朝鲜政府非但没有修改政策，趁机改革，反而对眼前的危机视而不见。政府不开放门户，接受国际的支持和投资，却叫人民一天只吃两餐，节省粮食。新领导人金正日在一九九五年的新年演说中，呼吁朝鲜人民更卖力工作。他说，一九九四年虽然“血泪斑斑”，国人还是要“活力充沛、一心一意”地迎接一九九五年，使祖国更加蓬勃发展。

可惜我们的问题不是光靠泪珠和汗水就能解决。因为豪雨成灾，冲毁了国内的大半稻田，也让朝鲜的经济彻底崩溃。金正日把对抗饥荒的全民运动比喻成“艰苦行军”，这是当年用来形容他父亲那一代对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苦战。大饥荒最严重的那几年，有多达一百万人活活饿死或病死。

经济崩溃冲击到朝鲜社会的各个层面。过去，人民的生活所需都由国家供应，现在国家却要人民自己想办法。等到国外的粮食援助终于送进来帮助饥荒人民时，政府却把大半援助都拨给了军方，因为军队的需求永远摆第一。好不容易送到地方政府的粮食，却很快就流到黑市。突然间，朝鲜几乎所有人都得学会买卖，不然便可能饿死。当局也知道只能对这种地下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金正日最后还是准许在国内创建固定的国营市场。

这种新局面对我父亲来说是一大灾难。现在每个人都到市场上从事买卖（在朝鲜称之为“黑市交易”），竞争变得很激烈，我爸愈来愈难赚到钱。另一方面，从事黑市交易的处罚也变得更严格。我父母虽然努力适应新局面，却还是青黄不接，欠了一屁股债。我爸试过各种不同的生意。我妈和朋友用一台老旧的脚踏式缝纫机把旧衣服改成童装，她把做好的衣服拿给我们穿，她朋友则把剩下的衣服拿去市场卖。

有些人在中国有亲戚，就可以申请出国探亲。朴进二伯试过至少一次，但我爸没有，因为申请没过，也怕上级对他的生意更加关注。从中国返乡的人几乎都会带东西回来，再拿到市场边的临时摊贩上卖。他们跟我们说，在中国的垃圾堆里可以找到不可思议的好东西，甚至有完好无缺的衣服。在朝鲜，什么东西都会物尽其用，所以我们无法想像有人会把还能用的东西丢掉，甚至空的塑胶品、袋子和罐头也一样。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

小时候，眼前的世界就是你的全世界，你的全部生活就是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所以对我来说，有时有东西吃，有时一天只

有一餐可吃，其他时间只能挨饿，似乎都是很正常的事。

爸妈出外工作，想办法让全家人活下去时，常常不得不把我们姐妹留在家里。如果我妈找不到人照顾我们，就只好在门上插上铁闩，保护我们的安全。有时她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太阳都下山了，整个屋子黑漆漆。我姐怕黑，常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我会安慰她：“姐，不要哭，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也慌张起来，两个人便抱在一起哭。一听到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我们就松一口气，冲过去哇哇大哭。我妈进门时看到我们这样，心里都很难受，但如果她带了食物回来，所有的痛苦都会一扫而空。

在自由的世界里，小孩常会梦想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我四、五岁时，对未来的唯一梦想就是买很多很多面包，然后一次吃光光。当你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满脑子想的还能是什么。我不懂为什么我妈赚了钱回家却要把大部分的钱存下来，留到以后再用。我们没有面包可吃，只能吃一点粥或土豆。我跟我姐约定，如果我们能平安长大，就要拿钱去买面包吃，直到饱到吃不下为止。我们甚至会为了自己可以吃多少面包而斗嘴。她说她可以吃一整桶面包，我说我可以吃十桶；她说十桶，我就说一百桶！我觉得自己吃得下像山一样高的面包，而且怎么样都吃不饱。

最辛苦的季节是冬天。家里没有自来水，河流又结冰，镇上只有一部抽水机，要到那里提干净的水回家，往往要排好几小时的队。我大约五岁那年，某天我妈有事要忙，所以一大早六点、天都还没亮，她就把我带到那里排队。我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我妈回来找我时，天都黑了。我记得我的手有多冰，也记得手里的水桶，还有前面排得很长的队伍。妈妈跟我道歉，但我不怪她，她也不想把我丢下。这一直是她内心

深处的痛，直到今天，她都很愧疚那时老在担心家里的人吃不饱，没有好好陪伴我度过童年时光。

朝鲜虽然高举反资本主义的旗帜，却有很多人私下靠着借钱给人、按月收利息致富。我父母为了继续做生意也跟人借了钱，但后来黑市价格崩盘，他们的商品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偷，最后再也还不出钱。每天晚上我们吃晚饭时，都会有人上门讨债。那些人大吼大叫，恶言威胁，最后我爸再也受不了了。他知道另一个赚钱的管道。他在平壤有认识的人可以帮他弄到金、银、铜、镍、钴等贵重金属，他可以把弄到的货拿去卖给中国人。

这个赚钱方法的风险很高，我妈反对。以前他卖玉筋鱼干和香烟的时候，最糟的状况不过是把赚的钱全部拿去行贿，或是进再教育营服刑。她跟我爸说：“这些你还熬得过来，但是走私偷来的金属会没命的。”后来得知我爸打算把货带到惠山，她又更加担心害怕。朝鲜每辆客运列车的最后面都挂着一辆特殊的运货车厢，俗称“九号列车”。九号列车专门用来运送国内各地送给金正日的名产、水果和珍奇物品，还要分给各地干部和党内高官的礼品和物资。装在这个特殊车厢的物品都封在木箱里，连警察都不会打开检查，所有进出这个车厢的人都要搜身。我爸认识在九号列车上工作的人，对方答应要把货藏在这种绝对安全的特殊车厢里，把金属从平壤运到惠山。

我妈一再反对，坚持了很久，但最后不得不让步，因为那是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

## 5 敬爱的领袖

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二年间，我爸多半时间都在平壤经营走私生意。通常他一年有九个月不在家，只有搭火车送新一批货到惠山时，才会顺便回家，但次数不多，停留的时间也很短。我妈很快学会在惠山做生意，先到车站拿货，再转送给其他走私客，让他们拿到中国边境去卖。

我爸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又会缺钱、饿肚子，但家里的情况大致上已经渐渐改善。我爸回家那几天，他会在家里款待地方官员，包括收了钱、对他常跟“正职”工作请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党代表。我妈会准备一大桌菜，有饭、泡菜、韩式烤肉和其他特别的料理，我爸则忙着替每个人斟满米酒和进口洋酒。我爸说故事的功力一流，人又幽默风趣，听着他的说话声和闹烘烘的谈笑声，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只要家里有东西吃，又有钱买新鞋和学校制服，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是一年级班上个子最小的，而且肯定不是最聪明的。我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朝鲜都依照身高排队，依照成绩安排座位。我读写都有困难，需要额外的帮助。我讨厌在班上吊车尾，有时还会不想去上学。

我个性固执，或许是因为每件事都是我用努力换来的。总之，我下定决心要学会认字，拼了命也要把在书上游来游去的字学会。

我爸在家时，有时会抱着我坐在他腿上，念故事书给我听。我很喜欢听故事，但是朝鲜的书都由政府出版，少不了政治题材。我们没有可怕的童话故事，只有发生在一个肮脏齜齜、名叫南韩的地方的故事，那里面有流浪儿光着脚在街上乞讨。抵达首尔之前，我从没想过那些故事其

实是在形容朝鲜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对世界的想像都离不开政治宣传。

后来，我凭着意志力学会认字，不管读多少书都无法满足我。同样地，市面上的书籍多半在歌颂我们的领袖奋发向上、为民牺牲的事迹。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金日成的传记，书中描述了他年轻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靠着活吞青蛙、夜宿雪地活下来的过程。

在课堂里，不管上数学、科学、阅读或音乐，老师都会加进一些政治宣传。金日成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对父亲一片忠诚，正可作为学童效法的榜样。我们曾在课堂上读到一段文章，里头提到金日成为了国家日理万机，甚至得边骑马边看文件。问题是路途颠簸，纸张晃来晃去，所以金正日年幼时就设法把路面上的坑洞用沙子填平，好让父亲骑马时平顺又舒适。

我们敬爱的领袖拥有神奇的力量。他的传记上说，他可以用意念控制天气，而他在金日成大学就读的三年期间写了一千五百本书。他从小就展现了非凡的战术天才，所以玩军事游戏时，他那一队每次都因为他想出绝妙的战术而获胜。这个故事激励了我在惠山的同班同学，大家也玩起军事游戏。但是每次都没人想当美帝队，因为美帝队都得输掉战争。

在学校，我们唱过一首歌颂金正日的歌，说他如何力求上进，亲自走访全国各地，实地指导劳动者，途中睡在车上，只吃饭团果腹。“恳请敬爱的领袖，为我们珍重！”我们噙着泪水高唱：“我们都为你哭泣。”

朝鲜唯一一家（由国家经营的）电视台也利用纪录片、影片和节目，强化人民对金氏王朝的崇拜。领袖笑容可掬的照片一出现在荧幕上，背景就会响起澎湃激昂的音乐，每次听到我都很激动。朝鲜人从小



就学会敬老尊贤，那是源自儒家文化的传统。因此在所有人心中，金日成就像我们敬爱的祖父，而金正日就像我们的父亲。

我甚至梦过金正日。他在梦中对我笑，还抱着我，给我糖吃，醒来时我好开心。有好长一段时间，回忆这段梦境就是我生活里最大的喜悦。

知名的脱北者、同时也是朝鲜宣传部的桂冠诗人张振成，称这种现象为“情感独裁”（emotional dictatorship）。在朝鲜，政府掌控你的行动、言论、教育和工作还不够，还要支配你的情感，摧毁你的个体性，以及你依据自身经验对各种情况做出反应的能力，把你变成国家的奴隶。

这种情感上和身体上的独裁统治，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无孔不入。事实上，打从你学会说话，妈妈背着你去参加人民班的聚会（朝鲜每个人每周至少要参加一次）起，这种思想教育就开始了。你在那里学会朋友就是你的“同志”，大家也互称同志，最后每个人的思想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一进学校，老师就会灌输你类似圣经十诫的爱国十律。（第一律：我们必须秉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竭力团结社会。第二律：誓死效忠敬爱的领袖金日成……第十律：代代传承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辉煌革命成果，使之发扬光大，源远流长。）此外，老师灌输我们“主体思想”的原则，并教我们对朝鲜的所有敌人深恶痛绝。

我们的教室和课本上，都印了蓝眼大鼻、模样可笑的美军大兵处决平民的照片，或是勇敢的朝鲜学童持刀打倒美国大兵的图片。下课时，我们有时会排队去揍或捅穿得像美国军人的假人。我很怕邪恶的美国佬会再次攻打我们，用狠毒无比的方式把我凌虐致死。

上了二年级，我们开始学算术，但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国家。在朝鲜连算术都是一种宣传工具。常见的数学题大概像这样：“如果你杀了一名美国坏蛋，你的同志杀了两个，你们总共杀死了几名美国坏蛋？”

我们从不直接说“美国人”，那样对他们太客气，要说就说“美国坏蛋”、“洋基恶魔”或“大鼻子洋基”。如果不这么说，就会因为对敌人太心软而受到批评。

同样地，提到金氏家族也一定要冠上头衔或加上致敬的形容词，展现我们对领袖浩瀚无边的敬爱。有次我妈在厨房做饭，我拿起一份报纸，看了好久才把领袖的头衔全部看完：“我们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今日表示……”

我发现我爸不像其他人那样被彻底洗脑。妈妈告诉我，爸爸更在意的是政府对待人民的方式。我只听过我爸发过一次牢骚，当时我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天我们正在听电视新闻，刚好播到金正日到某地巡视军队的常见画面。播报员一再重复敬爱的领袖多么不畏寒风，给予忠贞士兵谆谆指示，这时我爸突然怒骂：“这个王八蛋！关掉电视！”

我妈压低声音气冲冲地说：“在小孩面前说话小心点！你怎么想是一回事，你这样大家都会有危险。”

我不懂我爸说了金正日什么，因为我无法想像谁会对我们国家的领袖不敬，那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我爸不是唯一一个渐渐改变想法的人。

事实上，资本主义早就日渐复苏，而且就在相隔几条街的热闹市场上。短短几年以前，市场上只有几个老婆婆在卖零嘴或自己种的蔬菜。

现在，一排排摊贩上面搭起一整片铁皮屋顶，商品无奇不有，从手工年糕到中国制的运动鞋都找得到。如果你知道往哪走，也找得到电子表和光碟机，这些新冒出来的小贩都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带着黑市商品往来中国的走私客，都住在市场后面河岸边的矮房子里。我对这一带愈来愈熟。我爸从平壤运货回来时，偶尔会把金属藏在我的小书包里，然后把我扛在肩上从家里走到走私客住的小屋。有些走私客会把货带到对岸给中国的买主。有时他们会直接涉过鸭绿江，有些则跟中国买主约在中途碰头。交易都在晚上进行，利用手电筒打暗号。因为走私的人太多，大家都要想特别的暗号，比方闪一次、两次，还是三次，这样才不会跟别人混淆。

看守边界的卫兵现在也同流合污，总是在那里等着分红。即使卫兵往别的地方看，故意放水，还是有很多东西禁止买卖，谁敢违反规则，就可能丢掉小命。

公开处决在朝鲜有教育人民忠党爱国、杀鸡儆猴的效果。我小时候，有一次惠山有名年轻人因为杀牛来吃，就在市场后面当众处决。未经特许擅自吃牛肉是犯法的行为。牛只是国家财产，平常用来犁田拉车，杀来吃太浪费，所以杀牛来吃就是窃取国家财产。

那位年轻人还有其他较小的罪名，但杀牛吃才是主要罪行。他患了肺结核又没东西可吃，但警察才不管这些。他们向全镇宣布要将他处决，然后把他带到市场上，把他的身体和手脚绑在厚重的木板上。三个人拿着步枪站在他面前，对他开枪，费了一番工夫才用子弹把绳子打断，最后尸体啪一声倒在地上。我妈震惊地看着他们把尸体移走，装进麻袋，然后搬上货车后座运走。她的血液都凝结了，两腿过了好一会儿才动得了。她不敢相信在自己的国家，一条人命竟然比牲畜的命还不



值。连狗受到的待遇都比人好。

在朝鲜，有各式各样数不清的罪行。政府一心要阻止邪恶的思想渗入国内，所以一概封锁国外媒体。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视、广播、录像带播放机，但只能收看或收听国家制作的新闻节目和宣传影片，那些节目都无聊得要死。大家对外国电影和南韩电视剧的需求量很大，即使你永远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闯进家里搜索。警察会先切掉电力（如果一开始有电的话），这样他们进门搜索时，录像带或D V D就会卡在机器里。但人民后来也学聪明了，会在家里放两台播放机，听到警察上门就赶紧把两台互换。走私或散布非法影片被逮到，惩罚可能很重，甚至有人因此被处决——又是杀鸡儆猴的手段。

收音机和电视机都密封送来，永远固定在国家认可的频道。如果擅自更改，可能会被抓去劳改营再教育，但很多人还是照改不误。住在边境地区的人，如果有接收器，有时还可以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最感兴趣的是食品广告。我看过牛奶和饼干这类外国产品的广告。在朝鲜，我从没喝过牛奶，逃出朝鲜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牛奶是从乳牛身上来的。我跟朋友会看着这些不可思议的商品，意识到中国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我从没想过我们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朝鲜人冒着坐牢的危险，偷偷收看中国的电视广告、南韩的连续剧或重播的摔角比赛。我想那是因为朝鲜人平常太压抑，日常生活严酷又沉闷，人民都渴望找到出口。看电影时，想像力会带你远游两个钟头，回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也暂时遗忘生活的艰辛。

我二伯有台录像带播放机，小时候我会去他家看好莱坞影片。二伯母会关上窗户，要我们别说出去。我喜欢《仙履奇缘》、《白雪公主》

和○○七系列。但我七、八岁时，真正改变我生命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我不敢相信那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故事。那些活在一九一二年的人竟然享有比一般朝鲜人更先进的科技！最让我吃惊的是，怎么会有人为这种不要脸的爱情故事拍一部电影。拍这种电影的人在朝鲜一定会被抓去枪毙，因为在朝鲜不准拍真人实事，只能拍歌颂领导人的宣传影片。然而，《泰坦尼克号》里的角色却把爱和人性的挂在嘴边，李奥纳多和凯特·温斯蕾饰演的角色不像我们把生命奉献给国家，而是愿意为了爱牺牲生命。“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这个想法撼动了。这部好莱坞盗版片让我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外来媒体虽然让我窥见外面的广大世界跟我周遭的世界有多么不同，我却从没想过自己也可以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生活。看着荧幕上的人，我无法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也不敢羡慕他们。政治宣传彻底将我们洗脑，让我们对外界的诱惑免疫，也让我在大饥荒开始肆虐时，对周围的苦难麻木无感。

朝鲜人随时随地都有两套故事在脑中进行，两套故事就像两列在轨道上平行行驶的火车。一个是国家教你相信的事，一个是你亲眼看见的事。直到我逃到南韩，读了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译本，我才为这种奇特现象找到适当的字眼，那就是双重思想（doublethink）。双重思想让你在脑中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思想，而且不会把自己搞疯掉。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可以早上高喊唾弃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午到市场选购从南韩走私进来的化妆品。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才会一边相信朝鲜是社会主义天堂、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国家，一边狂看敌国人民在电视电影中过着你做梦也想

不到的富裕生活。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可以坐在惠山家中，看着宣传影片播出高效率的工厂、堆满食物的超市、打扮光鲜到游乐园出游的民众，却从不怀疑自己跟国家领袖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可以在学校背诵“儿童是未来主人翁”的口号，尽管回家路上经过孤儿院，看见那些肚子又圆又凸的小孩用饥饿的眼神盯着你看。

或许我内心深处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但我们朝鲜人都是说谎高手，连对自己也说谎。挨饿的母亲把宝宝丢在巷弄里受冻的画面不符合我的世界观，我就自动关上脑袋。在垃圾堆看见尸体或瞄见尸体在河上漂流都很平常，听到陌生人喊救命却不理不睬也很正常。

但有些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某天傍晚，我跟姐姐在池塘边发现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大家都会到这里提水，他一定是拖着沉重的身体到池塘边喝水。他全身光溜溜，瞪着眼睛，嘴巴张得好大，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我看过不少尸体，但是都没有这一具那么吓人，他的内脏都袒露在外，大概是被狗啃的。我为他觉得丢脸，那样光溜溜地躺在地上，很没尊严。我不敢看他，于是抓起姐姐的手跑回家。

我妈有能力时都会帮助别人。有时会有流浪汉来敲我们家的门乞讨，记得有一次有个少妇带着女儿来敲门。“我又冷又饿，”她说：“但如果你赏点吃的给我，我会先给孩子吃。”我妈自己也有小孩，了解那种感觉，所以她请她们进来，端了两碗饭菜给她们吃。我盯着她们不放，因为那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年纪。她们很客气，很饿却吃得很秀气。我常想，如果她们还留在朝鲜，现在是否还活着？

街上有太多苦苦哀求的可怜人，你不得不关上心门，不然根本承受

不了。过一阵子，你也麻木了。这就是地狱的模样。

我认识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大饥荒中失去了家人。通常最早死的是年纪最小和最老的家庭成员。再来是男人，因为他们储存的食物比女人少。挨饿的人撑到再也抵抗不了疾病，或是血液中的化学物质失衡、心脏忘了跳动，就会日渐衰弱。

我们家也吃到了苦头，因为家里的收入就像在海上漂浮的软木塞起起落落。一九九九年，我父亲试图用货车取代火车，把金属偷偷运出平壤。但付钱给司机和汽油的花费太高，再加上得通过重重关卡、贿赂层层官员，最后他把赚来的钱都赔光了。妈妈带着我跟姐姐去投靠亲戚几个月，爸爸则重开他的火车生意，想办法弥补之前的损失。

到了高原之后，我们发现妈妈的娘家也过得很苦。外公在几年前过世，外婆搬去跟大儿子民植一起住。她最小的儿子锤势（Jong Sik）几年前因为窃取公款而入狱，如今也来投靠他们。他在劳改营里染上朝鲜很常见的肺结核，如今粮食短缺，大家都吃不饱，他也日渐消瘦，整天病恹恹。

外婆收留了很多邻居的小孩，为了让大家都东西吃，她自己每天只吃一点点。她担心自己造成家人的负担，但其实她吃得很少，骨头跟小鸟一样轻。

我很爱个子娇小、支着木腿的外婆。她从来不会嫌我烦，即使我哭着要她把我背在背上，还把她当马骑。她对我总是笑咪咪的，又很会说故事。我可以黏着她好几个钟头，听她说以前在南方的童年往事。她提到南方沿岸有个美丽的岛叫济州岛，女人可以潜入水里很久都不换气，她们潜到海底采集食物，游起泳来像鱼一般。每次听她形容广阔的湛蓝大海和爱玩的海豚，我都很好奇。我从没看过海，也没听过海豚这种动

物。有一次我问她：“外婆，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她说是从背上的孔呼吸、喷出高大水柱的鲸鱼。我从没看过鲸鱼的图片，但听起来那是我会喜欢的东西。

外婆说的故事大部分是朝鲜时代发生的事。那时不分南朝鲜，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说我们跟南韩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传统。她还跟我说了她去首尔的事，尽管在朝鲜根本不准提到“首尔”两个字，一般人也不会提起这么邪恶的地方。我是从政治宣传中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因为新闻报导提到那里受压迫的民众发起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活动。但外婆在我内心种下对她锺爱的地方的深深好奇。她对我说：“哪天来我的坟上，告诉我南朝鲜统一了。”

那时候去高原特别难受，因为好多人都因为大饥荒而奄奄一息。外婆吃很多药，有缓和疼痛的鸦片，还有帮助她入眠、忘记周围苦难的药丸。某天早上，我出去玩之前，看见她吞了比平常多很多的药。

“外婆，你为什么吃那么多药？”我问她。

她很平静地对我笑。“外婆只是想好好睡个觉，”她说：“想好好休息。”

那天下午，我听到屋里传来凄厉的叫声，是锺势舅舅在喊外婆的名字。我们跑进门，看到他摇晃着躺在床上的外婆，痛哭失声。“你醒醒！醒醒！你说话啊！”

但外婆安详地躺在床上，无论小舅喊得多大声，她都听不到了。

几个月后，我小舅也走了。有时我脑中会响起他呼唤外婆、求她醒来的哀号声。有些事我希望自己能忘掉，但我知道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



## 6 梦中的城市

二〇〇〇年，我刚好七岁，爸爸的生意蒸蒸日上。参加完外婆的葬礼，我们就返回惠山。不久之后，我们家发财了，至少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一天吃三餐，一个月一家可以团圆两、三次，也有钱可以挂急诊，买鞋子、洗发精和牙膏这类一般朝鲜人买不起的生活用品。我们还是没有电话、汽车或摩托车，但是在朋友和邻居眼中，我们的生活已经相当奢侈。

爸爸做生意回来都会带好多礼物给我们。他买了新衣服和书给我和姐姐，买了香水和蜜粉给妈妈，不过他在黑市买到最让我们兴奋的东西，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任天堂电动。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超级玛利欧兄弟。每次电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电动，让荧幕上的小人跳来跳去，一玩就好几个钟头。现在，我听到那开心的音乐，还是会忍不住微笑。我爸妈喜欢打网球电动，而且谁也不让谁。看他们握着遥控器，像小孩一样比赛、互呛，实在很好玩。他们也很迷职业摔角赛，会趁我跟姐姐睡着后，在漆黑的房间里一起看。我们会听到他们激动地喊：“用力揍他！”我妈最喜欢一个身材壮硕、所向无敌的金发女摔角手，但是我不喜欢看这些充斥暴力的影片，在街上看到的暴力就够多了。

我父母的婚姻波涛汹涌。他们互相尊重，是很好的伴侣，也会逗彼此开心。爸爸清醒时会把妈妈当成宝，喝醉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朝鲜社会本来就严酷动荡，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女人应该听父

亲和丈夫的话，什么事都是男人优先。我成长的阶段，女人不能跟男人同桌吃饭，我的很多邻居和同学家里都有特别为爸爸准备的碗和汤匙。男人打老婆也是常有的事。我们有个邻居很暴力，她太太吃饭时都不敢让筷子发出喀喀喀的声音，怕会挨揍。

相较之下，我爸算是很开明的男人。他让我妈、我及姐姐同桌吃饭，也很尊重我们，不常喝酒也很少打妈妈，但有时还是会动粗。我不是要替他辩解，只是在解释朝鲜文化。朝鲜男人从小就相信男人比女人优越，这对他们就像服从领袖一样天经地义。

我们家跟一般家庭有点不同，因为我妈不甩这一套。朝鲜女人一般只会哭着求饶，但我妈会出手反击。她个性很强，不输我爸，爸爸甚至不是她的对手。他们两个打到不可开交时，我会跑到街上请邻居来把他们拉开。有时我很怕他们会杀掉对方。

两个人吵得最凶的时候，我妈有时会威胁要离婚，但不久他们又会和好。后来是因为另一个女人走进我爸的生命，妈妈才差点跟他一拍两散。

父亲到平壤做生意以后，需要一个地方住，还有一个帮他处理工作的助理。他在平壤的姐姐介绍了一位单身女性给他，名叫元宣（Wan Sun），才二十出头，除了担任我爸的助理，由于她跟家人住在一间大公寓，顺便就把家中额外的房间租给爸爸。一年有九个月，他都住在那里。

后来，他们发展出工作以外的关系，尽管我爸一直不肯承认。在朝鲜，有钱有势的男人有小老婆并不少见。一段时间之后，元宣爱上了我爸，想跟他结婚，但她得先摆脱我妈。很像南韩八点档的老掉牙剧情

吧？而她差点就成功了。

二〇〇一年八月，我妈决定去平壤几个月，让我爸留在惠山陪我们。她自然是借宿在元宣的公寓，把商品拿到黑市卖，再买些金属回惠山卖。她完全不知道元宣打电话给我爸，说他老婆背着他去找别的男人。不幸的是，我爸相信了她的谎话，后来跟我妈通电话时就骂她偷人。我妈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说，一气之下就说要跟他离婚。

这次她是认真的。因为她没直接回惠山，反而搭下班火车到高原找她哥哥民植，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等不到我妈回家，我爸这才发现问题大了，整个人闷闷不乐。他甚至每天喝酒，很不像他。某天下午，大概是我妈跑回高原两个礼拜后，有人来敲门，我一开门就看见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外，一身时髦的都市女性打扮。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元宣。她一听说我妈跟我爸提离婚，就跳上火车赶到惠山。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一切都好奇怪。

更奇怪的还在后头。我的朋友莹子探头进来，找我去她家玩。我一踏进她家的门，就看见妈妈在里头等我。看到她我好高兴，立刻扑进她怀里。

“研美！妈妈好想你！”她说。

我还是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开，又不说一声就跑回来，后来她才把经过说给我听。她哥哥答应她，如果离婚就收留她，前提是不能带着两个孩子。但她放不下我们，而且离家后，她反倒想起我爸爸种种的好，决定回家挽救他们的婚姻。

“研美，你爸还好吗？”她问。

“他现在跟一个平壤来的小姐在我们家。”我说。



“你先待在这里，我找人叫你，你再回家。”她说。

她走到我们家，看见元宣坐在屋内的坐墩上跟我爸说话。我不确定看见我妈站在门口，他们哪个人比较惊讶？我妈跑进门，举起脚就往元宣的屁股一踢，还一边喊：“滚出去！”元宣站起来打她耳光，爸爸不得不抓住妈妈，免得她把元宣撕成碎片。我爸叫元宣先离开，我妈在她身后用力甩上门。

那时是十一月初，这个从平壤来的瘦弱女孩穿的衣服根本抵挡不了冰冷的天气。她只穿了轻薄的外套和不实穿的鞋子，站在我家门外活像个可怜的幽魂，哭哭啼啼地求我爸让她进去。

同时间在屋里，爸爸求妈妈回心转意，别跟他离婚，还对妈妈发誓他跟助理之间清清白白。妈妈不知道要相信什么，但她很清楚家庭比外面那个女人重要，于是决定留下来。元宣后来便坐下班火车回平壤。

去问朝鲜乡下任何一个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十个有九个会说：“有生之年到平壤看一看。”

我在八岁那年梦想成真了。

只有国家菁英才能在朝鲜的首都居住和工作，要到那里甚至要拿到特殊许可。平壤对朝鲜百姓来说，又像自家后院那样熟悉，因为多不胜数的图画书和宣传影片，都赞扬它是我们社会主义乐土的最佳典范。对我来说，平壤是集合了宏伟纪念碑和盛大庆典的神秘圣地，就像把红场、耶路撒冷和迪士尼集于一地一样。

我爸已经好久没回家，所以他邀我跟姐姐夏天轮流去找他住一个月。我先去。想到同时可以见到爸爸和梦中的城市，我兴奋得不得了，他回来接我之前的那个礼拜，我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再加上二〇〇二年

夏天是朝鲜第一次举办如今闻名全球的阿里郎节，向世界展现朝鲜的军事和文化实力。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亲眼看到那种盛况。我把要去平壤的事告诉所有邻居和同学。有些家长还要我别在他们的孩子面前吹嘘，因为他们的小孩听了也吵着要去平壤。

为了这趟特别的平壤之旅，我把最好的衣服都收进行李，包括公主T恤和娃娃鞋。我跟爸爸坐早班火车前往，尽管距离才两百二十五哩左右，我们还是坐了好几天的车，因为电力不足，火车不得不放慢速度。我跟爸爸坐卧铺，还带了食物在车上吃，但是大多数人都睡在硬邦邦的座位上。火车终于驶进平壤车站，元宣来接我们。我还是不懂几个月前她为什么专程跑来惠山，甚至已经不太记得她这个人了。但看到她挽着我爸的手，以小孩的直觉，我也知道不太对劲。不过那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的心思都被平壤令人着迷的景象和声音给吸引过去了。

周围的一切都让我赞叹不已。那天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搭公车，看到有人搭地铁或坐私家车在路上走，我也觉得好神奇。以前我从没看过计程车，我爸还教我怎么发音，跟我解释这三个字的意思。更神奇的是我爸买给我喝的一种新奇饮料。那种饮料装在瓶子里，颜色很鲜艳，可是喝下去并无顺口的感觉，反而觉得刺刺的，好像被电到一样。

“爸，我不喜欢这个。”我边说边忍住眼泪。

“别这样。”爸爸哄着我说：“别像个乡下女孩一样！喝多一点你就会喜欢了。”但那种嘶嘶叫、冒泡的汽水吓坏我了，我再也不想尝试。

平壤对我就像个梦幻仙境。每个人看起来干净又光鲜。金正日规定国内的女人都要穿裙子，但是在惠山，很多女人都不理官方的服装规定，改穿比较方便的宽松长裤，但在时髦的首都可不行。对我来说，这里的居民都好文雅。跟偏远北部人粗声粗气的说话方式比较起来，他们

的口音没那么重，说话也更轻声细语。

惠山的公寓摇摇欲坠，巷弄脏兮兮，调车厂煤烟弥漫。相反地，平壤看起来又新又闪亮，街上有宏伟的建筑和宽阔干净的大道。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有人在乞讨，只有俗称“小燕子”的流浪儿。在朝鲜各地的市场和火车站都看得到他们的踪影，不同的是，平壤的流浪儿只要跟人要钱或要食物，警察就会过来把他们赶走。

我爸要我不管到哪儿都要紧紧牵着他的手。他很怕我会走丢，因为我不断抬头张望这座宏伟的城市。晚上，他带我坐公车看平壤市区的五彩灯光，我开心到差点疯掉。惠山晚上唯一亮着的建筑是金日成的雕像，但这里所有重要的建筑都像火把一样亮。街上有好多宣传标语，有些是用霓虹灯排成的，写着“平壤，韩国之心”。这就够抢眼了，没想到连餐厅招牌都是霓虹灯。

我们去参观只在电视上看过的景点。爸爸还带我去看著名的柳京饭店。这栋一百零五层的金字塔摩天楼位在市中心，原本要打造成世界第一高的饭店，但至今还没完工。我们在万寿台的喷泉公园前拍了一张照片，我还在宏伟的金日成铜像前献上鲜花。七十五呎高的伟大领袖在宽阔的广场上对人民微笑，他穿着长大衣，举起一只手，像要揭露国家的命运。爸爸一向爱开玩笑，他转头对元宣说：“要是能把他的大外套脱下来卖到中国，那有多酷！”接着又说：“或者至少他的一只鞋。”

我爸说的话教人目瞪口呆。现在我明白了，他就像《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史密斯，看透了老大哥的宣传伎俩，内心知道这个国家真正的运作方式。但还要过好几年，我才会明白金氏父子不是神。平壤给我一种温暖而神圣的感觉，因为这是伟大的领袖走过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金正日现在居住的地方。只要知道他跟我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我就觉

得自豪又幸运，这也是我应该要有的感觉。

某天，我们搭了两小时的船游大同江，打算去参观金日成的诞生地万景台，只是后来又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去附近一家不错的中国餐馆吃饭。我从没去过坐在椅子上吃饭的餐馆。在惠山，我们有时会到市场买东西吃，住宅区也有少数类似餐馆的地方，但大家都坐在地上吃。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对我来说很怪异，如果可以选，我还是想坐在地上。不过我很喜欢跟女服务生点菜，看人把菜送到我面前。我头一次吃到又软又细的面包，而不是平常吃的那种又黑又硬的面包。我还尝到对岸中国人家煮饭时阵阵飘香的油面，但口味我吃不惯。虽然嘴上什么也没说，但我心里甚至想换成泡菜。不过，我吃到了猪肉薄片，还有其他好吃得不得了的中国菜。后来每次我肚子饿，都会在心里重温一遍那次吃的大餐。我唯一的遗憾是没点更多菜。

元宣家的公寓在一栋摩天楼的十一楼，地点在平壤东部的船桥区域。那是我第一次搭电梯。以前我在南韩的连续剧里看过，但实际搭的感觉没那么刺激，反而觉得可怕。这栋大楼有电，但为了省电，走廊和电梯都没开灯，所以我紧抓着爸爸的手摸黑穿过大厅，坐上电梯。

一走进公寓就有很多窗户和电灯，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里头有三间卧房、一间浴室、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大饭厅。元宣的父亲和继母睡一间，元宣和两个妹妹睡一间，我跟我爸睡一间。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安排的。我们搭了很久的火车，一回到公寓，爸爸就往床上一躺。元宣在他旁边坐下来，靠在他身上。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看过爸妈这样靠在一起。于是我爬上床，钻到他们中间，窝在爸爸身边。

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几乎都会听到政府提供的收音机大声播放国

歌。朝鲜家家户户都有一台这种收音机，而且从早到晚都不能关掉。收音机频道都固定在同一个电台，这样政府连你在家都可以控制你。早上会播放很多澎湃激昂的歌曲，例如〈强盛大国〉，提醒人民像这样赞扬我们引以为傲的社会主义生活，有多么幸运。我很惊讶平壤的广播可以开那么久，因为惠山常常停电，我们都要自己起床。

每天早上七点都有个太太来敲公寓的门，大喊：“起床了！打扫时间到了！”她是人民班的班长，大楼里的每户人家都要参加人民班。在朝鲜，每个人都要早起，用一小时打扫走廊或整理屋外区域。集体劳动是我们保持革命精神和团结一致的方法。国家希望我们像有机体里的小细胞，谁都少不了谁。我们要一起做每件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一样。所以到了中午，当广播响起“哔”一声时，大家都停止吃午餐，谁都不例外。

平壤人早上打扫完毕后，就会排队等公车去上班。在北边的省份，去上班的人不多，因为没什么工作可做。工厂和矿场早就停工，也没有产品可以制造。男人就算去办公室或生产线，也只会在那里喝酒、玩牌跟赌博。但平壤不一样，大家看起来都很忙。有一次，元宣的妹妹带我去她工作的工厂参观，那是制造汽车轮胎的塑胶工厂。那是在朝鲜看过唯一一间真正在运作的工厂。

我在平壤的那个月还有其他刺激的冒险。我们买票进五一体育场看了好几场阿里郎节的盛大表演，那些壮观的戏剧、音乐和体操表演让我大开眼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三万到五万名受训好几个月才站上舞台后方阶梯的学童。他们高举着彩色方块，就像会动的墙壁，创造出变化万千的大型图案和口号，赞颂朝鲜政权的伟大。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些小孩得连续表演好几个钟头，不能休息吃东西或上厕所，整个过程



根本是虐待。当时我们却认为，为领袖受苦是荣耀，因为领袖也为我们受了很多苦。如果有机会，我也会骄傲地加入他们。

我还人生第一次去参观动物园，看到了猴子、老虎、熊和大象，那种感觉就像走进了我的图画书。最让我兴奋的动物是孔雀，我一直以为那种鸟是假的，是画家想像出来的。亲眼看到公孔雀在我面前展开尾部的华丽羽毛时，我惊讶到差点尖叫，难以想像会有这么漂亮的动物跟我存在同一个世界里。

一个一个礼拜过去，元宣努力要对我好，所以过一阵子我也真的开始喜欢她，而且我爸对她非常好。他们刚认识时，她得了肺结核（这种病连在菁英阶层也很常见），我爸都会注意她有没有好好吃饭、按时服药。我到平壤的时候，她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爸一定对她有好感，但我就像面对生命中的很多事一样，宁可对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

有一回我半夜醒来听到有人在吵架。我爸没睡在我旁边的床上，而是跟元宣在另一间房间里。她边哭边跟他哀求。

“你为什么不离婚！”我听到她说：“研美还小，我可以照顾她。恩美就让她跟着妈妈。”

我爸火了，压低声音说：“别说了！你会吵醒她的！”

后来，我爸要我答应他，回到惠山后别把这些事告诉我妈。

我在平壤的最后几天，我爸胃痛到受不了，最后决定到平壤的红十字医院做检查。医院找不出病因，于是他又转往首都最先进的医院，那是国家菁英看病的医院。但连国内最优秀的医生都查不出病因，他只好放弃，决定带我回家。

我们搭火车跟着他最新的一批金属坐回惠山。火车驶过一站又一站，周围的山愈来愈陡峭，景象也愈来愈贫瘠萧条。平壤的明亮灯光和干净街道随着窗外的景象消失在梦里，只见瘦巴巴的农民握着锄头在翻土，捡拾他们找得到的种子和谷粒。

每次火车一停，“小燕子们”就会爬上车厢，敲窗户跟我乞讨。我看见他们争先恐后爬上来捡人家丢掉的腐烂食物，连发霉的米粒也不放过。我爸担心他们吃了坏掉的东西会生病，都叫我不要把垃圾给他们。我看见其中有些小孩跟我差不多大，很多甚至比我还小。但我不能说同情他们、甚至可怜他们，我只觉得好奇，他们吃了那些坏掉的食物要怎么活下去。火车驶出车站时，有些小孩还挂在车厢上，紧紧抓着车底不放，使出所有力气不让加速的火车给甩出去，同时抬头用既无好奇也无愤怒的眼神看着我。我在那些眼睛里看到了纯粹的求生意志，一种在绝望中也要活下来的动物本能。

还没抵达惠山，火车突然在站间停下来。听说有名街童爬到车厢顶上，碰到电缆被电死。为了移走尸体，火车误点，还有人很生气。除此之外，这件事似乎没影响到任何人。

我妈来车站接我们。我爸去付钱给看守九号运货车厢的警察，拿回他的包裹。我好高兴终于回到家，再次看见熟悉的家园和我的向日葵花园。我很想念妈妈，迫不及待要告诉她在平壤发生的所有事。

“研美，你有没有去看主体思想塔？”我妈一边帮我做年糕一边问：“还有所有的纪念碑？”

“有！我们跟元宣去了所有的地方。”

“真的？”我妈用冷冷的声音说。

“嗯。”我说：“我们还去了动物园！”

但之后我没再说下去了。

这次换恩美跟着爸爸回平壤，直到夏天尾声才回家。我爸还在惠山时，某天他接到一通找元宣的电话，得知不好的消息。原来元宣兼了一个副业，帮平壤的另一个走私客的忙，结果那名走私客告发她。警察把她抓去讯问，她趁休息时间逃走，现在躲了起来。

我爸回平壤之前，我妈就警告他，从现在开始要跟元宣保持距离，她说那个女人惹上了麻烦。

但我爸还是没听她的话。



## 7 最漆黑的夜晚

我爸在二〇〇二年的十月底回到平壤，过了不久他又弄到另一批可以卖到中国的金属。万事俱备，只缺包裹所需的麻袋和绳子，就可以把货搬上火车运往惠山。即使在首都，这些东西也很难找到，但我爸知道市区有个人通常货源充足。

他不顾妈妈的警告和自己的理智，到了平壤还是联络了元宣。她显然还在帮忙他生意的事，因为我爸让她去买麻袋和绳子，自己则到邻近的市场上等她。两人完全不知道检察官已经派人（他们有自己的调查员）监视那栋房子，或许是接获线报，知道元宣（或许还有我爸）会来。

我爸等了大约一个钟头，一直等不到元宣，只好自己去找人。调查员在屋里设了陷阱要抓他，但他们没有立刻逮捕他，而是先跟踪他回家，希望经由他找到非法金属的藏匿地点。但就在他坐上公车前，他们怕把人追丢，便上前逮他。

“你是朴津识吗？”其中一人问。

“是。”我爸说。随即一人一边抓住他的手，将他逮捕。

后来我妈试图拼凑出完整的经过。她得知警察先是逮捕了平壤一名知道我爸底细的铜走私客。接受审问时，她跟警方说她可以抖出另外两个从事非法金属交易的人：一个是来自惠山、名叫朴津识的“大鱼”，另一个是帮他处理生意的平壤女孩。

元宣跟我爸在同一时间被捕，被判到劳改营服刑六个月。我们听说她服完刑后嫁给了一个前军官，生了一个小孩。听到她能抛开过去、重

新开始，我很替她高兴。她跟其他人一样，只是努力要活下来。

不幸的是，我爸为了他犯的罪必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妈妈从邮局回来时泪流满面，全身发抖。听她跟我朋友莹子的奶奶说起原委，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想打电话给在平壤的爸爸，可是都联络不上，这才发现他因为走私被警察逮捕。

我妈只希望是哪里弄错了或只是噩梦一场，但她知道得马上采取行动。她必须去首都查出爸爸被关在哪里，看能不能花钱把他弄出监狱。

我妈去平壤的那天早上，她坐下来跟我和姐姐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她提醒我们，从现在开始，大家对我们的态度会跟以前大不相同。

“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家的坏话，”她说：“但你们不要太在意。爸爸很快就会回来保护我们。”她说我们没什么好丢脸的，所以应该像从前一样笑笑就算了，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她蹲在恩美前面，说：“恩美是姐姐，所以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就是家里的支柱。”然后又对我说：“研美，你要帮姐姐的忙。”

她留给我们一袋米和一些炒菜油，还说家里有一阵子不会有钱进来，所以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什么都要省着点吃，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我们陪她走到火车站，她上车前给了我们大约两百元，够我们吃完米的时候买点干豆或玉米。“我会尽快回来，带回更多食物。”她说，然后抱抱我们，跟我们道别。我们看着火车开走，站了很久才走开。当时我才九岁，却觉得童年也随着妈妈远去。

回家途中，我跟恩美看到街上卖零嘴的摊贩。我们盯着中国进口的

糖果饼干看了好久。妈妈从来没买过这种零嘴，因为太贵了，但我们好想吃吃看，想都没想，就把妈妈给我们的钱都拿去买一小包中国来的夹心饼干和一包葵花子。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才又看到妈妈。

冬天来了，天黑得愈来愈快。天气好冷，所以我们家的门常常冻到打不开。我们每次生火取暖跟煮饭都笨手笨脚，要花很多时间。妈妈留给我们一些木柴，但我们不太会把木柴噼成一小块一小块。斧头对我来说太重，我又没有手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徒手去捡木头碎片。

有天傍晚，我负责到厨房生火，但因为用了湿木头，火堆开始冒出大量浓烟。我跟姐姐奋力呼吸，但因为门窗都结冰了，扳也扳不开。我们大喊救命，勔捶隔壁人家的墙壁，但没人听到我们的求救声。最后，我抓起斧头敲碎冰块才把门打开。

那个月我们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妈妈留下来的食物很快就吃光了，到了十二月底，我们差不多已经在挨饿。有时候，朋友的妈妈会带东西给我们吃，但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朝鲜的大饥荒应该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就已结束，但过了好几年，生活还是很苦。住在惠山的小姑姑没有多余的食物可以分给我们，二伯很气我爸入狱为家里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耻辱。我们很受伤，因为我父母对二伯一家人一向慷慨，现在我们却开不了口求他们帮忙。

我们的邻居金锺爱（Kim Jong Ae）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一直留意我跟姐姐的状况。她是党员，在军事动员部工作，过得比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好。我永远忘不了某天好冷好冷，我跟姐姐和朋友到雪地上玩（当时是寒假），五点我们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家里没灯也没食物，我们只能坐在厨房里，准备度过又一个挨饿受冻的夜晚。这时候，金锺

爱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直到今天，我闭上眼睛还能回想起那碗饭香喷喷的味道，那大概是我有生以来闻过最棒的味道，也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餐。那样的日行一善深深感动了我，让我一辈子感激不尽。

我的朋友莹子和她奶奶也帮了我们很多。莹子有时会来睡我们家，这样我跟姐姐才不会那么怕黑。写下这段往事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我不想回忆起自己在那段绝望的日子的感受。从那次之后，我就很怕黑。即使到现在，每当心情不好或遇到难关，我就会打开所有的灯，让房间里愈亮愈好。如果夜晚永远不会降临，我会很开心。

为了打发时间，忘掉孤单的感觉，我跟姐姐会一起唱妈妈小时候哄我们时唱的儿歌。我们希望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听到她跟我们说她就要回来了，但我们没有电话或电话号码可以联络到她。

一月的某一天，我妈突然来敲门，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冲上去抱住她，不肯放开手。三个人又哭又笑，庆幸我们都还活着。妈带了一些稻米、玉米和干豆回来，我们饿坏了，很难抗拒为自己煮一顿大餐、一次吃个过瘾的冲动，但我们知道食物得慢慢吃，因为妈妈说她不能待太久，她还得回平壤赚钱，想办法把爸爸救出来。

她把这一个月来的可怕经历说给我们听：她抵达不久，就得知爸爸被关在拘留侦讯中心，一开始他们不让她见爸爸，后来她收买了一名守卫才进得去。爸爸仍惊魂未定，他跟妈妈说警察刑求他，一直打他腿的某个部位，那个地方肿到几乎无法动弹，连去上厕所都有困难。后来守卫在他膝盖后面绑一根木棍，让他跪着站不起来，痛不欲生。他们想知道他卖了多少货给走私客，还有多少人参与其中，但他透露得不多。

后来，他被移往平壤西北边的甑山“再教育营”，也就是甑山第十一

号教化所。这种集中营关的多半是轻刑犯或女性脱北者，但也可能跟重刑犯监狱，甚至跟朝鲜古拉格的政治犯集中营一样残酷。在“再教育营”里，犯人整天都要到田里或工厂做苦工，但分到的食物很少，大家为了食物碎屑抢得你死我活，有时甚至得吃老鼠充饥。晚上则要背诵领袖的演说，或是上没完没了的自我批判课。他们虽然犯了“危害人民的罪”（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却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只要悔改并完成金日成思想的复习课程，就能重回社会。有的犯人会接受审判，有的不会。但我妈认为我爸被送到“较轻微”的拘留所，应该是一个好预兆，心中也燃起了全家能很快再团圆的希望。

妈妈回家让我跟恩美都松了口气。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挤在火堆旁边睡，好几个礼拜以来，我第一次可以放心入睡，不用再提心吊胆。然而隔天醒来，我们就听到探员大力捶门的声音。他们来抓妈妈去问话，想弄清楚爸爸被关的事。但警察一看到家里还有小孩，心就软了。他们问她有没有亲戚可以在她被抓去问话期间代为照顾我们，她提起了我二伯。于是警察叫我们人民班的班长去找二伯，把他带来我们家。二伯到了之后，警察吩咐他在我妈不在时照顾我们姐妹，之后警察就把妈妈带走了。

接下来几天，我妈没日没夜地坐在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埋头写下自己和爸爸的自白书，承认他们犯下的所有错误。之后有个调查员过来念她写的东西，问她问题，晚上他们锁上办公室的门就回家了，早上才重新回来问话。

最后我妈终于获释。警察相信她不会逃跑，但要她之后再回去受讯。

我跟恩美知道她没跟爸爸一样被送进监狱，都感激得不得了。可是



她来二伯家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求她带我们回家，她去平壤想办法救爸爸时，我们愿意在家里顾家。伯父和伯母对我们不好，把我们当佣人一样使唤，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受欢迎，妈要是走了，我们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对待。我们跟妈说，我们两个人自己待在家里比较好，也说我们愈来愈会照顾自己。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每次想到我妈再度离家那天，我还是会忍不住流泪。那天她穿了一件卡其色的夹克，我哭着拉着她的夹克，不肯让她走。没有她在的日子很难熬。我好想跟其他小孩一样，有人在家里等我回家，跟我说吃饭了或起床了。我好希望妈妈在家。一开始，她装出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但后来她也忍不住跟着我一起哭。

“研美，你要乖。”她说：“你只要睡四十个晚上，妈妈就回来了。”

对我来说，四十个晚上好漫长，而且真的很漫长。接下来七个月，我妈在平壤和惠山之间频繁来去，常常一去就好几个礼拜。她到平壤做买卖手表、衣服和二手电视的生意，这些都是即使被逮到、后果也不会太严重的走私商品，但她光是运送这些商品就要花很多时间。后来她只再见到爸爸一次面，两人都不知道他会关多久。有时她回惠山也没带食物或零食回来。更小的时候，我跟姐姐或许会抱怨，但现在不会了。只要她平安无事，我们至少隔一阵子就能见到她，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这段期间，我跟姐姐不得不休学。在朝鲜上学虽然都免费，但学生还是得自己负担用品和制服的费用，而且学生也要送老师食物或其他礼物。我们已经没有钱负担这笔开销，所以根本没人在意我们有没有去上学。再说，我跟恩美为了活下去就已经够忙了，根本没空去上学。

为了洗衣服和洗碗，我们得先走到河边，再把冰敲破。我或姐姐差

不多每天都要去排队提煮饭用的水和饮用水。妈妈留给我们的食物每次都撑不久，我们常饿到前胸贴后背。

果然如我妈所料，镇上的小孩开始嘲笑我们是犯人家庭。大家都在说我爸毁了我们的的大好未来，害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都不理那些闲言闲语，抬头挺胸地走开，但心里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我爸一旦成为罪犯、被踢出劳动党，便决定了我们日后的命运。我们一家人要再像过去那样幸福，已是希望渺茫。

二〇〇二到二〇〇三年挨饿受冻的漫长冬天过去之后，我的脸上起了红疹，只要一晒到太阳就会破皮流血。我经常头晕，肠胃也不好，很多小孩都有这种毛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都得了糙皮病。这是一种因为缺乏烟碱酸和其他矿物质引起的疾病，长期只吃谷物、没吃肉，就容易得到这种病。如果没补充足够的营养，过几年就会没命。

逃到南韩之后，听说百花齐放的春天在世界其他地方象征生命和重生，我非常惊讶。在朝鲜，春天是死亡的季节。每年到了春天，我们的存粮都已见底，新苗才刚种下，田里还没长出可以吃的东西。这时候是最多人饿死的季节。我跟姐姐常听见在街上看见尸体的大人一脸同情地砸着嘴说：“可怜他们撑不到夏天。”

如今，每次四、五月到美国或英国这些地方旅游，我已经能够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享受大自然，并且开怀畅饮。但我仍然记得以前我曾经多么痛恨那些翠绿的山丘，只希望那些花都是面包或糖果做成的。

春天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柴火，还可以走去郊外的小山丘找些小虫和野生植物填填肚子，免得饿到受不了。有些植物还满好吃的，比方野生的苜蓿花。恩美的最爱是我们称为“猫草”的植



物，它的绿色叶子又小又软。我们还会摘某些植物的根来嚼，但只是为了感觉嘴里有个东西，不会真的吞下去。有一次，我们嚼的根害我们的舌头肿起来，至少一个小时无法说话，那次之后我们就更加小心了。

很多小孩喜欢追着蜻蜓跑，我要是抓到蜻蜓就会把它们吃掉。

邻居的小男生有一只塑胶制的打火机，他们教我们怎么用火烤蜻蜓头，烤过后会发出一股类似烤肉的香喷喷味道，很好吃。到了夏天，我们还会烤蝉来吃，对我们来说那是人间美味。我跟我姐有时会在野外消磨一整天，尽量找东西填肚子，再走回漆黑死寂的家。

二〇〇三年八月底，我妈回到惠山，叫我们打包几样必需品。她的侦讯结束了，但她不能再次丢下我们独自过冬。我妈卖了我们住的房子，这样才有钱搬回她在高原的老家。但在朝鲜买卖土地是一件很吊诡的事，因为所有房产都归国家所有。所以这是非法买卖，当然这笔交易从头到尾都不会有纪录，也没有签契约和其他文件。我妈跟买主只有口头上的约定，相信没人会去告发他们。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唯一拥有过的家。

## 8 朝鲜之歌

妈妈把我们带去舅舅家借住。民植舅舅跟我爸是老朋友，他跟太太和两个儿子住在如今已属于他的老家。他的工作是帮当地的工厂开员工接送车，但在朝鲜没人能靠薪水维生。二〇〇二年，工人的平均月薪大约是两千四百元，照非官方汇率约值两美金。这么点钱，连十磅的便宜谷物都买不起，而且物价一直在上涨。家里突然多了两个小孩，舅舅根本养不起。

但我妈把卖房子赚到的钱拿去帮舅妈在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赚点钱贴补家用。政府已经开始管制市场，跟有篷市场的摊位收取费用，要抢到最好的位置还得拿钱行贿。舅妈开始到市场卖鱼和年糕，但生意不是很好。我妈把剩下的钱都交给舅舅管，但他很快就把钱花光。

我们到舅舅家之后不久，我妈的姐姐，也就是我阿姨敏熙（Min Hee）来高原看她弟弟。看我们过得那么辛苦，她很不舍，于是带我一起回松南里的乡下。她丈夫是退休公务员，孩子也都大了，她认为带我回去不至于负担太大。

阿姨家是一栋茅草屋顶和木头梁柱盖成的传统建筑。屋前是一片干净整齐的泥砖院子，有个圆形的砖头烟囱和炉灶可在外面煮饭。阿姨和姨丈对我很好，但姐姐和妈妈不在身边，我觉得很孤单，所以常常哭，过了一阵子才适应乡下的生活。

村里很少有电，所以大家都不依赖电，生活的方式仿佛现代科技还不存在一样，晚上出门只靠月光或星光照明。很多女人平常都穿着传统的长裙。四周围都是山，泉水干净又清澈，可以直接用手盛来喝。最进

步的运输工具就是牛车。

这里很少人家有时钟，所以我们听到公鸡啼就会起床。公鸡通常很准时，但有时还是会出错，所以只要公鸡没叫，很多人的作息都会乱掉。阿姨养了很多鸡，我的工作就是看着母鸡孵蛋，免得其他鸡把蛋吃掉或有人来偷蛋。

除此之外，我还要帮忙洗碗和去森林搬柴，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况且，我已经不会再饿到全身没力。事实上，因为饿太久，我开始吃个不停。就像鸟宝宝，我一张开眼睛就打开嘴巴，眼睛闭上时也跟着闭上嘴巴。阿姨煮了简单又营养的东西给我吃，都是用她种在院子里的玉米、土豆和辣椒做的料理。她还种了番薯拿到市场上卖，但营养丰富的番薯叶留着自己吃，吃剩的就拿去喂猪。房子周围还有一片葡萄园，我第一次吃到葡萄，那味道棒极了。

我的体力很快恢复，也渐渐胖了回来，甚至开始长高。我的个子虽然不高，但我想要是不用挨饿，也不用常常把水桶扛在头上走回家，我应该会比现在高很多吧！

阿姨的女儿是咸兴市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住在阿姨家的时候，我表姐正在松南里的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她跟一名当地的警察在父母的安排下订了婚。我喜欢表姐夫，因为他会把警察突袭没收的影片拿回来给我们看。

表姐的工作是替人治病，政府却没提供医生用来治病所需的药物。在大城市，病人有时可以自己到黑市买药，但乡下地方未必买得到。离松南里最近的市场至少有五哩远，也没有直达的路，得翻过一座山、跨过一条河，再越过一条溪才到得了，连牛车都没办法走完全程。因此，很多人碰到紧急状况就只能束手无策。政府鼓励大家要灵活应变、自立

自强，连医生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倡导的“主体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医生会自制传统草药以备不时之需。表姐常带我一起上山找不同处方需要的植物、树皮和坚果。我像只开心的小狗跟在她屁股后面，学习哪些植物可以用、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

这里的医生也得自己当农夫。他们栽培药用植物，甚至自己种棉花再做成绷带或包扎用品。即使如此，所有的物品还是永远不够用。连大城市的医院都没有“丢弃式”用品这类东西。绷带总是洗了再用，护士帮不同病房的病人打针，也都用同一个注射器。他们知道这样很危险，却无可奈何。到南韩之后，看到帮我看病的医生用过的医疗用品马上丢弃，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奇怪的是，后来到了南韩，我还是会怀念松南里乡下的纯朴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那段时间住乡下的全新体验，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山上被大自然围绕，我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贴近真实的自己。某种程度来说，那感觉就像住在古朝鲜，那个我从高原的外婆口中听过的古老王国。我想外婆也向往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没人知道、只存在于老歌和梦境中的地方。

在乡下的这一年，给了我一个可以休息和疗伤的地方，但我不可能永远住在这里。二〇〇四年初的某一天，我妈带着噩耗来找我。我爸在一场秘密审判中被定罪并发配到重刑犯等级的囚犯集中营服劳役。我们以为他的刑期是十七年，后来才知道是十年；反正这不重要，因为一进去那种地方很少人能活着出来。这种事大家都知道，因为政府希望人民恐惧集中营。在那里，你不再被当作人对待，里头的囚犯甚至不能正眼看守卫，因为牲畜不该直视人类。他们通常不准家属探监，连写信也不

行。犯人整天做苦工，只能吃很稀的粥，因此又饿又虚弱。晚上，犯人都挤进小牢房里睡觉，头对脚躺在地上，挤得像鱼罐头，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撑得到服完刑期。

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爸爸，我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栗。就算爸撑得过来，他出狱时我都长大了，到时候我们还认得出对方吗？

妈妈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所以把我一起带回高原，说服舅舅收留我们三人。她会去赚钱养活我们。

于是，我、妈妈和恩美搬进连着主屋的小房间。里头有张很小的钢丝床，我们在上面铺了几块木板，但是睡起来太硬，而且摇摇晃晃的。最后我们干脆把床搬到外面，直接睡地上。门外搭了个小棚子，有个开放式的小厨房，一下雨，水就会滴滴答答打在锅碗瓢盆上。后来舅舅和他的朋友帮我们砌了一道墙，这样火就不会被吹熄。后来的两年我们都住在这里。

跟惠山比起来，高原是个小城市，人友善多了，小偷好像也比较少。朝鲜经济崩溃之后，惠山的治安变得很差，我们还得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锁在门后。衣服得晾在屋里，因为连晒衣绳上的衣服也会被偷。小偷什么都偷，连狗也不放过。朝鲜人养狗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家，二是杀来吃。我小时候，朝鲜跟亚洲的很多地方一样，把狗肉当作美食，但我很爱狗，不忍心吃它们。白天我们把狗拴在外面，晚上再关进家里，不然就会有人偷狗去卖或煮来当晚餐。

相较之下，高原的治安比较好，但这里的人一样很穷。最大的差别是，高原人跟以前一样还会分享食物。在惠山，我们做了年糕大概会偷偷吃掉，或是只跟较亲的邻居分享。但在高原，家里如果有年糕，左邻

右舍会过来一起吃到一块也不剩，就算不想也没办法。

高原的舅妈对国家忠心耿耿，还是人民班的班长。人民班每周开一次会，这是国家掌控人民动向及宣布新命令的管道。星期六，我们都要一起上政治宣传课和自我批判课。这是为学生和工班安排的课程；学生跟课堂报告，工人则跟办公室报告。

首先，我们要抄写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言，就像其他地方的人抄写圣经或可兰经的段落一样。接下来，要写下你上周做过的所有事，再来每个人都要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批判自己。一开始我通常会说：“这一周我太骄纵，对慈悲的伟大领袖永恒不变且无条件的爱，不够心怀感激。”我还会说我工作不够勤劳，没能完成党要我们达成的目标，或是不够用功、不够爱我的同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共同抵抗“美国坏蛋”或“西方豺狼”。最后的结论我会说：“然而，我们伟大的领袖心胸宽大，原谅了我，我对他感激不尽，下周一定会做得更好！”

公开告解、自我批判完之后，就开始批判别人。我每次都会跳来自愿，因为那是我的拿手强项。通常我会挑一个同班同学，那人就得站起来，仔细听我条列他的不是，比方没有遵照领袖的教诲，或是没参与团体任务。我说完之后，挨批的人要谢谢我，跟大家保证他会改进。最后轮到我被批判，我当然讨厌被批判，但绝不会显露在脸上。

惠山的自我批斗大会有时场面很激烈，在高原更是变本加厉。这个偏远小镇的居民都很爱国，真的以为自己是革命斗士。他们没有受到太多外在世界的刺激，对国家的忠贞也就没有因此打了折扣。当局也决心尽可能保持这种风气。



我快满十岁了，妈妈帮我报名了当地的中学，虽然我少读了两年小学。学校的作业我有看没有懂，而且高原的学校比之前我在惠山读的学校严格很多。这里的学生从来不单独行动，早上大家一起完成打扫街道或擦拭雕像这些劳动服务之后，就要排队进教室，整齐画一地甩手，高声齐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片光明！我们是崭新的一代！”放学回家时，同样的步骤再重复一次。

朝鲜的学童除了读书，还有别的工作。学童也是避免国家彻底崩溃的免费劳动力之一。我的书包里随时得多放一套工作服，因为学校可能派我们去做劳动服务。春天，我们会到集体农场帮忙种田，工作包括清除田里的小石头、播种，还有提水。六、七月我们会帮忙除草，秋天则是到田里捡收割后剩下的谷粒或豆子。我们的小手很适合做这件事。我讨厌这项工作，但老师说现在还有人吃不饱，所以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到田里帮忙干活的我，只有在发现老鼠洞时才觉得开心，因为老鼠跟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挖开老鼠洞，你可能会发现它们储存的谷粒或豆子，幸运的话还能抓到老鼠。不过，我们在田里捡到的谷粒都归学校，没我们的份。放学时，老师会收走我们找到的谷粒。他们不希望我们藏起来带回家，于是叫大家排成一排，然后说：“口袋翻出来！”我们学会把制服穿在工作服里面，这样就可以把一些谷粒藏在底层，带回家吃。

肥料短缺是朝鲜的一大问题。一九九〇年代朝鲜的经济崩溃，苏联不再运送肥料到朝鲜，国内的工厂也停止制造肥料。其他国家捐赠的肥料送不到农场，因为连运输系统也停摆了。农作物因此歉收，饥荒也更加恶化。政府于是想出一个利用当地再生资源来填补肥料断层的方法：人类和动物的粪便。每个工人和学童都要收集到一定的量。你可以想像



这对我们家有多辛苦。家里每个人每天都要交功课，早上起床就像在打仗一样。最认真的是我舅妈和阿姨。

“记得别在学校大号！”高原的舅妈每天都叮咛我。“等回家再上！”

住松南里的阿姨每次出门、不得不在外面大号时，就会大声抱怨她没带塑胶袋，不然就可以存起来。“下次我要记得！”她说。谢天谢地她从没真的这么做。

这股粪便收集热潮在一月达到颠峰，这样一来，到了耕种季节就能派上用场。我们在朝鲜的厕所通常和住家有段距离，得提防邻居晚上来偷拿。有些人为了防贼，还把户外厕所上锁。学校老师会叫我们到街上捡粪便带回教室，所以在街上看到狗大便，对我们来说就像看到黄金。高原的舅舅养了一只大狗，大便很大一坨，家里每个人都抢着要。这在西方可不是每天会看到的新鲜事。

我妈在高原做过各种工作，包括脸部按摩、绣眉毛、在黑市买卖卡式录像带和电视机，但我们还是吃不饱。我跟姐姐又去田野间找野生植物和昆虫来填肚子。我喜欢满山遍野的刺槐长出的甜甜白色花朵，不过最棒的还是蚱蜢。我的运动神经随着年龄渐渐进步，抓蚱蜢成了我的强项。妈妈会把蚱蜢炸来吃，非常可口！

不过，野外找到的食物通常不太适合人类吃，只能用来填填肚子。在山丘上漫步时，我会摘很多不同种类的叶子，一些自己吃，一些留给家里养的兔子。兔子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会把食物分给它们。即使到现在，到野外散步时，我还是认得出哪些植物是兔子的最爱。不过，至今我还是不太喜欢生菜沙拉，因为那会让我想起以前的苦日子。

住在高原的日子，我从兔子还是兔宝宝时就养起，还帮它们取“红

眼睛”、“小黑”、“小金”之类的名字。不过它们不是宠物，因为时候到了，我们就会剥了它们的皮，把它们煮来吃。大多数时候，兔肉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肉。连兔毛都很值钱。朝鲜的各级学校都要收集兔毛，供应军方制作军人的冬天制服。每个学生每学期都要交五副兔毛。但鞣制兔毛皮并不容易，军方要求的标准又很高，所以校方常拒收品质不佳的毛皮。唯一能确保自己达到定额的方法，就是去市场买专业鞣制的毛皮。校方当然不会把所有兔毛都交给军方，因为留下一些还可以卖钱。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也做买卖兔毛的生意，有时候她还会从学校那里买到她不久前才卖给客人拿去交差的兔毛。

这个荒谬的机制便宜了我妈，却让其他人都叫苦连天。

大约在我十一岁那年，也开始学爸妈做起生意。妈妈给了我一小笔“创业基金”。我拿这笔钱去买米酒，再拿酒去贿赂看守柿子园（归国家所有）的守卫。他让我跟姐姐溜进去摘柿子。我们摘了一大桶，再走好几哩路把柿子扛回高原，拿到市场去卖。

“来买超级好吃的柿子呦！”我对着路过的行人喊：“来买呦！”那天我赚的钱，不但够把本金还给妈妈，还能拿去买糖果，以及另一瓶用来贿赂果园守卫的米酒。就这样，我们做起了卖柿子的生意，后来我妈发现我们来回果园、很快就把鞋子穿坏，她又买不起新鞋给我们，才作罢。

尽管如此，那段在市场摆摊的短暂日子，我还是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旦自己做起买卖，你就会开始为自己着想。在公共配给系统崩解之前，谁存活、谁挨饿都由政府决定，但后来市场夺走了政府的掌控权。短暂的市场交易经验让我体悟到，原来我对自己的命运还有些掌控

权。我也因此尝到一点点自由的滋味。

## 9 黑市世代

二〇〇五年秋天，我妈得开始躲躲藏藏，因为高原的警察在找她麻烦。

朝鲜人民不能自由选择居所。离开指定居住地必须得到政府核准，但当局不会让你轻易拿到许可，只有调职、结婚或离婚例外。即使我妈在现今住的老家（如今归舅舅所有）出生、长大，她的法定居住地仍是惠山。小孩非法迁移还无所谓，像她这样的大人就会有麻烦。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平安无事，因为舅舅是党员，舅妈又是人民班的班长，他们跟地方当局的关系不错。每隔一阵子，警察就会上门要妈妈去警局一趟，强烈暗示要她贿赂，不然她的事就得公事公办。只是我妈很忙，没多留意他们的暗示。警察拖了好一段时间，最后决定把她送去再教育营接受惩罚。我妈一发现警察在找她，就跑去朋友家里躲起来。因为如此，我爸出现在舅舅家门前的那个晴朗下午，我妈才会不在家。

当时恩美去上学，我一个人待在我们母女三人住的小房间里。我听到外面的狗在狂吠，接着听到一个男人在跟舅舅说话，那一刻我的心跳停止了，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好熟悉，但我不敢相信是爸爸的声音。他在牢里已经将近三年，我从没期待会再见到他。后来我听到舅舅喊：“研美！研美！你爸爸回来了！”

我跑进主屋，看见一个陌生人跟舅舅站在一起。

“爸爸？”我轻声喊：“爸爸？”

我已经很久不让自己说出这两个字，现在说出口感觉好奇怪。我仔细一看，真的是爸爸，但他整个人瘦了一圈，而且头发剃光光。以前我

总觉得他是全世界最高大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什么都难不倒他，但眼前的他看起来好瘦小。更糟糕的是，他的声音细小又害怕，我差点认不出来。我站在他面前，他伸手摸我的脸和头发，像盲人用点字看书，一边说：“真的是研美吗？真的是研美吗？”

他没哭，只是看着我。我已经十二岁，不再是个孩子，都快变少女了。“真的是你吗，我的女儿？”

我好想扑进他的怀里，紧紧抱住他，可是我们寄人篱下，我不敢表现出自己看到爸爸有多开心。以前舅舅跟爸爸是好朋友，现在却很讨厌他，常说他的坏话。他怪我爸不负责任，被捕入狱害得妻女成了别人的负担。我爸有钱有势的时候，大家都尊敬他，现在却这样对他，我觉得很难过。但过了一会儿，我再也压抑不了心里的激动，冲上去紧紧抱住爸爸，很怕他又会离开我们。

爸爸入狱之后，我就不再像小孩一样撒娇。现在他回来了，我无论什么时候都坐在他腿上，就像儿时一样。我想回到童年，做那时候会做的事。以前我会坐在爸爸的膝盖上，像马一样弹跳。我想重温那种感觉，甚至要求他用脚把我举起来，像在坐飞机。可怜的爸爸努力配合我，但很快就把我放下来，说：“哎呀！我的小可爱真的长大了！”“小可爱”是我年幼时的小名，再次听到它从爸爸嘴里说出来，我不禁红了眼眶。

恩美放学回家后，我们找人去通知我妈。爸爸跟我们说他病得很重，因为塞了钱给典狱长，才能暂时请假出狱。

帮爸爸换衣服时，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我们非常惊讶。他的骨头清晰可见，皮肤也因为营养不良片片剥落。我妈要我跑去买些豆腐水回来帮他洗澡，帮助伤口愈合。他饿坏了，什么都想吃，但饿了那么久，身

体一下子根本负荷不了。所以我们得看着他，确保他一次只吃一点点饭，免得吃太快弄坏了身体。

等到他渐渐恢复、说话不那么吃力，他才跟妈妈说他出狱的过程。

典狱长知道他是因为重大的商业罪行入狱，而爸爸也骗他说，他把一些钱藏在惠山的一个女人那里，如果典狱长让他请病假，他愿意给他一百万元当作谢礼。那是很大一笔钱，都够买一栋好房子了。见钱眼开的典狱长信了他的话，只是我爸根本没打算付他钱，就算有钱也一样。他推算只要他因病出狱，狱方就会害怕受贿情事曝光，不敢贸然将他抓回监狱。过一阵子，狱方或许会说我爸已经好转，可以重回监狱，但这等到以后再烦恼了。

我爸说服典狱长先让他回高原探亲，再到惠山拿钱。到高原他会去找他二哥，请他帮忙找医生治疗他日渐恶化的肠胃毛病。典狱长派一名狱医与他同行，表面上是要护送他回惠山，真正的目的当然是拿钱。但是他不会得逞的，因为根本没这笔钱。

我爸在高原待了几天就前往惠山。他在那里安顿好，就会派人来接我们。

这段期间，我妈决定到警局自首，后来她被送到名为“工人训练所”的地方接受一个月的再教育。那里就像流动式的劳改营，犯人都睡在一间爬满虱子的房间，白天被送去造桥或到大型工地做工。我妈那一队只有几个女人，但守卫都把她们当男人一样使唤。只要有人动作太慢，整队就会被罚晚上绕着营房跑，不准睡觉。为了不让这种事发生，犯人看到谁动作太慢就会去揍他一顿，根本用不着守卫出手。由于工作速度快到让人受不了，有些囚犯待了几个月就只剩半条命。我妈开始服刑时，秋天已经接近尾声，她冒着寒风在户外做工，没戴手套，身上只



穿一件薄夹克。

有时工地在很远的地方，但要是离高原近一点，我跟姐姐会去工地看她。我们第一次去，早上五点就起床煮饭，好带去给她吃。我们知道犯人在营中永远吃不饱。我煮了一小颗南瓜，把米和玉米加进去。我还切了一些白萝卜，然后用盐腌过。腌萝卜是穷人的泡菜。我们买不起腌传统泡菜用的辣酱。

我们从早上六点、天还没亮时开始走，半路却转错弯，而且愈走愈饿，便吃起我们带来的食物。等走到工地，东西都被吃光了。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但妈妈看到我们好高兴。她还是我们熟悉的妈妈，担心我们更甚于担心自己，还拿水给我们喝。守卫只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团聚，我们只要可以就会来看她，顺便带食物来给她吃。

幸好我妈在工人训练所服刑的时间不长。她贿赂了警局里的某个人，所以十六天就出来了。回到高原休息几天之后，她搭火车回惠山看我爸。她知道只要她的合法居住地还在惠山，警察就会缠着她不放。所以解决此事的唯一办法，就是趁我爸还活着跟他离婚。他们还爱着对方，但两人私下说好，离婚只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他不得不回监狱，我们一家人住在高原会比较适合，因为那里比惠山温暖，花费也比较省。所以他们很快地采取行动，在二〇〇六年四月正式离婚。

另一方面，爸爸有个朋友让他免费借住一个地方，等他有钱再付清。他计划在我妈的帮忙下，重新把生意做起来。他希望我们暂时搬回去跟他一起住。五月时，我自己搭火车北上去找爸爸；几个月后，妈妈和恩美也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团圆。



我爸住的公寓位在渭渊郊区一栋八楼公寓的顶楼，就在惠山老家以东几哩远的地方。从公寓可以俯瞰鸭绿江，窗户看出去就是中国。总共三个房间，我们跟另外两家人合住。墙壁很薄，所以说话要非常小声，不然大家都会听到。公寓没有电梯，我们得在漆黑的楼梯间爬上八楼才能到家。这也是为什么在朝鲜，楼层愈低的公寓愈抢手。换句话说，钱愈少就住得愈高。

爸爸去医院做了肠胃检查，但医生仍找不出病因。他陷入了两难，一来他想工作却病到无法工作，二来如果他好起来就得回监狱，最后弄得不上不下，处境很尴尬。他的身分证在入狱时就被销毁，因为只有人才有资格拥有身分证，而他被视为低等人。没有身分证寸步难行，他也无法出门买进金属再转卖给走私客。此外，他常常得去跟警察报告，警察也随时留意他的一举一动。他只能待在家照顾我和姐姐，由我妈接管他的生意。

供我爸爸地方住的朋友愿意出一点钱，赞助我妈提议的事业。她跟对方的儿子一起到松南里附近的一个地方买银，再带回惠山卖给走私客。爸妈靠这些买卖赚了一笔小钱，但我们还是很穷，经常只有发黑的冷冻土豆可吃，爸爸的病也因此更加恶化。

搬离惠山之后，我很想念那里，迫不及待想要再见到儿时的朋友。莹子长大好多，变得好高（至少以朝鲜人的标准来看）。她从以前就很强壮，现在学了跆拳道，甚至比以前更强悍。跟她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因为我离开的这三年，惠山变了很多。由于跟中国合法或不合法的交易往来，惠山变得更热闹也更繁荣。年轻人的打扮和举止也变得很不一样。大一点的女生会用从边境走私进来的“Magic”发胶把头发弄直，还

有人染发、穿牛仔裤。穿牛仔裤在朝鲜是非法的，因为牛仔裤象征堕落的美国，要是被警察抓到，他们会拿出剪刀把裤子剪破，之后可能还会强迫你接受@天的再教育，或为期一周的劳动服务。尽管如此，也阻止不了年轻人尝试新事物。

莹子跟我说，青少年现在都在“约会”，其实就是男生、女生在一起消磨时间，这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连幼稚园小朋友都假装自己有男、女朋友。她教了我一些时下男女互动的新规矩。比方说，如果你从男生面前经过，他用嘴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除非你想跟他约会，不然不该转头看他。如果你转头看她，他就缠上你了。我搞不清楚状况，犯了好几次这种错误。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好土。莹子还笑我说话有高原腔。朝鲜内陆城市的人说话比边境城市的人慢很多。从高原回到惠山，就好像美国人从亚特兰大搬到纽约市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改掉高原腔。

我转进渭渊的中学念书，交了新朋友，多半是大我几岁的女生。这次我又跳过几个年级，程度落后其他人很多。恩美从高原回到这里已经十五岁，也重回学校上学，很快有自己的朋友圈，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常一起玩。此外，她也开始跟一个她喜欢的男生约会，对方的父亲是中国人。我妈一直劝她分手，因为他的出身成分不好，甚至比我们还糟。恩美听话照做，但还是免不了为此和家人冲突。

我的新朋友都从南韩连续剧和国外的音乐录像带得知最新的流行信息。没人家里有电脑，当然也没有网络非法下载国外影片，片子都是每天晚上从中国跨河偷渡过来的。轻薄的D V D取代了笨重的卡带，方便商人带更多货过来。几年前的涓涓细流，如今氾濫成灾。

我有些朋友家里的房间装了很厚的窗帘，方便看D V D，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房间里放电影、随着原声带的音乐起舞。我们也听录音带和C

D，只要是能弄到手的都不放过。我跟姐姐最喜欢伤心的情歌。我们最爱的一首歌说的是情投意合的两个人打勾勾，发誓永远对彼此死心塌地，其中一人却突然消失。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哭出来。

要不是有这些外国的D V D和C D，我们不会知道除了歌颂金日成和金正日以外的任何歌曲。有时我们会自己改歌词，把一首歌变得更有兴趣。有个常跟我们玩在一起的高年级男生会弹吉他，大家跟他一起弹弹唱唱时，会故意漏掉有关金氏家族的歌词。每次唱这些歌，我都觉得更加自由。没被逮到算我们好运，但我们都年轻，没多想未来的事。

我这一代或更年轻一代的朝鲜人有时会被称为“黑市世代”，因为我们从小跟着市场一起长大，完全不记得国家供应人民一切所需的年代，也不像父母那一代，盲目地效忠国家政权。然而，尽管市场经济和国外媒体减少我们对国家的依赖，我的脑袋还是没办法一下就跳脱现状，把我爱看的外国电影和连续剧当作可能成真的一种生活形态。

我快要进入青春期了，渐渐对恋爱感到好奇。我跟姐妹淘会幻想电影里的情侣看着彼此的眼睛、情话绵绵的画面。我们喜欢模仿电视里的人，如果有男生约我们出去，我们还会要求他们学南韩男生说话。不过，朝鲜的“约会”当然比我们看过最纯情的恋爱情节还要纯真。我只在电影上看过男、女主角谈恋爱，根本不知道当摄影机把镜头转开时，

《麻雀变凤凰》的女主角在干嘛。那时候我们都很单纯无知。我感兴趣的是电影里的漂亮衣服，我跟莹子还帮我们的纸娃娃依样画了几件。

说来丢脸，我从来不知道亲吻是男女之间的浪漫举动。小时候爸妈常亲我，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表达自己的亲情或爱意。朝鲜没有所谓的性教育。或许女生结婚前一天，母亲或医生会提起性事，但我自己从

来没听过。小时候我问过妈妈很多次我是怎么出生的，但她只说我长大了就会知道。我想男生也跟女生一样单纯无知。

在惠山，很少人家里有室内电话，只有有钱人才拿手机。男生要约心仪的女生出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当面问她。但是父母当然不希望女儿跟男生出去，他们那一代还是把约会看成一件丢脸的事，所以男生得想办法克服这个障碍。我知道有几个男生想约我，每个都曾试着爬上八层楼梯，来敲我们家的门。

我妈会很生气，隔着门怒吼：“滚出去！走开！”她不让我出门。男生为了躲我妈，会在学校先告诉我暗号，傍晚再到我家楼下大喊暗号，我听到之后便会找借口下楼。当然也有男生想约我姐姐，加上我们住的公寓也住了很多年轻女孩，所以太阳下山之后外面会有很多杂音。

我一直对约会没什么兴趣，直到遇上我的初恋情人春健（Chun Guen）。那年他十八岁，比我大五岁，上的学校是集合两江道最优秀学生的特级中学，再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比一般的韩国男人高，皮肤白，说话轻声细语。有一次我去他住的大楼（就在我们家隔壁）找亲戚时跟他巧遇，之后我们还在走廊或街上碰到。一开始，他只是对我点点头或打声招呼。有一天他突然开口约我出去，我很想答应，但还是狠心拒绝了。我知道我们之间只会悲剧收场。

我们家不久前才搬来这里，所以春健不知道我是罪犯的女儿。他家有錢有勢，父亲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现在是杰出的大学农业教授。母亲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劳动党担任高官。要是他父母发现我们在一起，他一定会有大麻烦。如果他要跟我认真交往或结婚，那么他的一生就毁了，不但无法加入劳动党，也无法到顶尖的大学念书或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我会像个伤口、像个累赘一样拖累他。所以我一再拒绝

他。

但他还是不肯死心。于是有一天，我答应去参加在他们家办的一场派对。那天他父母不在，而且还有很多他们学校的同学，我想应该没关系。我是里头年纪最小、肯定也是最穷的客人。突然间我强烈意识到自己身上穿的破旧二手衣，还有裤子上的破洞。韩国人进到别人家里会脱鞋，大家都看得到我的丑袜子补过多少次。置身在这些富家子弟间，让我觉得无地自容。

春健家的公寓感觉好大，大小跟我们家一样，但只住了一户人家，而不是三个家庭。看到垃圾桶里有柳丁皮和蛋壳，让我很惊讶。鸡蛋在我们家是少见的人间美味，只有新年和特殊日子才会吃。柳丁更是奢侈品，印象中我从没吃过完整的一颗。我们还很富有的时候，爸爸曾经带一颗回来，我只吃了一小片。再说，把皮丢掉真是浪费。

我努力假装自己属于那里，假装自己听得懂大家说的话。春健正在解释他在学校怎么用电脑，我礼貌地点头微笑，尽管我一台也没看过。朝鲜的一般学校都没有电脑。我觉得很困窘，莫名其妙地生春健的气，便提早告退。出了门，我一路跑回家。

我想一切都结束了，但春健很有耐心也从不记恨。每次看到他，我的胸口都一阵刺痛，但不是因为肚子饿。我有时会答应跟他见面，条件是他得保密。我们会等到天色全黑才见面，要是让邻居看到我们在一起，他会陷入险境。如果在路上看到对方，我们其中一个就会故意走到另一边或是改走另一个方向。

春健查出我住的地方，某天晚上他来敲我家的门。爸妈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妈觉得他大方有礼又聪明，我爸还叫我请他来家里吃晚饭，但我拒绝了。我不希望他看到我们家有多穷，而且我还没告诉他我



爸是罪犯。何必呢？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嫁给他那样的人。我的未来一片黯淡，我上不了大学，说不定最后只会当一个苦哈哈的农夫妻子——如果我没先饿死的话。

冬天到了，我们家的情况愈来愈不乐观。老旧的铁路系统都靠电力运转，现在北方供电吃紧，电力很弱，从平壤开来的火车还没到惠山就得靠站，再掉头往回开。过了一阵子，火车完全停驶，我父母等了又等都等不到火车。现在从平壤带金属回来只能靠汽车，但那根本不可能。爸妈没货可以卖，也没人肯再借他们钱，他们只好把留着做生意的资金拿出来用，但钱很快就花光了。

风都从河那边吹过来，我们的公寓冷得像冰库。爸爸每天必须上山找木柴回来生火取暖，饿了就吃雪果腹。妈妈什么小买卖都做，但也只能买一些玉米或冷冻土豆回来。现在我们随时处于饥饿的状态，我不再幻想能吃到面包，只要下一顿有东西吃就好了。少吃一餐就可能饿死，那成了我最大的恐惧和执念。你不再在意食物的味道，也不再感觉到吃东西的乐趣，只剩下存活下去的动物本能。吃东西时，你不知不觉会计算每一口食物能让身体撑多久。

我父母辗转难眠，担心自己醒不来，也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活活饿死。晚上他们清醒地躺在床上时，又开始思索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活下来。

## 10中国的灯火

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二〇〇七年二月，我们在二伯家过农历年时，再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小时候，我爸爸是家族里最有钱的人，大家都会来我们家过年。现在二伯家比较好过，过年就由他作东。然而，二伯没把我爸当弟弟看待，反而把他当佣人一样使唤。事实上，爸爸出狱回到惠山借住二伯父、二伯母家那几个月，他们还要他帮忙打扫家里。他们怪爸爸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出身成分本来就不佳，现在我爸又成了罪犯，让他们更抬不起头。连堂哥、堂姐都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对我爸没大没小。新年期间，他们甚至不让过去到我家跟我爸一起喝酒吃饭的邻居跟他坐在一起聊天。那天晚上对我爸来说宛如苦刑，但是他又能如何呢？

入狱之前，我爸是个聪明、风趣又爱开玩笑的人。即使我才十三岁，也看得出来他服刑期间精神大受打击。他不敢直视警察的眼睛，即使是曾经到我们家跟他喝酒谈笑的警察也是。我爸以前很爱听南韩的音乐，现在却拒听，只因怕有人听到会去告发他。出狱后他只唱一首歌，那就是〈国家比生命贵重〉，有段歌词是“蓊郁森林在高山绿野奔放，我却一棵树也没种下……”，他跟我儿时记忆中的爸爸判若两人。

新年过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对我来说简直如释重负。

二伯家离我们住的公寓大楼有两哩半的路程。爸爸还留在二伯家，我跟妈妈和姐姐沿着幽暗的河自己走路回家，单靠对岸中国燃放烟火指引。我住在朝鲜，一个理应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伟大国家，心里却羡慕极了住在河对岸的中国人。我还是不敢想为什么朝鲜这里不像他们那里



什么都有，但我知道我想去有灯光和食物的地方。我就像一只飞蛾，不由自主地被火焰吸引，却没去想背后的原因。要是当时我知道那些灯火对我这样的朝鲜人代表什么意义就好了。追随那个灯火，日后将赔上我的纯真，甚至人性。

每年新年，金正日会发表一份人民必须背诵下来的新年声明。二〇〇七年的声明跟之前大同小异：朝鲜人民变得更为强大，我们会击败敌人，经济会逐渐好转。但我们再也无法相信这些宣传辞令，因为生活愈来愈难熬。我父母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在这里不会有未来，两人开始讨论出路。

我们认识一个到俄罗斯工作的人。虽然是去做苦工，起码他吃得饱，没饿肚子，还赚了钱，回国后甚至用这笔钱成功创业。爸爸还认识另一个人被派到利比亚当劳工，帮国家赚取外币。回来之后，说他在那里的生活很孤单，三年没见过家人，但至少东西吃，有时还吃得到鸡翅。

我们都饿坏了，想听他说每个细节。他说利比亚人吃很多鸡肉（我们很吃惊），但他们通常不会整只鸡都吃，而是把鸡翅切掉，便宜卖出，便宜到连朝鲜人都买得起。利比亚听起来就像天堂。我爸一直想出国，希望在国外赚到钱寄回家，但是他以前没抓住机会，现在更不可能。

朝鲜人从小被灌输一个观念，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很邪恶、可憎又危险。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南韩，那里是个人渣池，是全民都该唾弃、恐惧的美国坏蛋统治下的贫穷殖民地。我爸没兴趣去南韩，但中国就不一样了。如果有办法过河，我们说不定有机会。

爸妈窃窃私语商量着他们现有的选择，声音小到连老鼠都听不见。我们还有亲戚住在中国，但爸妈联络不到他们。或许只要想办法越境，就能找到亲戚帮我们的忙。我们都知道他们在中国过得很好，也看过中国的电视和电视广告的各种奢侈品。我们认识一些去过中国的人，包括二伯，他们说中国人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也有传闻说，朝鲜的年轻女人在中国很好找工作。最近有些青少女突然不见人影，大家私下都说她们去了中国。或许我跟恩美也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我妈还听说中国的小孩太少，我和姐姐年纪还小，说不定找得到愿意收养我们的家庭。

但是在一个没有网络或外界报纸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得到可靠的消息。你要是问东问西，可能被人举报，所以我们不确定那些传闻是真是假。爸妈虽然熟悉黑市，但他们只跟带货到中国的走私客做生意，在中国没有自己的联络人。一般的走私客不做人口买卖，那种交易比一般交易危险许多。再说，要突破层层监视、自己过河，实在太冒险了。我们需要找个掮客先买通边境卫兵，带我们过河。问题是，要到哪里找这样的人？

爸妈要我跟恩美明察暗访，弄清楚其他女生都怎么去中国。爸爸也劝妈妈如果找到门道，干脆跟我们一起走。他说他会留下来，因为他在中国应该找不到工作。此外，爸爸也担心他逃走会害到朝鲜的家人。如果是女性逃到中国，政府不会太当一回事，家属通常不会受罚。如果叛逃的是男性，政府就会严惩他的兄弟姐妹和家人。他们可能会失去医生和教授的职业，甚至坐牢。即使二伯对他那么坏，爸爸的心还是向着家人。

再说，爸爸不觉得我们会跑很远。“你们到中国安顿下来之后，新年就到河边来。”他对我们说：“到我们常去游泳和洗衣服的河边，我在

那里等你们。”

于是，我跟姐姐开始跟朋友打听消息，我也竖起耳朵留意周遭的动静。某天，我无意中听到邻里一个女人跟朋友说一件奇怪的事。她说她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过了河到中国之后，去敲长白市人家的门。有户人家让她进门，给她好吃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后来希望她嫁给他们的儿子，她听了很不高兴，就想办法从原路逃回惠山，不幸被边境卫兵逮到。有个邻居说这女孩真笨，竟然拒绝了这种好事。

我听不懂她意指何事。

如今回想起来，我很纳闷我们怎么会那么天真。那时我们甚至对“人口买卖”一无所知，无法想像把人卖掉如此邪恶的事。我们也不懂批判性思考，因为从小到大所受的训练都要我们别问问题。事实上，我以为只要平安过河、不被卫兵逮到或射杀，一切就会没事。话又说回来，当你饿到不顾一切，什么危险你都不会怕，只要能活下来。

即使在计划逃亡期间，我还是偷偷跟春健见面。我们之间是纯纯的爱，甚至没牵过手。某天晚上我们的公寓正好全黑，我们站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有扇打开的窗户正好对着鸭绿江。长白市的灯光一如往常在远方闪闪发亮。我觉得冷，他把他的夹克披在我肩上，把我搂进怀里。

我问他：“住在那么明亮的地方，会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他说。

我不能把我们的逃亡计划告诉他。反正无所谓，我知道他四月就要去当兵了。朝鲜年轻人通常要服十年兵役，但因为他们的背景好，他只需服役两年。退伍之后，他会去上大学，大好前程已经在前方等着他，他却说他希望我等他。我们刚刚搬来这里，他还没听过我爸的

事。“给我八年，研美。”他说：“等我八年，我就把你娶回家。”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每个月回来看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都碎了。那些我梦寐以求的灯光突然间看起来好残酷。

隔天早上，春健来接我一起去逛惠山的市场。那天天气不好，他叫了一辆摩托计程车来载我们。那跟一般摩托车有点不同，有四个轮子，后面还有开放式后座。我们爬进后座，盖上帆布避雨。到了市场，他要我挑一条喜欢的项链。我选了一条钥匙形状的项链。他说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我的心，而他就是钥匙的主人。我对他笑了笑，内心却像石头一样冰冷。

我找不到掮客带我们去中国，但恩美认为她找到人了。她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她说我们得尽快行动。春天快到了，不快点走，江水就会开始融化。

只是我们还没订好计划，某天早上醒来我发起高烧。“怎么了，孩子？”我远远听到妈妈的声音，却难受得张不开眼睛。之后我开始呕吐，不久全身起了大片红疹。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听说有种可怕的病毒从中国传进来，大家都束手无策。妈妈跟人借钱买药给我吃，过了几天我还是毫无起色。我的肚子好痛，什么都吃不下，瘦弱到连走路都有困难。所以他们把我带到医院。

医生帮我检查过后，判断是盲肠炎，要帮我割盲肠。因为我爸年轻时也得过盲肠炎，爸妈都认为除非开刀，不然我一定会没命。照理说，我们享有免费的医疗服务，医生竟要我们支付开刀费用。听起来很无情，但政府几乎没给医生任何资源，索贿是他们唯一能存活的方法。后来爸妈不知是怎么说服了医生，他们答应只要我们提供开刀所需的麻醉

药和抗生素，医院就愿意帮我开刀。我妈回到我们以前住的街坊，跟金锤爱（住我们隔壁的好心妇人）借了两万元，再拿着这笔钱到黑市买药。

然而，医生开了刀才发现我的问题不在盲肠，而是肠子严重发炎。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帮我割了盲肠，打了很多抗生素，再帮我缝合。只是他们帮我打的麻醉药太轻，手术还没结束我就醒过来。言语也无法形容我当时有多痛。我痛得哇哇大叫，他们还得压住我才行。我以为自己会疯掉，但他们终究完成了手术。后来，我妈带一些止痛药给我，我终于昏了过去。

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只知道自己在医院的病房里，妈妈坐在我旁边。床位都满了，所以我躺在地上的栈板上。妈妈摸着我的手，过一会儿，我发现手上戴着戒指，是一枚金色的戒指，上面镶着小小的玻璃钻。

“妈，这哪来的？”我昏昏沉沉地问。

“你睡觉的时候，春健来过。”她说。他给我带了果汁和零嘴，还有我手上的戒指，打算开完刀给我一个惊喜。但是我睡了好久都没醒来。妈妈说他握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走之前就把戒指戴在我的手上。

后来他来看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手。

“研美，看到你戴着戒指，我很开心。”他说。

我努力挤出笑容，让他看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有多松。“太大了。”我说。

“那么你得好起来，吃胖一点。”

我住院时，他几乎每天来看我，而每次看到他，我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没钱贿赂医院，护士都不理我，妈妈只好留在身旁照顾

我。她从照顾伤口到找食物喂我吃，什么事都得做。医院的设备差，环境又脏乱，每次去上厕所，我都得爬起来穿过一个开放的院子，走到户外厕所。一开始我还站不起来，后来我能自己走去厕所时才发现，医院竟然把遗体停放在院子里。住院那段期间，好多具遗体像木材一样堆在我的病房和户外厕所之间。更恐怖的是不分日夜啃食那些遗体的老鼠。那是我看过最骇人的画面。老鼠最先吃的是眼睛，因为那是人体最柔软的部分。到现在，我还看得到那些空洞的红眼睛，它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我害怕得失声尖叫，从梦中惊醒。

我妈不敢相信医院就这样把尸体丢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为什么不能把尸体运去埋了？”她问一个路过的护士。

护士耸耸肩。“要满七具，政府才会来收尸体，现在只有五具。”说完她就走掉了。

妈妈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朝鲜是一个好国家。看见自己的国家变得如此腐败、无情，她既震惊又难过。现在她更加确定不能让女儿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我们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

医生说我要在这间可怕的医院住七天，才能帮我拆线。那时已经快三月底，再不过河，河水就要融化了。但是我身体还太虚弱，没办法远行。

三月二十五日，我预定出院的前一天，姐姐来医院看我，妈妈也在医院里陪我。姐姐说她不能再等下去了，所以她找了一名掮客带她去中国。她已经十六岁，开始有自己的主张。尽管妈妈把她拉到一边，求她等等我，恩美却说：“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跟朋友的姐姐过去。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就没望了。”我妈觉得，恩美似乎认为到中国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去另一边看一看，或许马上就会回来。妈妈觉得这样的



心态不正确，但她无法说服恩美留下来。

那天晚上，恩美又跑来医院。“我们今天晚上走不了。”她说。

“看吧，要逃走没那么容易！”妈妈说。

“等着瞧。”姐姐说：“我们已经约好明天晚上走。”

## 11 姐姐失踪

隔天，二伯借了一辆车来医院载我回家。爸妈希望医生帮我拆线，让我回家，但他们不肯。因为我们还欠他们钱，我得再住一晚。

当天稍晚，姐姐跟她朋友来医院一趟。恩美穿着轻薄的黑色衣服，头发扎在后面。听说我还不能出院，她怕其他人听见，悄声对妈妈说：“对不起，我今晚就要走了。”

妈妈不相信她自己办得到，只说：“好吧，你会回来的。”她没抱抱她，甚至没说再见，为此她悔恨了好多年。想起那一晚，我到现在还是会流下眼泪。当时我们不知道恩美有多想离开。那天，爸爸特地做了一道菜给我吃，是土豆泥加香料油炸而成，很少见也很贵。爸爸看我瘦成那样，好多天没吃固体食物，才特别做了这道菜，让恩美带给我。但那天晚上我很不舒服，根本吃不下。

“姐，我不饿。”我说。

“那我吃掉，你介意吗？”

“不会啊，你吃。”我说。

恩美坐在我旁边，一口接着一口把薯饼塞进嘴巴，一副怕人把食物抢走似的。

“好好吃。”过了一会儿她说：“别跟爸说是我吃掉了。”

“好，我答应你。”

想起那段时间还是让人心痛。所有人心里想的只有吃。

那天晚上，妈留下来陪我。恩美没来，我们以为她大概回家了。但清晨五点我爸走进病房时，整个人都在发抖。

“恩美呢？”他问：“她在这里吗？”

“没有。”我妈说：“她没跟你在一起？”

“没有。”他说：“她整晚都没回家。”

恩美走了。妈妈从没想过她会自己行动，心里很自责，难过到喘不过气。爸爸拧着手。恩美要是掉进冰冷的河水淹死了怎么办？他们要是找不到她的尸体该怎么办？爸妈说要立刻去找她，我得马上出院。他们去找医生不断地求他，最后他终于帮我拆线。

我还是没力气走路，但春健前一晚过来时，主动提出要来带我出院。看到他带来一个有摩托车的朋友，我好高兴。他朋友在外面等，我们单独在病房里相处了一会儿。春健终于坦承他知道我们家的背景。住他那栋楼的一些女生知道他来医院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跟他说了我爸坐牢的事。但他说他不介意，还是希望我嫁给他。他是个很乐观的人，有自信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这样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他愿意给我一点温暖、光亮和希望，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他。

我们一起走出医院，他的朋友发动摩托车。一路上，春健紧紧抓着我。我没办法爬楼梯，所以他背着我爬了八楼回到我家，一开始还很英勇，后来满身大汗。

“你好像变重了！”他咧嘴笑说。

我只敢微笑，因为大笑会很痛。

终于到家了，我还是不好意思请他进门，不想让他看到我们住得多寒酸。所以互道再见后，他就走了。

一进家门，我就看见爸妈挨着彼此坐在地上。还是没有恩美的消

息。爸爸默默流泪，身体前后摇晃。他不敢发出声音，怕邻居听到会知道我们家出事了。他们问起怎么没看到恩美，他就说：“她去找朋友了。”不能让邻居知道真相，不然他们会去告发我们。所以那天我们只能在家里等，期待恩美回来，同时担心她会遇到危险。各种想法掠过我们脑海。什么都不知道是最大的煎熬。

我虚弱又疲倦，本想直接上床睡觉，却意外发现恩美在我的枕头下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去找这个太太，她会带你去中国。”她留下一个地址，就在渭渊火车站对面的河岸附近。

隔天早上，爸妈带着恩美留下的字条，去找跟恩美一起逃走的女生的家人。之后，两家人一起去找恩美留下的地址。有个女人来开门，我妈问她：“我们的女儿在哪里？你把她怎么了？”

女人摇摇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她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女儿。”

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先回家。

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恩美的消息。三月三十一日，我爸要我妈去帮他跑腿，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我还是很虚弱，不过可以走一点路，就跟她一起去了。她打算顺路去一趟恩美朋友的家，问问他们有没有女儿的消息。

到了那里，我们发现他们家像在办丧事一样气氛凝重。大家眼泪汪汪，女孩的母亲伤痛欲绝。“都是我的错。”她哭喊，说女儿一直在挨饿，无论给她什么都吃不饱。“我跟她说她吃太多了。要是知道她会这样不告而别，我就不会这样说她了。”她泪流不止，她丈夫求她平静下来。“再这样哭下去会死人的。”他说，但又低声对我和我妈说，他女儿走了也好，留在国内她根本活不了。有些住附近的女人说，如果有机会

会，她们也要去中国。

离开了他们家，妈妈想到另一个策略。她一心想确认恩美是否安抵中国，便要我独自去找那名掮客，跟她说我也想去中国。我们希望对方会让我进门，这样我就能察看屋里的状况。我们怀疑姐姐还在那间屋子里。

我去敲门时，上次那个女人又来开门。她大约四十出头，年纪跟我妈差不多，但她怀里抱着还在喝奶的婴儿，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我趁机往门内窥探，发现屋子破旧不堪，好像随时都会倒塌。看见我单独前来，她突然变得很亲切。我跟她说我想去中国，她说她可以安排。接着我把我妈叫来，但那女人挡住门口，没请我们进去，我们只好站在外面说话。这时候，她还是不承认她认识我姐，但似乎更积极地要赢得我们的信任。

“你们在这里等。”她说。

她绕到转角，等了一会儿才过来带我们走进一条巷子，介绍我们认识一个态度也很亲切的孕妇。

“如果你们想，今天晚上就可以过河。”那名孕妇说。

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想离开朝鲜。第一次去敲掮客家的门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点。但是当时我下定决心：我要去中国，妈妈也要一起去，而且今天就动身。我们原本的计划是我跟姐姐先去中国，但现在我知道我不能丢下妈妈。

我抓住妈妈的手，说：“妈，我们一定要走！不然就没机会了！”妈妈却想挣脱我的手。

“研美，我不能丢下你爸不管，他生病了。你要自己去。”

我抓住她的手不放。“不行，如果我放开你的手，你会死在朝鲜

的。你不走，我就不走！”

她哀求着说：“至少让我回家跟你爸说一声再来。”

我不肯让她离开，即使是回去告诉爸爸。爸爸一定会想办法阻止她，不然她自己也会改变心意。我知道只要让她离开我的视线，就再也看不到她了，所以我好说歹说，劝她无论如何都要跟我一起走。我跟她说我们会找到恩美，先在中国安顿下来，之后再接爸爸过来。在我的想像中，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回去，隔着江水跟爸爸挥手，就像以前在对岸问我饿不饿的中国小孩一样。不过最重要且真正要紧的是，明天我们就不用再担心没东西吃了。我不让她有选择的机会。

我握着妈妈的手，跟那名孕妇说：“如果我妈能一起来，我就走。”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走。”她说。

“那么我姐姐恩美呢？”我问：“到了那里，我们能找到她吗？”

“一定可以的。”女人说：“河对岸的朝鲜人都住在同一区，你们一定能找到她。”

我们不疑有他，因为在朝鲜就是如此，不同社群集中住在不同的区域，所以我们从没想过要问对方为什么要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用付她们任何钱。我们没想到可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母亲虽然在黑市工作，还是相信人。朝鲜人就是有一种我很难清楚解释的单纯天真。

那一天，我们在不同地点跑来跑去，那名孕妇带我们到惠山郊区的不同建筑物，要我们在外面等她。到了傍晚，我们躲进一间公厕，对方塞了些轻薄的深色衣服给我们，要我们换上。女人说，穿上这些衣服，我们看起来就会像过河走私货品的搬运工。如果被抓，这就是我们的说词。只要说有人付钱要我们到中国取包裹，我们打算拿了包裹马上回来。



之后她就消失了，两个年轻人从屋里走出来，带着我和我妈穿过后街和小巷离开市区。他们说如果走大路，会被人瞧见，那样可能会有大麻烦，所以带我们走山间小路（就是我们去捡木头的陡峭山丘），东绕西绕才回到河边。我开完刀不到两个礼拜，走这段路耗尽了体力。那两个年轻人走得很快，后来我的侧腹实在痛得受不了，稍微拖慢了速度。一开始，只有那两个年轻人帮我们带路，后来又来了另一人，比另外两个年纪更轻，却很像老大。他跟我们说了更多到中国后该注意的事。

“过了河之后，别跟任何人说你们的真实年龄。”他说：“我们跟对岸的人说，你们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八岁。太小或太老，他们都不收。也别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母女，他们没料想到是这样，可能会有麻烦。”

我觉得很奇怪，但我必须相信他们，才能得知逃到中国最保险的方法。当时我们已经走了一整天，天色渐暗，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对方也没拿东西给我们吃。后来，前两个人停下脚步，要我们跟着最年轻的那个走。他带我们走到悬崖边。天色很暗，但我们看得见底下有条大路，还有一段陡峭的河岸通往结冻的河面。

“跟着我走。”男孩说：“不管怎样都不能发出声音。”

## 第二部 中国

## 12黑暗的彼岸

过了河，我们没时间休息。就算通过了朝鲜卫兵那一关，我们还是可能随时被中国巡逻兵逮到，送回朝鲜。带路人要我们继续走，所以我跟妈妈尾随他爬上冰冻的河岸，走到一间黑漆漆的简陋小屋前。有个矮矮胖胖的秃头男人在那里等我们。

“这边，把你们的衣服给我，换上这些衣服。”他说。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长白市为数众多的朝鲜裔中国人之一。我们在黑暗中脱下衣服，换上另一套便宜的中国衣服。现在就算我们被拦下来，至少看起来像本地人。朝鲜带路人陪在我身旁，但那个秃头掮客把我妈拉到小屋旁边。

“别担心。”带路人跟我说：“一切都很顺利。”

但听起来却不是这样。我听到妈妈在哀求那个男人，接着响起我以前从未听过的可怕声音。

后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名掮客跟我妈说，他想跟我发生关系。那一刻，我妈的脑筋必须动得很快，不能让对方知道我是她女儿，而且才十三岁。他可能会把我们送回去，任由边境卫兵逮捕我们。最后妈妈跟他说我刚开完刀，还很虚弱，而且伤口会裂开。

“我会轻一点。”他说。

“不行！不可以！”我妈大喊。

“你是怎样？”他问：“干嘛替那个女孩操心？”

“我是她阿姨。”我妈说：“我们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

“现在是什么状况？”他说：“如果你们有问题，我们会直接把你们

送回去，让卫兵逮捕你们。”

“我们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她说：“让我代替她。”

他把我妈推倒在泥地上铺的一条毯子上（显然以前就使用过），强暴了她。

几分钟后，掳客跟妈妈从小屋一侧走出来，这时一辆车开过来。所有人都爬上去，我跟妈妈坐后座，车子沿着河开了一阵子。我感觉到事情很不对劲，但仍然不知道我妈为了保护我做了什么事。

“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一直忘了不能叫她“妈妈”。

“没事，别担心。”她说，但声音在颤抖。

我不习惯坐车，不久便晕车想吐。妈妈让我把头枕在她腿上，紧紧握住我的手。但车子转弯时，她叫我抬起头看。窗外可以看见对岸朝鲜的漆黑楼房。

“看，研美，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看见家乡了。”我妈说。

车子经过我们住的公寓大楼时，我的心揪了一下。我知道爸爸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家。我发誓我看见窗前的灯光一闪，好像是爸爸在对我打暗号。但妈妈说不是，那只是我的想像，那里从来就没有灯光。

我们的下一站是掳客在长白市住的公寓。

“现在是什么状况？”妈妈问年轻的朝鲜带路人。

“听这些人的话就对了，不会有事的。”他说。

秃头掳客的太太也是朝鲜族，腰部以下全部瘫痪。她母亲跟他们住在一起，帮忙照顾她。掳客的家里有电，他一看清我们的脸就勃然大怒。“她们根本不是十八岁和二十八岁。”他对我们的带路人咆哮。我妈努力圆谎，最后终于说服掳客她其实是三十四岁（她真实的年龄是四十一岁）。但他一看就知道我还是小孩。他打了通电话，用朝鲜文跟某个

人理论，我听得出来跟钱有关。

他太太坐在床上看着一切，终于把现实的状况解释给我们听。

“如果你想留在中国，就要卖给别人当老婆。”她跟我们说。

我们听了目瞪口呆。“卖掉”是什么意思？我无法想像一个人怎么可能“卖给”另一个人？我以为人只能买卖狗、鸡或其他动物，不能买卖人。“当老婆”又是什么意思？眼前发生的事让我难以置信。

看我们犹豫不决，她对我们失去了耐心。

“现在就决定！快点！”她催促我们。“卖掉还是回家，只能二选一。”

打从我抓住妈妈的手不让她走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从现在开始，做决定的人是我。我妈看着我，问：“你想怎么做？”

我想都没想就说：“我想吃东西。”我们一整天都没吃东西，而每件事都令人困惑又害怕，我关心的范围变得很狭窄。

“我知道，”她说：“但是研美，你想回朝鲜吗？”

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们被卖掉，至少我们会在同一个村子里。到了那里，我们可以再计划下一步。只要留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找恩美，还有东西可吃。

“我想留在中国。”我说。

“很好。”秃头掮客说。

“你知道我大女儿恩美的下落吗？”妈妈问：“她应该到了中国，但我们完全没有她的消息。”

秃头掮客说，他几天前应该接到两个女孩，但两人都没出现。我们来的前一天他才试过，但联络不到人。据他所知，她们应该还在朝鲜，他跟我们保证，那两个女孩很快就会到中国，我们会在许多脱北者聚集

的村子里见到面。

“好。”我说：“我们同意。”

他又打了一通电话，不久来了一个很胖的中国人和一个瘦巴巴、操着朝鲜口音的女人。他们跟秃头掮客坐下来，当着我们的面商量我们的价钱。胖子志方（Zhifang，编按：书中提到的中国老百姓名字都是音译）是人口贩运链的另一个中间商，最后人口贩子会把我们卖给我们未来的“丈夫”。我们得知，妈妈和女儿通常会一起卖掉，但卖的价钱比两个年轻健康、可分别卖掉的女人少很多。所以朝鲜的人口贩子跟秃头掮客说了谎，现在换秃头掮客跟中国的中间商说谎，隐瞒我们是母女的事实，还骗他已经十六岁，目的是为了拿到更高的价钱。

志方看着我问：“小妹妹，告诉我你的真实年龄！”

我个子娇小，很难说服他我有那么大，最后只好坦承我才十三岁。

“我就知道！”志方说。

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交易。起先朝鲜人用五百元人民币把我妈卖掉，大约相当于六十五美金（二〇〇七年的币值），志方则用相当于六百五十美金的金额买下妈妈。我最初的价钱相当于两百六十美金，之后以将近两千美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卖给志方。这个价钱会沿着人口交易链层层往上加。

我永远忘不了听他们议价时的强烈羞辱感。短短几小时内，我们从人变成商品，那种感觉超越了愤怒。要不是被卡在恐惧和希望之间无所适从，否则我无法想像为什么我们要忍受那种羞辱。我们全身麻木，所有想法都压缩到最迫切的需求：离开危险的边境地带。离开那个可恶的秃头掮客和他可怕的老婆。总之，先弄到东西吃，再把其他事情搞清楚。



一旦谈定价格，朝鲜带路人、志方和跟他一起来的女人便离开公寓。最后，他们终于拿出食物给我们母女吃。看到那个岳母把一整碗饭和一些腌辣黄瓜放在我面前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没在冬天看过小黄瓜，这个时候吃到简直有如奇迹。能自己吃一整碗饭也很不可思议。在朝鲜，我得把食物跟其他人分享，碗里总是得留点东西。在家里，把食物吃光既没礼貌又很丢脸，因为你明知道客人会吃你剩下的东西。但是在这里，米很充足，自己吃一整碗也不成问题。而且，公寓里的垃圾桶丢掉的食物，比我在惠山一个礼拜看到的还多。我突然对自己的决定非常满意。

清晨五点，大雪绕着公寓飞舞，有辆计程车停在转角。我们走出门，秃头掮客叫我到大门口等，然后他把我妈推到地上，像动物一样当着我的面强暴了她。我在妈妈的眼中看到巨大的恐惧，但是除了站在原地发抖，默默祈求一切赶快过去外，我别无他法。那就是我的性启蒙。

发泄完后，秃头掮客带我们去坐计程车，把我们推进后座。我跟我妈吓得说不出话。车里还坐了一个三十出头的朝鲜女人，她也才刚越过边境。志方的助理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她名叫勇善（Young Sun）。勇善跟我们说，我们被卖掉前要先去另一个地方。我跟妈妈抱在一起，努力镇定下来。我一路几乎都在晕车，车子开过中国乡下，大家很少说话。最后我们终于在一个似乎是大城市的郊区停了下来。我妈不会说中文也看不懂中文，但她在大学学过一点英文。她看到一个用中、英文标示的牌子，才知道我们到了吉林省的省会：长春。

我们已经察觉中国的空气不太一样。在朝鲜，我们住的地方笼罩在灰尘和燃烧垃圾散发的烟雾中。在中国，世界似乎变干净了，你闻得到

四面八方烧菜煮东西的香味。

勇善跟胖掇客志方住在一排朴素的公寓大楼里，但在我眼中算是很豪华了。一进门，她第一件事就问我们：“想吃什么？”

“鸡蛋！”我说：“我想吃蛋！”

自从爸爸被捕之后，我只吃过几口蛋，而且只有新年才吃得到。勇善一口气煎了五颗蛋放在我面前。我用柔软的面包把浓郁的蛋黄吸干时，对中国的印象更好了。

之后，我们听说了勇善的故事。她原本在朝鲜做走私生意，后来开始负债终至破产。志方问她愿不愿意到中国跟他一起住，他愿意给她工作。现在志方不再亲自运送他在边境买的女人，都由她出面，所以风险由她承担。他们两人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但没结婚。因为勇善没有合法权利也没有身分证明，随时会被逮到，遣返回国。

住在中国的脱北者几乎每天都活在恐惧中。越境逃到中国的朝鲜男性通常会到田里工作，赚取微薄的薪水，但是他们不敢吭声，因为雇用他们的农人只要通知警察，警察就会来逮捕他们，把他们遣送回国。中国政府不希望移民源源涌入，但又不想跟朝鲜领导人撕破脸。朝鲜不只是中国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边境上的核武国家，更是中国和南韩美军之间的重要缓冲。北京政府拒绝将脱北者视为难民，而是当作非法的“经济移民”，一律遣返。逃出朝鲜之前，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事，还以为在这里会受到欢迎。在某些地方，我们确实受到欢迎，只不过不是政府当局。

朝鲜女人在中国乡下很受欢迎，因为中国的女人不够多。中国的节育政策只准大多数夫妻生一个孩子，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又重男轻女。很多夫妻会打掉女婴，或在生产时偷偷结束女婴的生命（据人权团体所

说)。结果就是男性人口多于女性，男人到了适婚年龄找不到老婆。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在乡下尤其严重，因为乡下的年轻女性很多都到大城市找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

身心有障碍的男人更难找到老婆，这些男人和家庭为朝鲜进口新娘／奴婢创造了市场。只是买新娘并不便宜，有时要好几千元，相当于一个穷苦农人一年的收入。人口买卖和奴隶婚姻在中国当然不合法，由此生下的小孩不被视为中国公民。这表示他们不能合法上学、没有合格的身分证明，长大后也不能去找工作。人口买卖从头到尾都很不人道，但在中国东北依然是一笔大生意。

我跟我妈还有另一个朝鲜女人吃饱休息后，从长白回来（跟我们分开行动）的志方坐下来跟我们讨论往后的事。他说另一个中国男子会来带我们去乡下，帮我们配对。

“不能把我们一起卖掉吗？”我妈问：“她其实是我女儿，不是我的外甥女。”

志方听到这事似乎并不惊讶。“抱歉，你跟你女儿得分开卖。”他说：“我在你们两个身上都砸了钱，这是我唯一能回本的方法。”

“但是我女儿怎么能结婚？”我妈说：“她才十三岁。”

“听着，不用担心，我同意她还太小。”志方说：“我跟你一样是人！怎么忍心把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卖去当人家的老婆？”他说如果我妈同意跟我分开卖，他和勇善愿意把我留在身边，等养大一点再决定要怎么做。目前他们会先给我妈一个电话号码，这样她就能跟我保持联络。

我跟妈妈讨论了几分钟，我们认为这大概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我妈说好，她愿意单独被卖掉。

“好。”志方说：“你们还想吃点什么？想吃西瓜的话，明天我买一

颗回来。”

隔天早上，志方和勇善带我出门，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好好看看中国。我们经过一些店铺，我第一次看见橱窗内的人体模型，搞不清楚那是真人还是假人。

勇善看我眼睛瞪得那么大，就说：“小朋友，那只是娃娃。”

我不敢相信店里有那么多商品，餐厅和小贩卖着各式各样的食物。你可以在街上买到烤玉米，还有我从没看过、用不同水果做成的水果串。我认得的水果只有草莓，因为以前在课本上看过。

“我想吃那个！”我指着那水果说。

他们买了一串给我，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草莓。我难以相信世界上有这么美味的东西，要我一串接着一串吃都不成问题。一开始，我担心这些奢侈品太贵了，但我的新朋友要我不用担心。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中国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几乎把前几天的恐怖经历全抛诸脑后，脑子里装满我得学会的新东西。我不喜欢听不懂周围的人说的话，所以我要勇善教我几个中文字。我学的第一个句子是“Zhe shi shen me?”意思是：“这是什么？”不管到哪里我都指着东西问：“这是什么？”然后勇善会教我怎么说。

第一次走在中国的街道上，勇善就得教我认交通信号灯，免得我在路上乱闯。惠山没有交通信号灯，反正路上也没几辆车。到平壤时我年纪还小，根本没注意路上交通是怎么运作的。但在这里，你得抬头看灯号再过马路，不然会被车撞到。没过多久，我已经头昏脑胀。眼前的五光十色和人来人往，看得我头都晕了。汽油、烤肉和废气的味道让我反胃，差点吐在街上。

掮客夫妻带我回公寓。一进去，他们便说跟母亲道别的时候到了。志方会带她和另一个女人去找下一位买主。我突然从梦中惊醒。我妈要走了，把我留给陌生人照顾。妈妈为了我，努力要坚强起来；我看得出她美丽而疲倦的脸上带有一股决心。

“要当个听话的孩子。”她对我说：“每天把房子打扫干净，煮饭给他们吃，这样他们就会觉得把你留下来是值得的。”她掏出口袋里胖掮客给她的电话号码给我看。“我一有机会就打给你，说不定恩美会在那里等我。”

前一天晚上，掮客给了我们用塑胶袋包装的中国白面包。那面包又软又好吃，我决定留一半让妈妈带在路上吃。我想去拿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朝鲜女人偷吃了我的面包。结果跟妈妈拥抱道别时，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她。

妈妈走了之后，我哭了一阵子。志方和勇善为了逗我开心，还带我去餐厅吃晚饭。自从上次跟爸爸在平壤上过馆子，我没再进过餐馆。以前我从没看过免洗筷，志方和勇善教我怎么扳开筷子又不会把筷子折断。他们点了大盘大盘的青椒炒猪肉和炒饭，我吃到肚皮都快撑破了。

那天晚上，勇善帮我上了一堂卫生课。以前我从没看过坐式马桶，她教我如何使用；我本以为要爬上去蹲在上面，跟我们在朝鲜用的蹲式马桶一样。她还教我在洗手台怎么洗手，并提醒我使用牙刷和牙膏的正确方法。爸爸被捕后，我们家变得很穷，都用手指沾盐来刷牙。她还告诉我中国女人月经来的时候如何使用抛弃式卫生棉。以前在朝鲜，我们都用薄布代替，因为要经常洗，每个月有几天我都关在家里。她把包在薄薄塑胶袋里的棉花软坭拿给我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而且



那味道好香，我很想把它留起来用在别的地方。但同时，我觉得卫生棉让女人更自由，这个概念很棒！

隔天，她带我去一间可让女人淋浴的公共澡堂。我在电影里看过人淋浴，但这是我第一次亲自体验。热水喷洒而下冲洗全身的感觉真好。勇善用真正的肥皂帮我从头到脚搓洗一遍，然后在我头上喷了杀头虱的药，再用莲蓬头帮我冲干净。朝鲜每个人都有头虱，想甩也甩不掉。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

几小时后，我整个人焕然一新，穿着新衣服、顶着干净的头发走回公寓。志方看到我的时候，说：“你看起来好闪亮！”

另一方面，妈妈跟偷吃我的面包的朝鲜女人被卖给了另一个人。他是人口贩卖链里一个叫弘伟（Hongwei）的“大老板”。专做朝鲜婚姻买卖的黑帮分成不同阶级，最低阶的是朝鲜这边的供应者，再高一层是长白的秃头韩裔中国人或长春的情侣档这样的中间商。像弘伟这样的大人物属于最高阶级，底下常有一整批掮客在帮他们做事。

弘伟是汉人（中国最大的民族），半句朝鲜文都不会。他身材高大，三十出头，有一张马脸，一头浓密的头发。他们一行人坐公车、再转计程车深入中国内陆，我妈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在乡下一间又冷又黑的房子过夜，有名老翁过来帮他们生火。弘伟向妈妈示意这就是要娶她的人，要她跟他睡觉。其实他们骗了她，那人只是另一名掮客。层层而上的人口贩子会在卖掉女人之前利用她们，弘伟也不例外。我妈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隔天，弘伟带我妈和另一个朝鲜女人到锦州郊外的一间乡下房子，那地方约在北京东北方三百哩处。他让她们梳洗一番，给她们新衣服和



化妆品。另一个女人很快就被卖掉，我母亲则花了较长的时间才配对成功。接下来几天，弘伟带她到处找不同的男人，听他们讨价还价；她觉得自己像市场上待售的土豆。有的男人说她太瘦，有的嫌她太老，所以她的价钱一直往下掉。有个女人带着精障儿子来买她，我妈拒绝了。

（掮客多半不会强迫女人接受配对，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女人会想办法逃跑，对交易没好处。但如果女人太不讲理，他们会揍她们一顿，或把她们交给警察遣送回国。）最后，有个农人家庭带着三十出头的单身儿子来找老婆，我母亲以相当于两千一百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他们。

那天，这家人带她返回农舍。那地方看起来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房子很简陋，是石头和灰泥搭成的，上面是铁皮屋顶。那时候是初春，田地都犁过了，不久就能种下玉米和豆子。我妈那时只会说几个中文字，还是设法向她的新“丈夫”表达她想用他的电话打给我。一开始他拒绝了，但我妈哭着哀求了几天，他终于点头。她打到胖掮客的手机找我时，我开心得不得了。

“你见到恩美了吗？”我问她。

“没有。”她说：“我还没见到任何朝鲜来的人。”

听她的声音，我就知道她的状况很不好。她有好几天没睡觉，又不知道怎么跟新的家人说她需要安眠药（以前我们还买得起时她吃的那一种）。她很后悔把我丢下，不能再保护我，也还没找到姐姐。我一直安慰她，要她别担心，一切还好，而且她有电话，随时可以联络到我。

后来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才又接到她的电话。那家人把家里的手机、钱，甚至食物都锁了起来。她发现他们不只想把她买来当媳妇，还要她为全家人做牛做马。除了煮饭，她得打扫家里、到田里干活。她一次又一次求他们让她打电话给我，但无论她怎么哀求，他们都不理不

睬。他们对待她就像农场的牲畜，根本没把她当人看。

## 13与魔鬼交易

我妈才走三天，志方就想强暴我。

他的公寓有两间卧房，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我独自睡在志方和勇善对面的那间卧房。某天晚上，满身酒味的他爬上我的床，粗糙的手抓住我。我吓了一跳，拼命踢他，想摆脱他的手。

“安静！”他噓声说：“你会吵醒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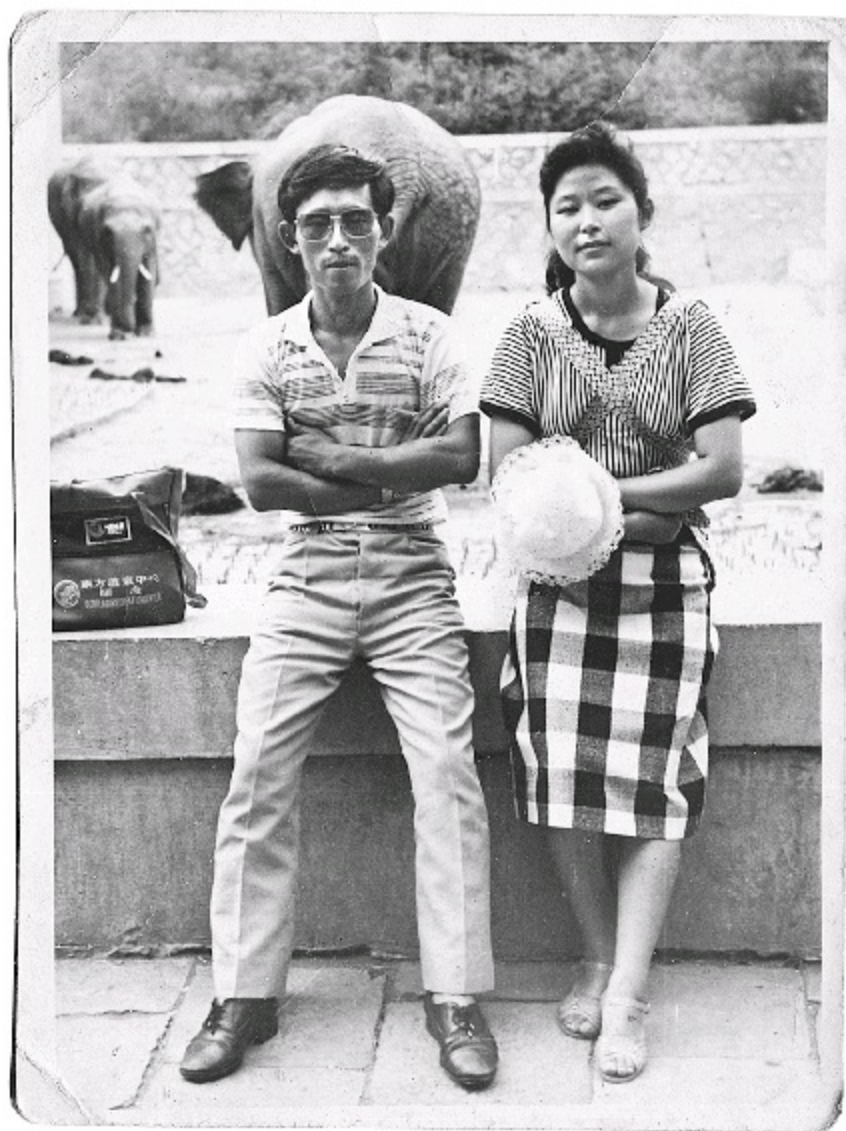
“你不放手我就尖叫！”我说，他只好不情愿地放开我，走回他跟女朋友的房间。

过了两天，他又想侵犯我。这次他先把勇善给灌醉，趁半夜溜进我的房间，我一样又踢又叫还咬他。我想，唯一能自保的方法就是表现得像个疯子。我疯狂挣扎，他知道如果要得逞就得狠狠揍我，甚至杀了我，但那样我就不值钱了，于是他只好放弃。

“算了。”他说：“但不准你再留在这里，我要把你卖给农夫。”

“随便。”我说：“卖就卖啊。”

几天后，当初买了妈妈、再把她卖掉的男人上门来把我带走。



研美的父母在北韓首都平壤的動物園合照。



上：研美一歲生日。  
右：研美出生滿一百  
天。





研美約兩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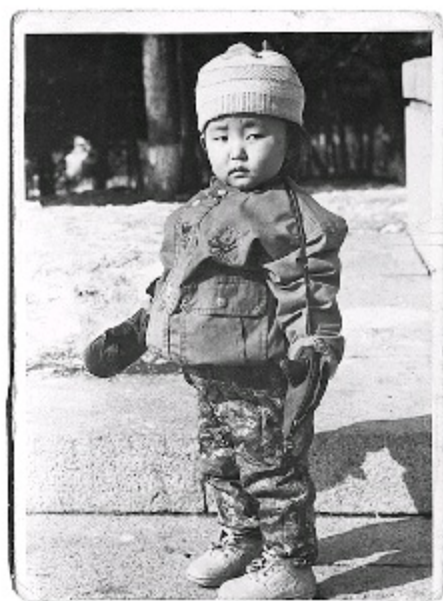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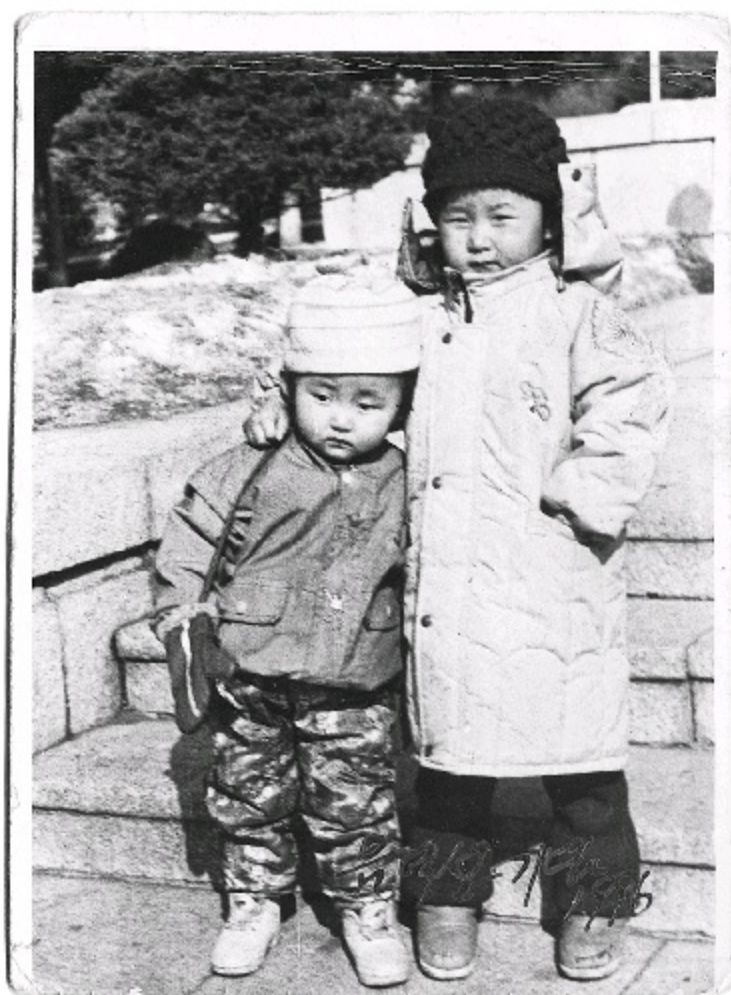
由左到右：姑姑恩美、科父、研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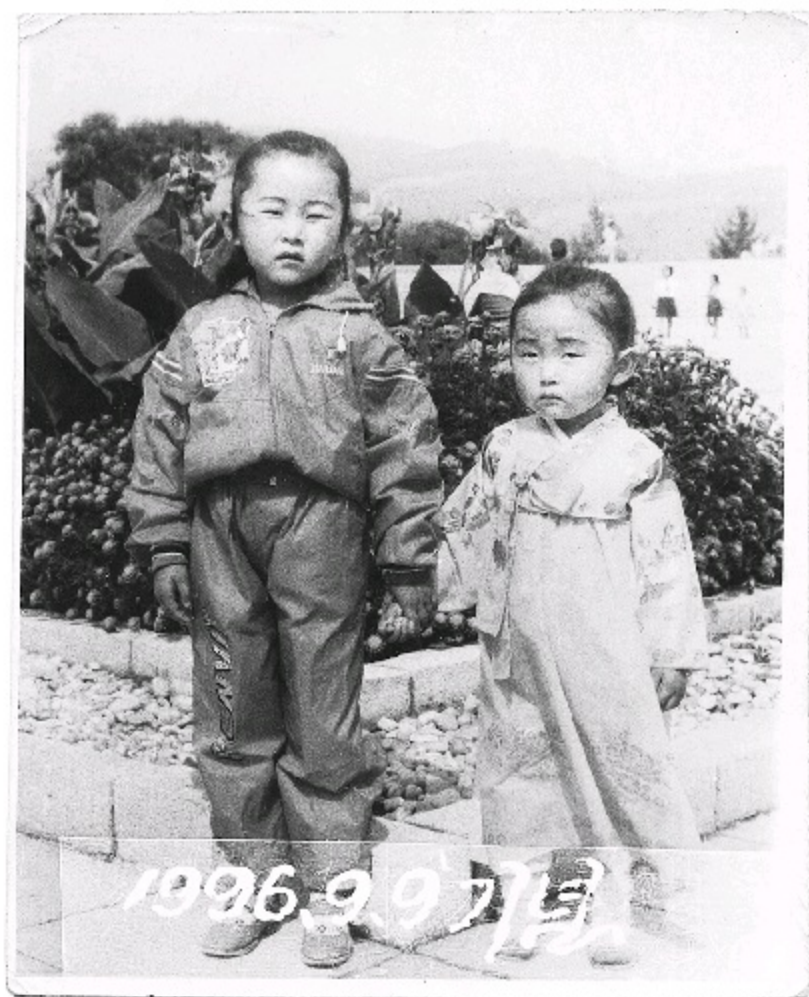
上：研美和恩美一起滑雪橇，  
分別約二歲和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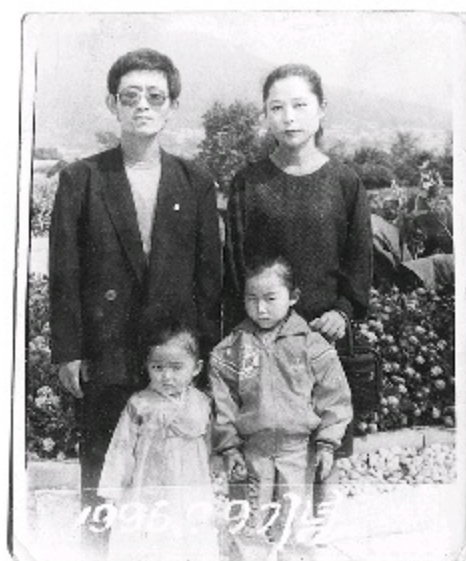
左：穿雪衣的研美，約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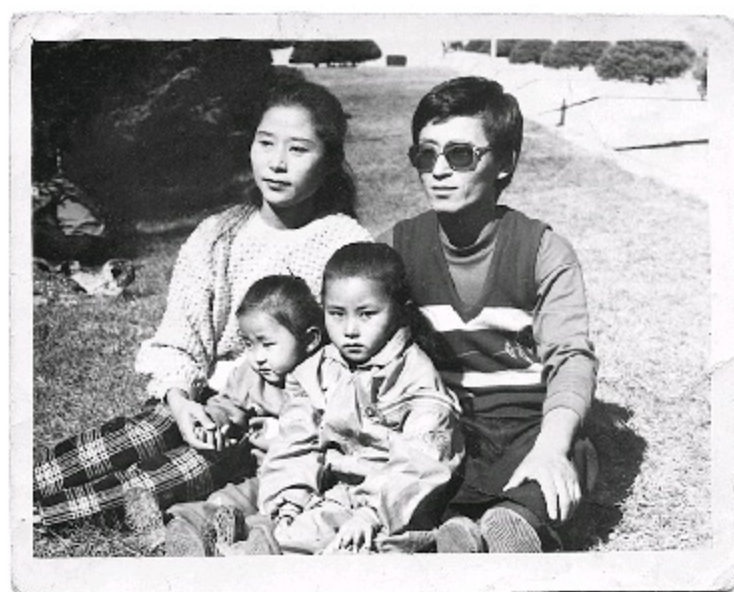
研美和恩美在一個雪天裡，穿著禦寒衣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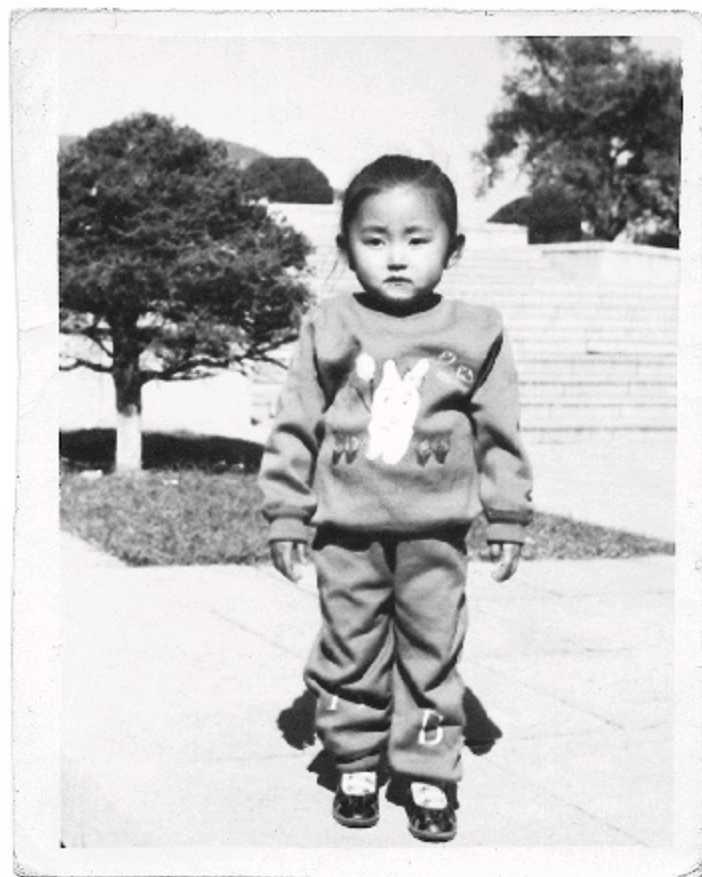
胡美（右）二歲，屈美（左）五歲。



左：全家照，1996年。解美三歲，恩美五歲。  
 右：一家人在惠山（中國和北韓的邊境城市）的合照。







研美二歳大。





研美和恩美穿上衣服禦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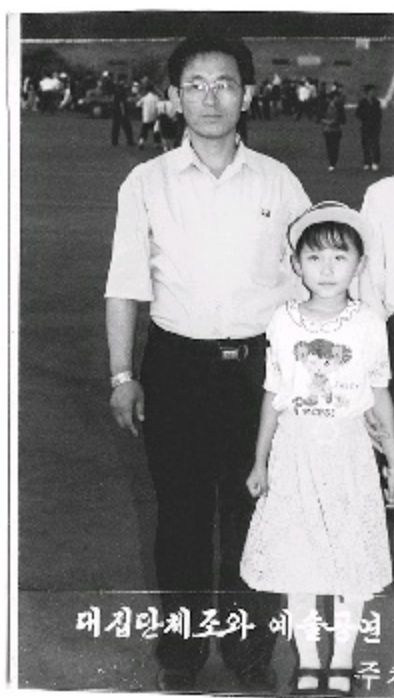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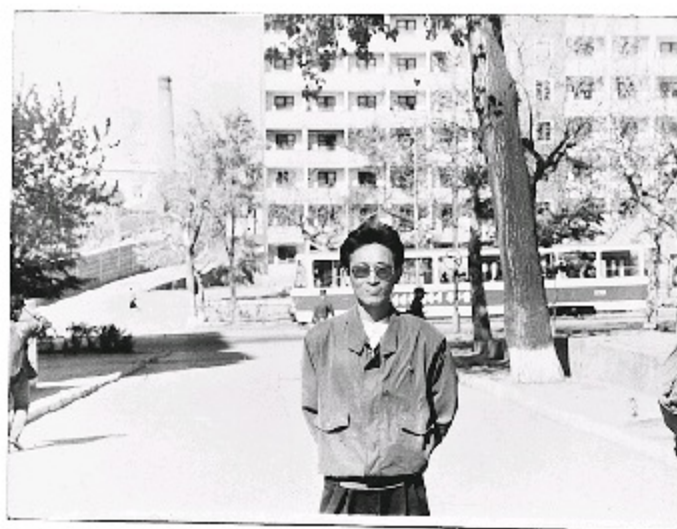
上：在惠山照的全家福。  
左：研美和恩美穿著姊妹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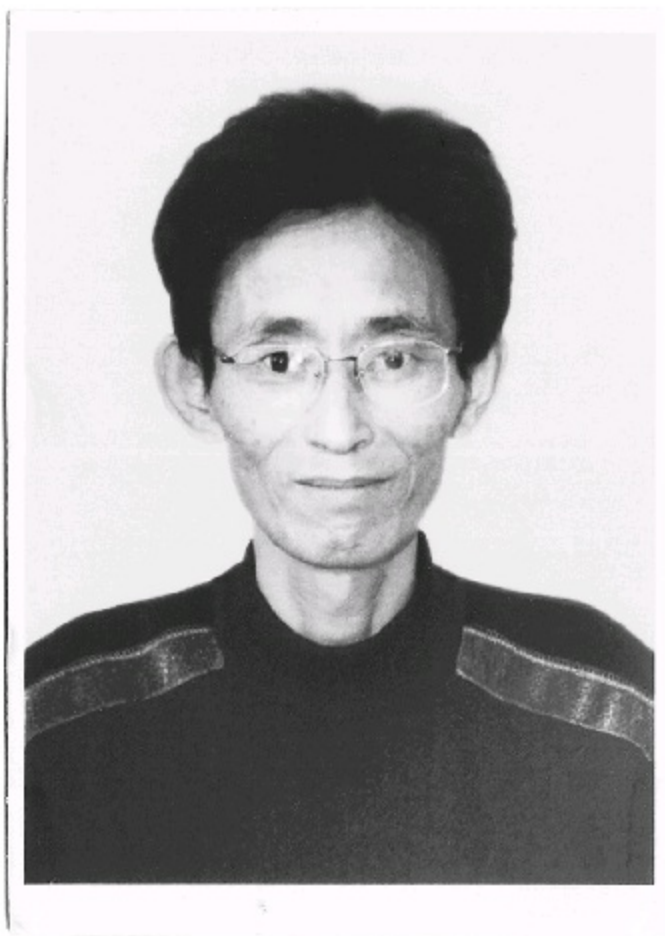
研美（第三排左第二個）和恩美（第二排左第一個）參加親戚在鄉下的婚禮。



研美在平壤，約八歲。



上：妍美的父親被捕前在平壤攝。  
左：妍美與父親。父親被捕前攝。



明美與母親在父親過世前為他照的最後一張相片。





重新團圓，恩美、媽媽和妍美，2015年首爾攝。

弘伟不是他的本名，但反正他说的话没一样是真的。他跟我说他今年二十六岁，其实是三十二岁。他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因为志方跟他

说我十六岁。大家都是骗来骗去。

我正在努力学中文，但听得懂的很少，弘伟只能靠肢体语言跟我沟通。他先带我去中国餐厅吃了早餐，才展开这段漫长的旅途。我很害怕，双手不停发抖。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个掮客都想强暴我，我想这一个也不例外。弘伟一直比手势叫我吃，但我吃不下。即使我仍然很瘦、营养不良，却完全没有食欲。我来中国原本是想吃饱，现在却想到食物就恶心。

我们转了好几趟公车，才到弘伟的地盘：从古城朝阳延伸到热闹的港口城市锦州。一路上的停靠站很多，某一站有个小贩上车来卖冰淇淋。弘伟买了一支给我，我很久没吃东西了，食欲突然回来。我很难相信怎么会有东西这么好吃。我吃掉了整支冰淇淋，吃完之后还在脑中回味不已。

那天晚上，我们在锦州郊外的小镇旅馆过夜。抵达时已经傍晚了，我又难受到吃不下东西，于是弘伟带我到杂货店买些补给品。我知道他希望我挑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我从没看过那些奢侈品，一直跟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他只好自己帮我选。后来他帮我买了一支漂亮的牙刷、肥皂，还有一条绣了花样的漂亮毛巾。他看到我因为营养不良又长期暴露在朝鲜的寒风中，皮肤变得很干燥，便买了保湿乳液给我。看到这些昂贵的东西，我渐渐卸下心防，心想或许这个人没那么糟。

到了旅馆之后，他让我看一种我从没看过的手机。这种手机不只可以拿来讲电话，还可以播放音乐跟照相。弘伟正在教我怎么重播影片时，我母亲突然出现在荧幕上跟我挥手打招呼。我好开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妈妈！妈妈！”我对着手机大喊，从他手中抢过手机。我以为她在

跟我说话，想要回答她。弘伟吓了一跳，他不知道他不久前才卖掉的女人是母亲。之前，他也教了我妈手机的使用方法，还帮她拍了一段影片作为示范。

当我发现妈妈不是透过电话在跟我说话时，我的心一沉。看到她的脸我好高兴，我想这表示我一定很快就会见到她。

那天夜里，弘伟比手画脚跟我说他就是我的丈夫，要我跟他睡觉，然后试图强暴我。

我再次反击，像个疯婆娘又踢又叫兼咬人。我叫得很大声，我敢说听起来一定很像我们房间发生了命案，所以弘伟只好作罢，乖乖睡觉。我整晚贴着墙壁，瞪着血红的眼睛，就怕他再侵犯我。

隔天早上，弘伟想用礼物和温情收买我。他带我去一家店买了牛仔裤、毛衣和球鞋。我在朝鲜偷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时看过那种鞋子，一直梦想要有一双。现在美梦成真了，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渐渐明了，就算拥有全世界的美食和球鞋，也无法让我开心起来。物质的满足对我已经毫无价值。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人的疼爱，失去了自由，从此要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我还活着，却失去值得活下去的一切。

在小镇待上一天后，弘伟雇了一辆计程车载我们到锦州。他在一个老社区的四楼公寓租了一间套房，附近就是动物园和一座大公园。对我来说，那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我很怕跟弘伟在一起。他又想强暴我，我同样拼了命反抗他。我的体内仿佛住了恶魔，全身充满恐惧和愤怒，只要他睡觉时不小心碰到我，我都会发了疯地大哭大叫，想停也停不下来。我哭闹到差点昏过去，我想他也吓到了。弘伟知道他不能逼我就范，除非他想毁了我。

于是，他把我关在公寓里好几天或好几个礼拜，我不知道有多久。只有送食物给我时，他才会打开房门，但我还是不肯改变心意。有一天，他决定让我看清自己的处境。

我们搭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到乡下的一户人家。弘伟介绍一个怀了身孕的年轻朝鲜女孩给我，她跟一个中国男人住在一起。弘伟要她帮他翻译，确认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说如果我不跟他睡觉，他就要把我卖给农人，他要我明白他给了我更好的选择。

“就让他卖了我。”我对那女孩说。

弘伟不敢相信地摇着头，他把我留在屋里好好想清楚。女孩跟我说，弘伟预期我会卖到很高的价钱，因为我是处女，而且年纪显然很轻。

我想我可以信任这个女孩，毕竟我们都是朝鲜人，她会同情我的处境。“你能不能救我？”我问她：“能不能帮我逃走，然后找到我妈？”

她把事情告诉她丈夫，他们答应要救我，我们一起拟好了计划。于是，我趁弘伟不注意时从后门溜出去，爬出围墙，跑到森林里的一间破旧老屋。那女孩的中国婆婆很快就来跟我会合，几小时后，一个男人骑摩托车载我到他们亲戚位在深山里的一栋小屋。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自己上了当。朝鲜女孩和她丈夫联手把我从弘伟那里偷过来，现在打算自己把我卖掉。他们带了另一名掮客来山里看我，朝鲜女孩跟我说：“如果你答应跟这个男人睡觉，他会帮你在大城市找个年轻又有钱的丈夫，这样你就不用嫁给农人了。”

我还是不肯，还跟他们说除非我死，不然绝对不可能。

朝鲜女孩花了约一周在山里来来去去，试图说服我。这给了我充裕的时间练习中文，我学得很快。

同时间，弘伟找了一些帮派的朋友帮忙找我。他们骑着摩托车到处找，搜遍附近的房子和小屋。把我偷走的那对夫妻骗弘伟说我逃跑了，但他不相信他们的话。他威胁他们，要他们把我交出来，但对方不肯招认，把我带走的中国男人甚至说要帮忙找我。

弘伟透过他在这一行的人脉，终于查出我的藏身处。他去找那对夫妇谈判：他们要是不跟他合作，他就去警局告发他们，那个朝鲜女人会被遣送回国；如果他们把我毫发无伤地交出来，他会付钱把我买回去。他们答应了这笔交易。于是，弘伟第二次花钱把我买下。我从不知道实际的金额，只知道这次的价钱比之前他从志方那里把我买走时高很多。

当另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来山中小屋载我，我以为我终于得救了。谁知道他直接把我载到市区，弘伟和一群模样凶悍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

“你没事吧？”弘伟问：“有没有受伤？”

我摇摇头。我已经听懂更多他说的话，但我并不想跟他说话。

朝鲜的新娘／奴隶如果逃跑，掳客通常会把他们揍得很惨，甚至会杀了他们。但弘伟没有这么做，他看到我回来好像真的很高兴，还订了一桌酒菜犒赏帮忙找我的兄弟。那天晚上，我们就搭公车回锦州。

从公车站走向公寓途中，我心里很笃定也很平静，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自我了断，不再忍受这种生活。我已经失去所有事情的掌控权，但起码还可以为自己下这个决定。离开朝鲜之后，我天天哭，哭到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眼泪可以流。但是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不再哭泣。

正当我想放弃，弘伟心中则充满了希望。他不是信仰虔诚的人，但有时会求佛祖保佑。宗教的概念对我来说很陌生。朝鲜人崇拜的对象只

有金氏父子，我们相信的是“主体”，也就是金日成一手打造的民族自主教条。国内禁止人民信奉任何宗教，违者可能赔上性命。但朝鲜很流行算命（非正式核准），很多人对日期和数字很迷信，因此我可以了解弘伟为什么那么迷信。他边走回公寓边数步伐，进门之后还把相同数量的金纸（献给阴间或死去祖先的假钱）拿去烧。他希望这么做能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好运，可惜没效。

他又一次想强暴我。他把我的手按在床上，但我对他拳打脚踢，好不容易才挣脱他。我跑去厨房抓起刀子，然后冲去阳台，把刀子架在脖子上。

我用朝鲜语大喊大叫：“你要是敢过来，我就跳下去！”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想寻短。

弘伟哄着我说：“别动，别动。”他说了几个我听得懂简单中文字，然后比手画脚跟我说他心里的打算。“你当我老婆。”他说：“妈妈来，爸爸来，姐姐来。”

突然间，他的话打动了。我慢慢放下刀子。我们坐下来，他用肢体语言和简单的字汇跟我解释他的想法：如果我当她的“小媳妇”（就是小妾），他就帮我找到我妈，带她回来。之后再回朝鲜找我爸，付钱请掮客带他来中国。他也会帮我找到我姐姐。

如果我不听话呢？现在他显然已经无法卖掉我，只好把我交给中国警方。我当然绝不容许这种结果。

那时我根本无法理性思考，但是我看到一个不只能救我、还能拯救家人的机会。我一直以来只想到自己，现在得到一个把家人放在自尊之上的机会。我宁可死，也不要忍受被强暴的屈辱。但现在我有了另一个选择：自私地寻死，还是救我的家人？



首先我要考虑的是：我能信任这个男人吗？

从离开朝鲜到现在，每个人对我说的都是谎言，但弘伟对我提出这个条件时，却让我相信他是真心的。毕竟我逃跑之后，他想尽办法找到我。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守诺言，我会自我了断；他虽然野蛮，对我却似乎是真的。

最后我别无选择。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它当作一种交易，而不是强暴。直到现在，经过时间的洗礼，我才能接受其中的残酷和丑陋。当时我才十三岁又六个月，在同龄孩子中又特别娇小。当弘伟压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会裂成两半。我好害怕，而且过程痛苦、恶心又暴力，我无法相信那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过了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自己灵魂出了窍，坐在床边的地板上看着自己，但那个人并不是我。

弘伟一办完事，我马上冲去厕所冲洗，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好脏，心里绝望到极点。我用力摩擦自己的皮肤直到流血为止，那样让我觉得好过一点。我发现身体的痛减轻了内心的痛，有段时间我养成用粗布拧自己、刮自己皮肤的习惯。有时，那是我逃避内心痛苦的唯一方法。

弘伟来查看淋浴间的水为什么流个不停，发现我瘫坐在地板上，全身无力，差点把自己淹死。他把我抱回床上时，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看见泪水淌下他的脸。

我觉得自己随时会疯掉。性行为本身令人反感，我每天晚上都吐。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天只吃得下几口饭。后来我变得麻木，弘伟以为我逐渐恢复正常。但我只是一边活着，一边从远处看着自己，像在扮演

一部仿佛永无止境的电影里的角色。我的体内只剩下对那个男人日积月累的恨。我想像自己趁他睡着时杀了他再逃跑，但我能逃去哪里？还有谁能救我的家人？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你妈。”有天早上，弘伟告诉我：“但你还得帮我别的事。我要你帮我处理生意。”

我才到中国两个月就开始帮弘伟做生意。他把他买的两个朝鲜女人带来公寓里住，我负责跟她们对话、帮他简短翻译。我替她们梳洗，就像勇善之前帮我梳洗一样，然后帮她们挑衣服和化妆品，教她们卫生常识。这些女孩跟我和我妈有点不同，她们逃出朝鲜时就知道自己会被卖到中国。她们说她们不介意，那样总比死在朝鲜好。

弘伟带着我到乡下帮他卖掉这两个女人。成交之后，我们回到当初他卖掉我母亲的村子，我跟她的中国“丈夫”见了面。现在我会的中文更多了，可以用中文对他说，我想把我妈买回去。我们谈定一个价格，那是我第一笔货真价实的买卖。弘伟付了两千多美元买回我妈，我对他损失的钱暗自窃喜。

几天后，我们跟那家人约在乡下一个隐秘的地点拿钱交人。那时是六月，草还很长，妈妈远远看到我，就从一条泥土小径跑过来抱住我。她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我是来接她的。有一次，她想办法偷偷打电话给长春的胖掮客志方，但他只跟她说我走了。见到了彼此，我们欣喜若狂，眼泪流个不停，那是我好几周以来第一次笑，甚至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活着。

妈妈习惯性地把我背在背上，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让妈看看我不在这段期间，我的小可爱长大了多少。”她说。但我

已经不再是小可爱了。后来她跟我说，我穿着新衣服又化了妆，害她差点认不出来。其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我的样子不再像小孩子，心中所有童稚的一面也彻底消失。那就好像血管里的血都已流干，我成了另一个人。我谁都不同情，包括我帮忙卖掉的那些女孩，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一家人重新团聚。

我姐姐还是没有消息。弘伟告诉我们，他跟其他掮客打听过她的消息，但毫无所获。我们虽然失望，但我仍然抱着他能利用人脉找到姐姐的梦想。而且再过不久，我们就会见到爸爸了。

我母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农场。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到锦州。

我还是很恨弘伟，但已经学会跟他一起生活。刚开始，他有时候对我很严厉，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对我的态度渐渐软化。我想他学会尊重我、信任我，甚至用他的方式爱我。

弘伟的日子一直都不好过。他出生在朝阳以西的一个农场。朝阳是个庙宇、公园、摩天大楼和街头黑帮群集的古城。他十二、三岁时跑去都市，加入一个掌控连锁卡拉OK夜总会的帮派。那不是你在汉城或其他城市会找到的那种单纯欢唱吧，而是有女人提供倒酒以外的娱乐的特殊场所。弘伟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会读会写又很聪明，十五岁就拥有自己的卡拉OK王国，而他是管理这座王国的帮派老大。他利用人脉参与各种事业，例如餐饮和房地产。我逃出朝鲜之前大约两年，他的事业扩展到人口买卖。有一阵子，这门生意大发利市。

弘伟在朝阳有个中国太太和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后来我才知道，他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弘伟把我妈买回去之后，她告诉他其实我才十三岁，而不是十六岁。我从没想过要告诉他我的真实年龄，因为我不

觉得那会有什么不同。但他好像很震惊。

“要是我知道她那么小，绝对不会跟她睡觉。”他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但之后他对我比之前更温柔一些，我几乎开始把他当人看。但我还是期望他兑现承诺，包括把我爸救出朝鲜。弘伟在长白市有联络人，包括来回边境帮忙跑腿的女人。她们的工作是帮逃出朝鲜的人送钱给家乡的亲人。她们也会走私中国手机，以便让分隔两地的家庭保持联络。这项工作很危险，但只要谈妥价钱就能安排。

八月时，弘伟雇用了其中一名掮客去找我爸。

## 14生日礼物

八月十五日是朝鲜的重要节日，因为这天是庆祝日本一九四五年战败投降的纪念日。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五日，我们雇用的掮客终于在惠山郊外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里找到我爸。他没有自己的手机，用其他方式联络他又会害他陷入危险。所以我们雇用的女人给了他一支中国手机。我在约定时间打电话给他时，他正蹲在阳台上望着鸭绿江。

“爸爸！我是研美！我跟妈妈都没事。你都好吗？”

电话另一头沉默不语。他不敢相信隔了将近五个月还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没事，丫头。”他终于说话：“听到你的声音我好高兴啊。你们在哪里？”我们能通电话的时间很短，因为警察随时都在留意非法通话。我只来得及告诉他，我们在中国，我跟妈妈都平安。我们还没找到恩美，但仍在努力寻找。

“我好想你，爸爸。”我说：“我要带你来中国。我们会付钱请掮客带你过来。”

“不用担心我。”他说。

“你来就是了，爸。”我说：“其他事我会处理。”我跟他说，他来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找恩美。

“好。”他说：“我去。”

掮客走了之后，他哭了一整夜。

我们逃走之后，爸爸找我们找了很久。他跑回恩美留给我的住址，得知把我们卖掉的女人名叫周英爱（Jo Yong Ae）。他追问对方我们的

下落时，对方承认她把我和妈妈卖去中国，但是声称她对恩美的事一无所知。我爸不知道我们越过边境后发生了什么事，周英爱只告诉他，我们去了一个有食物吃的地方。他只能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联络他。

我们离开后，他哥哥和我们以前的邻居安排了一个女人来跟他住，帮他煮饭打扫，他们都以为我妈不会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吃不下、睡不着，整天哭个不停。

另一方面，很多认识我们的人都以为是我爸把我们送去中国。毕竟他人脉广，人又机灵，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

跟我们住同一间公寓的邻居女孩们甚至相信，我爸也能帮助她们逃到中国。她们又穷又绝望。我爸说他帮不上忙，但她们一直求他，说她们在朝鲜已经活不下去。

最后他答应帮她们逃出去，条件是离开前必须先告知她们的妈妈。爸爸给了她们周英爱的住址，两名女孩没告诉母亲（因为料定她不会答应），就经由周英爱的安排离开了朝鲜。邻居的母亲得知女儿走了就怪我爸。后来他告诉妈妈，周英爱给了他一百元（约十三块人民币）答谢他。他说害女孩的母亲那么痛苦，他很内疚，但他不知道她们是被卖去给人家当老婆，也不知道那是我跟妈妈的遭遇。他还以为是某些有钱的中国人花钱来领养朝鲜的小孩。

我们又花了六周安排爸爸逃出朝鲜。我知道他病得很重，但我以为只是太操劳和营养不良引起的。跟爸爸再次通上电话时，我告诉他我要让他吃饱，让他在中国恢复健康。

“是啊，一定会的。”他说。他永远那么乐观，从不喊痛，但我听得出来他很虚弱。时间紧迫，不能再耽搁了。



我愈来愈喜欢我们舒适的公寓，还有锦州的生活环境，附近有公园也有市场，无奈我们很快又得开始奔波。

我们公寓前的大马路上有家花店，以前我从没看过花店，所以深深受到吸引。在朝鲜，想要鲜花就直接到外面摘些回来。但这里的花店整间都是五颜六色的盛开花朵。有时我会偷偷走进店里，只为了闻一闻那股又甜又刺激的香味，但从没买过花。花店女老板渐渐认识我。过不久，她每次看到我都会露出微笑，对我招手。这让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人发现我是朝鲜非法移民，警察会把我们抓走。我把心里的恐惧告诉弘伟时，他打包了东西，隔天我们就搬走了。反正我们过不久也得搬家，因为留在一个地方太久风险太大。

我们在另一区找了一间公寓，这次是一间附厨房和卫浴的无隔间公寓。有时会有多达九个女人在公寓里打地铺，等着被卖掉。

通常妈妈会留下来打点公寓，我则出门帮弘伟跑腿，就像志方利用勇善帮他跑腿一样。我负责带着非法移民在乡下到处跑，承担所有风险。我要假装自己比实际年龄大，因为那些女人不可能听一个十三岁女生的话。我的工作是为她们翻译、买票或叫车，把她们带回弘伟的公寓，并说服她们如果想留在中国，就要乖乖合作。带她们去见潜在的买主时，我会跟那些男人说，她们跟我一样会学中文，将来也会是好太太。我跟那些女人则说，那些男人有钱、人又好，婚后她们还可以寄钱回家。

我尽可能让买卖过程顺利，但有时还是力不从心。那些掮客都是流氓和强暴犯，很多女人吃足了苦头。有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女孩为了逃走，从桥上跳下冰冻的河流，她抵达长春时，下半身已经无法动弹，但她说志方还是强暴了她。后来，弘伟好不容易把她卖给一名农夫。她的

遭遇很悲惨，可悲的是，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有的甚至更悲惨。

想到我和那么多女人为了在中国存活要受那么多委屈，不禁悲从中来。我希望这些事情从没发生过，这辈子永远不用再提起这些往事。但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人口买卖的骇人真相。如果中国政府取消把朝鲜难民遣返的无情政策，那些掮客就不再握有剥削、奴役朝鲜女人的权力。但追根究柢，要不是朝鲜有如人间地狱，这些女人一开始也不需要逃亡。

弘伟买来的女人多半都卖给中国男人当老婆，但也有女人会要求他把她们卖去当妓女，这样她们才能赚钱寄回家。刚到中国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妓女。后来有一天，弘伟带我去一个烟雾弥漫、叫葫芦岛的海港城市，很多南韩男人和观光客来这里用较低廉的价格买春。那天弘伟要把一个女人送到某家妓院，他需要我帮忙翻译。

那家妓院是由一个中国籍的中年女子负责经营。她对我很殷勤，不但让我看她办公室的漂亮书桌，还带我看一整排装上市子的小房间，房间里只够放一张平台床，里头还有淋浴间，但我不知道白天为什么要淋浴。

我在那里碰到不少女人，有个平壤来的美丽女孩已经在这家妓院做了七年。那里的女人跟我说，那是个赚钱的好地方，而且每天都可以吃到泡菜和其他韩国食物，还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南韩人。我听了好兴奋，因为我好想认识说话腔调很好听的南韩人，就像在影片上看到的一样。女孩们把那个地方说得好了不得，老板娘也邀我留下。

当我跟弘伟说我想留在亲切的老板娘身边时，他说：“你疯了吗？绝对不要想在这种地方工作！”

“为什么！我希望你把我卖给她！”我说。

他气得打了我一耳光。

“我说的话你都听不懂！”他说。

他处理完事情，马上带我离开。

后来几个月，我又去了葫芦岛很多趟，终于发现当初如果留下来会有什么下场。客人花大约五美金跟妓院的女人睡觉，女人可以抽一美金，以妓院来说算是很好的价格，所以那些女人才想留在那里工作。但你一天最多得跟十二个男人睡觉，有些男人全身脏兮兮，怎么样也洗不掉身上的味道。不过，那还不算最糟的地方。

弘伟告诉我，在北京和上海的饭店里，卖淫女子如果想逃，会被注射毒品，变成毒虫，之后想跑也跑不掉。

人口买卖毫无疑问是笔丑陋又残酷的生意。但是人只要坐上同一艘船，无论多么悲惨，总是能找到方法与彼此链接。我们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候也能一起哭、一起笑。我跟妈妈认识了这些经过我们生命的女人，还跟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

明玉（Myung Ok）四十出头，也是惠山来的，她曾经逃出朝鲜两次。第一次，她跟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儿过了河，一起被卖掉，但是跟中国丈夫住在一起时，警察逮到她们，把她们遣送回国。她女儿还太小，不能送去囚犯营，于是送去“再教育”，表示她得挨饿加挨揍好几个礼拜。明玉被送到劳改营，在那里受到酷刑，劳动到差点没命。

获释之后，明玉决定再次逃亡，但她女儿不敢再尝试，没跟她一起走。她再次成功过河，最后经由志方卖给了弘伟。我妈跟她都是惠山人，明玉又很有幽默感，两人很合得来。

不幸的是，弘伟把她卖给一个肢体残障的农人，对方对她并不好。

他怕明玉逃跑，到哪都跟着她，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后来她终于受不了，想办法逃到东北大城沈阳，有很多脱北者都躲在那里。但弘伟在沈阳的黑社会有人脉，他的手下找到了她，把她打个半死，之后又把她送回农夫手中。假如让她跑了，弘伟就得把钱退给买主，他经手的女人都有一年保证期，跟汽车一样。

还没听过明玉和其他女人的遭遇前，我跟我妈从不知道被警察逮到并遣送回国的危险。我们还听过更惨的故事，比方怀了身孕的朝鲜女人被迫拿掉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胎儿，或是朝鲜人发现她们试图逃到南韩就将她们处死等等。在这之后，我跟妈妈都发誓，就算死也不要被遣送回国。

爸爸在二〇〇七年九月第一次动身逃到中国。我跟他说，过了河就会有人接他，但是到了对岸，他一个人也没看到。弘伟付钱请那个胖掮客安排一切，但他搞砸了。可怜的爸爸只好想办法避开卫兵，溜回朝鲜。

十月一日时他又试了一次，那时河水已经变得又急又冷。这次弘伟亲自到长白确认一切顺利。他付给志方相当于一千三百美金的费用救我爸，以男人的价码来说算相当高。弘伟看到我爸瘦削憔悴的模样很震惊。他原本希望让他去工作，这样就可以替他偿清债务。但现在他知道我爸病到连坐公车都有困难，只好雇计程车把我爸和他买的两个女人一路载回锦州。

他们一行人在二〇〇七年十月四日抵达，那天刚好是我十四岁生日，一转眼我到中国已经六个月了。我跟妈妈看见爸爸走进门，就跑过去扑进他的怀中。我不敢相信爸爸、妈妈都回到了我身边。这也是多年

来我爸第一次在身边帮我庆祝生日；以前他常出外做生意，后来又去坐牢。于是，弘伟决定帮我办一个特别的庆生会。我和爸妈又哭又抱、说个不停的时候，弘伟出门帮我们买了好多吃的。我跟他说过我爸喜欢吃肉，他就买了鹅肉、鸡肉、牛肉和猪肉。那时，有几个朝鲜女人跟我们一起住在公寓里，加上弘伟把我爸带回来时也顺便带了几个女人，公寓里人很多，非常热闹。这顿大餐对爸爸来说就像美梦成真，但也令他心碎，因为他已经病到吃不下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爸爸拿出他带在身上的一袋鸦片给我们看，他说他打算假使过河被抓就吞药自杀。他还说到了中国如果被捕，他也会这么做，以免被遣返或不小心向警方透露了我们的行踪。但他很高兴能活着跟我们团聚，现在只少恩美一个人。我们还是没有她的消息，但爸爸满怀希望，打算等他治好肠胃的毛病就去找恩美，之后他说不定可以想办法创业，这样就能再度照顾我们全家人。民植舅舅曾经告诉我妈，她未来的丈夫是一株在坚硬的石头里也能生长的植物。他说的没错。

爸爸很快就明白我跟弘伟的关系。看到年纪还小的女儿被这样的男人剥削，他伤透了心。但现实比这更复杂难解，他跟我和妈妈一样，对弘伟又爱又恨。一方面，他很感激弘伟信守承诺救了妈妈，也庆幸他没把我卖给农人，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清楚我的境遇原本可能比现在糟很多。他很感谢弘伟把他带来中国，让他住在这片屋檐下，但同时也对他恨之入骨。我爸差点认不出我，因为现在我化了妆，指甲修得漂漂亮亮。我不再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其他人。但我爸对这一切无可奈何，也无法替我承担责任。现在他什么事都要依靠我，而且又生了重病。

我爸不是会说出心事或表现懦弱的那种男人。他总是笑着对我说，



一切都会好转的。我很感激他把我当成大人对待，但我知道，看到我的童年就此被剥夺，他其实心痛不已。只有一次，他含蓄地说出内心的感觉。那天他抱着我，闻着我身上的气息。“研美，你身上的婴儿香味不见了。”他轻声说：“我想念你闻起来像小孩的时候。”

我跟妈妈想听他说这段日子惠山发生的所有事。爸爸说，二伯的儿子都想当医生，还有他在平壤和惠山的姐妹的现况。他在惠山的妹妹是苦命的寡妇，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儿，母女俩都得了肺结核。爸爸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要我代为照顾她们和其他亲戚。

春健如大家预期的去当兵了。我失踪后，他对我还是一片痴心。爸爸说 he 来过公寓找我。“研美去哪了？”他既伤心又焦虑地询问，但爸爸什么也没办法告诉他。

我父亲需要尽快到一家现代化的中国医院做检查。问题是，他是非法移民，我们甚至无法谎称他是来中国探亲的朝鲜人，因为他的身分证明在他坐牢时就被销毁了。要让正规的医院收治他，既花钱又危险，因为医护人员可能会把他交给警方，最后我们只能带他去不会问太多问题的小诊所检查。爸爸还是痛得很厉害，尽管肚子会饿，却一直反胃，吃不下东西。诊所医生帮他检查过后，说他的状况太过严重，他们无法处理。“你们要马上送他到大医院。”医生说，但我们没办法去医院，于是医生开了一些止痛药给他。回到家之后，爸爸脸上毫无血色，仿佛体内的血液已经流干，于是我们决定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带他去医院。

弘伟对眼前的状况很不满，但他愿意帮我们挂号。十一月初，爸爸来中国才短短一个月，就被推进锦州某家医院的手术室。医生剖开他的



肚子，但马上又缝了回去。

医生走出来时，我们从他的表情就看得出情况不乐观。

“我们恐怕无能为力。”他说：“患者得了末期的结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器官。”他说我爸体内的肿瘤太多了，开刀也无济于事。爸爸最多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让他免于痛苦。

## 15 骨灰

我妈听不懂医生说的中文，我必须再跟她解释一遍。我真正确定的只有一件事：爸爸活不久了。我对癌症一无所知，因为这种病在朝鲜很少见。这不代表朝鲜没有癌症，或许只是没有诊断出来。大多数人在癌症还没致死前就因为别的原因过世。

我们不忍心把医生的诊断告诉爸爸。那对他来说，太可怜了，他手术清醒后，还以为一切都会没事。

我们得尽快把他弄出医院，只好把他带回公寓养病。麻醉药一退，他又痛了起来，什么也吃不下。病情一天天恶化，我们又买不起他需要的那种止痛药、让他舒服一点的点滴，或是可能延长他寿命的营养品。手术已经花了很多钱，我也不敢再跟弘伟要钱。

“丫头，我的病怎么都没起色？”他一直问我：“如果连中国的医生都治不好，也许我该回朝鲜去。”他对家人感到内疚，因为自从他逃亡之后，他的兄弟姐妹都受到警方的调查。二伯的儿子们被迫退伍，医生生涯岌岌可危；惠山的姑姑遭到严刑拷问。爸爸很后悔自己的决定，想回去帮他们，告诉警察他没有逃亡，只是去中国看病。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跟妈妈不得不跟他说他得了癌症，医生已经对他的病情不抱希望。

“那么我要回家，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他说。

我们求他别叫我们带他回家。他已经虚弱到无法远行，就算回到惠山，也会死在监狱里。“爸爸，在那里谁要照顾你？”我伤心地说：“谁会替你办后事？”

从此，他没再提回朝鲜的事。

接下来几个月很难熬。中国政府开始打击人口买卖，弘伟的生意大受影响，少赚很多钱。那时是二〇〇八年，中国全国上下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北京夏季奥运。后来我才知道，西方政府和人权团体一直对中国施压，要求他们对待国内移工、少数民族和政治异议分子更加宽容。根据新闻报导（但我们从没听说过），北京当局的回应是：将可能丢中国政府的脸、伤害中国的傲人国际成就的人，全数围捕。当时我们只知道，要买动警察的金额愈来愈高。他们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缉捕朝鲜难民，将他们遣送回国。愈来愈多可能的买主不敢跟弘伟交易，怕警察来搜查农场，强行将女人带走。

弘伟愈来愈暴躁易怒。大多数时间，他都在乡下推销他买进的女人，他希望我在身边帮他。我一方面想陪着临终的爸爸，一方面又得帮弘伟做生意，内心陷入交战。

我跟妈妈手边都没有爸爸的照片，觉得有必要帮他拍张照片好永久珍藏。他病重无法出门，我们便安排摄影师到公寓来拍照。爸爸穿了一件我们在中国帮他买的漂亮毛衣，我跟妈妈穿上我们最好的衣服，化了妆。我还戴上弘伟买给我的金饰。我跟妈妈一起把爸爸从床上撑起来，靠在我们之间，他勉强挤出微笑。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十岁。我爸瘦到不成人形，看着照片我几乎认不出是他。我们摆的姿势僵硬而刻板，死亡占据了我们之间的空隙。

爸爸的病情日渐恶化，后来他连呼吸都有困难，上厕所也要人帮忙。这对自尊心那么强的人来说是一大折磨，但他从不抱怨。他一天比一天衰弱，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跟我在一起。只是我年纪太小，不懂死亡

代表的意义。即使他走了，我还是觉得有天会再见到他，因为他总能想办法回来看我。

我可以陪着他的时候，他喜欢跟我说他小时候的事。他说他有次在惠山跟朋友在一起玩，差点把自己电死。那次他双手碰到通电的电线，整个人被弹到空中。醒来时人已经在医院，医院让他躺在水桶里，吸走他身上的电流。他讲起童年多半无限怀念，他说他小时候国家的配给系统良好，他和朋友每个月都有糖果吃。

他状况好的时候，我们会下象棋消磨时间。在朝鲜时，没人赢得过他，我从小到大也才赢过他几次而已，现在竟然可以打败他。即使他生病了，我也不会对他手下留情！有一天他露出微笑，把我拉进怀中亲亲我的头，呼吸仍然很吃力。

“研美，是你。”他说：“我又闻到那种婴儿香了。”

弘伟必须照顾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局势前所未有地紧绷，他愈来愈常发脾气。某天晚上，逃去沈阳又被弘伟抓回来的明玉喝醉了酒，吵闹不休。弘伟冲过去要打她，我跳到他们之间，替她挨了打，整间公寓闹得鸡飞狗跳。后来，我们把明玉送回她的中国丈夫那里，结果她又逃了，真的是雪上加霜。弘伟不得不回村里补偿买主，处理后续事宜。

一月初，妈妈打电话来时，我正好跟弘伟在乡下。

“研美，你得快点回来。”她说：“你爸快不行了。”

我听得出她很惊慌。我赶紧搭计程车回锦州，到达时爸爸躺在床上已经语无伦次。

“是你吗，研美？”他握着我的手问，但眼睛看不到我。“是我的女儿吗？我的女儿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呼喊的是我，还是已经失踪九个月的恩美。妈妈说他找出他的安眠药，一次全吞下肚。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就不会再对我造成负担。

“爸，”我哭着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我会陪着你。”

但其实我不能久留，弘伟一直打电话催我，要我回去帮他卖掉那些女人。但爸爸的灵魂很顽强，不肯离开他的躯体。最后我只好跟妈妈说我得走了，但是只要抽得了身，我就会马上赶回来。

爸爸撑了好几个星期。我不断搭公车或计程车回来看他的状况，一趟通常要好几个小时。弘伟愈来愈生气，也变得更暴力。有一次，他拿厚重的杯子朝我丢过来，打中了我的耳朵后面。又有一次，他当着我爸的面打我耳光。我不知道那段可怕的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最后，我爸再也无法说话，弘伟带我回去跟他道别。我一直抱着他，问他：“你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但他无法回答，只能睁开眼睛告诉我，他听到我了。我握着他的手，看见他的指甲好长。“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对他说。我小心翼翼地帮他剪指甲，边剪边帮他按摩手掌。我还没帮他剪另一只手，他就睡着了。

“我们可以明天再把它剪完。”说完，我就缩起身体，躺在他旁边的地上。

隔天早上七点半我醒来时，看见他已经停止呼吸。他的身体还是热的，我便躺在他旁边抱着他。他的眼睛是张开的，无论我把手放在他的眼皮上多久，都阖不上他的眼睛。在韩国我们会说，如果一个人死不瞑目，就表示他在人世间还有未完成的愿望。我想我爸还没有放弃寻找恩美，才无法安息。除非找到姐姐，不然我想我也会跟爸爸一样死不瞑目。

我伤心欲绝，不肯离开爸爸身边，无法相信我再也看不到他。我试着跟他说话，心想他或许会醒过来。要我怎么接受我心目中最强壮的人就这样死了，而我什么都无能为力。我帮他剪完指甲，还梳了头发，然后用毛巾帮他擦脸，拿毯子盖住他帮他保暖。我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太阳下山、我们不得不移走他的遗体为止。

爸爸还能说话时，我们跟他讨论过他的后事。他不喜欢火葬，因为他讨厌烧成灰的感觉，但他希望有一天能葬在朝鲜，火葬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整理好心情之后，我跟妈妈用工地拿来保护地板的厚纸板把他包起来。到了午夜，弘伟的两名手下帮我们把他搬进后车厢。

弘伟认为又到了该搬家的时候，所以我们收十了少数家当，北上前往朝阳。他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偷偷把我爸火化。即使面对死亡，我们也得躲躲藏藏。抵达之后，我们倒车停在火葬场前，搬出爸爸的遗体。我跟妈妈看着他们把爸爸的遗体推进火里，然后关上门。自从爸爸死后，这是我第一次放声啜泣，不久妈妈也跟着我一起哭，但周围的人要我们安静，免得被人听见。

过了一个多小时，遗体才烧完，除了灰尘和碎骨，什么也不剩。我们得尽快离开，不然可能会被发现，于是我开始把我爸的骨灰铲进我带来的盒子里。骨灰还很烫，机器操作员拿了手套给我，但是我把手套推开，徒手去捡骨屑和碎粒，想感觉他的重量；最后他剩下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离开市区，抵达一个叫羊山的小镇，那里有间房子可以让我们过夜。我们决定把我爸的骨灰埋在附近一个隐秘的地方，就在一处可以俯瞰河流的山顶上；爸爸一直很喜欢阳光和河流。妈妈留在弘伟朋友的家，弘伟和他的手下则带着我翻山越岭。我抱着爸爸



的骨灰，在寒冷刺骨的夜里跟着他们往前走。他们在冰冻的地面上挖洞，我把爸爸的照片放进箱子，然后把箱子面对着潺潺流水埋进土里，这样爸爸就可以一边望着河，一边等我回来。

爸爸走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世上这么孤单。

## 16绑架

弘伟逐渐捉襟见肘。中国政府在二〇〇八年的夏季奥运之前，奋力打击人口买卖，重创了弘伟的生意，他只好另觅赚钱的管道。我们又换了住的地方，这次搬到沈阳的一间公寓。弘伟开始寻找投资房地产的机会，希望能大赚一笔。

沈阳是日渐扩张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又是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但也有该地区的犯罪首都之称。暴力帮派和腐败官员把持了这座大城，北京当局虽然定期扫荡黑帮，但新的帮派很快又崛起。弘伟在沈阳认识的开发商都是黑道，不从事秘密勾当的时候，都在私人赌场消磨夜晚。弘伟会拖着我上这些烟雾弥漫、肮脏低俗的俱乐部，看他掷骰子或赌轮盘。他觉得我会带给他好运，但他赌输比赌赢的次数多很多。冬去春来，弘伟几乎放下所有的事业，迷上了“六合彩”这种数字赌博游戏。没多久，他每天都要输掉一千到四千五百美金，而且不吃不睡，除了赌博，什么都不管。他会一连消失好几天，然后带着喝醉的朋友回来，那些人嗑了药，疯疯癫癫，甚至把妓女叫进我们的公寓。我要是抱怨，弘伟就会对我暴力相向。

我跟妈妈再次陷入了绝境。弘伟一个星期给我们的伙食费不到十元（约一、三美金），我们都瘦成皮包骨，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我妈喉咙发炎，我却无法带她去看医生。对我来说，引爆点是有一次我们在街上散步，妈妈喉咙痛，我竟然买不起水让她润喉，因为在沈阳一瓶水将近要四角。这件事让我觉悟，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唯一的脱困方式是什么，我们母女都很清楚。

“研美，你不把我卖掉不行。”我妈说：“算妈求你，把我卖掉吧，我在这里只会变成你的负担。”

我觉得自己简直失败透顶。当初我要弘伟救出我的家人，结果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爸爸死了，姐姐还是下落不明，妈妈连吃都吃不饱。我甚至不敢想自己会如何，而且也不在乎。弘伟希望我替他生小孩，但我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我绝对不要生下强暴我的人的小孩。只是我对避孕一无所知，在朝鲜没有避孕这种事。所以一出现害喜的症状，我便立刻采取行动。中国有一种药只要吞下去就能中止妊娠，事后我觉得身体好像死了一次，或许确实是如此。但我从没想过情况会变得更糟。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我准备好要卖掉自己的妈妈。

我到处帮妈妈寻找好买主，但大家都怕警察找麻烦。我在之前卖掉的女人之间放出消息，其中一人打电话跟我说有可能的买主。对方是农人家庭，有个儿子还没结婚，开车往西过了朝阳才会抵达他们的村子，车程要几个小时。弘伟答应了这笔交易（我妈对他没有用处），我们一起去见买主。对方看起来是好人，家务不会太繁重，妈妈也能吃饱，对方还答应让她跟我保持联络。于是，我们用大约两千八百五十美金的价钱卖掉了我妈。

一回到沈阳，弘伟就把这笔钱赌光光。

如今，我又跟妈妈分开，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弘伟因为破产而意志消沉，把气都出在我身上。我尽管灰心，却感觉得到体内有一股力量仍不肯放弃。或许那只是怒火，也或许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直觉。我觉得我的生命总有一天会有意义。我的字典里没有“尊严”这个词或是道德是非的观念。我只知道什么事感觉不对劲、什么事我无法接受。目前的情

况我已经无法忍受，我一定要找到出口。

沈阳的朝鲜难民人数很多。其中大都躲躲藏藏，但有些人想办法弄到了中国身分证，能以韩裔中国人的身分在中国社会立足。身分证是找工作和摆脱恐惧的关键，于是我开始到处问弘伟的朋友，知不知道哪里有可能弄到身分证。即使是弘伟，也明白我必须学会照顾自己，所以他同意给我一些独立自主的空间。

他有个姓李的帮派朋友帮我弄到一张假身分证，但品质实在太差，谁也骗不过。后来有一天，我跟李和一对帮派情侣在一家韩国餐厅吃饭，我跟他们说了我的烦恼。那位女伴说她认识一个人，对方说不定能帮我弄到一张真正的身分证，至少能到几可乱真的程度。

吃完午餐，那位大哥的女人陪我走到一处高级场所，里头都是些打扮光鲜的人，应该是某种私人俱乐部或餐厅，只见服务生帮坐在舒适皮椅上、身穿高级西装的男人上菜。看到十几个美丽高挑、打扮优雅的年轻女孩陪坐在男人身旁，我大吃一惊。

大哥的女人似乎跟那里的许多人都认识，她边打招呼，边带我走向一张桌子。那桌只坐了一名穿着保守的男人，约四十出头，整个房间里唯独他身旁没有女伴，但其他人似乎都认识他，跟他说话时必恭必敬。

“这女孩是从朝鲜来的，她想工作，但需要先弄到一张身分证。”她说。

“坐。”他指着旁边的椅子说。我坐下来。他说他姓黄，要我这么叫他，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姓黄。

“来过这里吗？”黄问我，我说我第一次来。他查看我的手和手臂，看是否有显示我是妓女的记号或刺青。全都没有。

“你喝酒或抽烟吗？”

“没有。”我回答。

“很好。”他说：“永远别碰烟酒。”他把服务生、经理，甚至那些性感高挑的女孩叫过来，问我是不是在这里工作，他们全说不是。

“这地方对你不好。”他说：“你不会想落到跟这些女孩一样的下场。”

“我只想拿到身分证，这样我就能到餐厅工作。”我跟他谈。

“我有些警界的朋友，说不定能帮你。”他无所谓地说。这件事对我生死攸关，但他的口气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我说如果他愿意帮忙，我会感激不尽。

他问我愿不愿意到安静的公园坐一下，好好谈一谈。他给人的感觉亲切又有礼，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就答应了。我只能说我早该学乖了才对，但我对人的信任仍在。从出生以来，我就被教导要相信谎言，那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习惯。

在停车场等候他的车子，看起来像一部坦克车，车顶有一排灯，座位后面有一张特别订制的床。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我：“这种车在中国只有几辆。”

我们开车到城北的一座大公园，然后坐在车上谈。

“说说你的事。”他说：“你今年多大了？”

我才十四岁，但我骗他我十八岁，因为要满十八岁才能在中国拿到身分证。

“你有其他家人吗？”他问。

“我还有妈妈。”我说：“现在我还在找我姐姐，才需要身分证出去找工作。”

“有男朋友吗？”

“有个照顾我的男人，但我们渐渐疏远了。”

“那么你需要一间公寓。”他说：“我在城里有很多间公寓。其实呢，这座公园的对面就有一间，你可以先待在那里，等身分证下来。你想去看看吗？”

黄带我到在沈阳市一栋数一数二豪华的大楼。那间位在二十七楼的公寓看起来像间博物馆。他说他是个白手起家的艺术古董商，现在是沈阳名列前茅的富商钜富。后来我才知道他小学没毕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他在我的眼中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像黑道。

他的公寓里摆设了很多画、古董象牙佛像、陶瓷花瓶。他指着一把精雕细琢的木椅，说它大概值六十五万美金。

大厅有警卫，屋内也有保全系统，只要你走出阳台或开错门，警铃就会大作。那地方像堡垒一般。

“只要你待在这里，我就帮你弄到身分证，其他事我都会帮你搞定。”

一开始我很感激他。我打电话给妈妈，跟她说我很好，有个人会帮我弄到身分证。弘伟一直发简讯给我，但我要他不用担心。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一切似乎会顺利完成。

隔天，黄开车来接我去他的古董店，之后又带我去一个朋友的豪华大公寓，看他在室内练习场打高尔夫球。他带我去他母亲的坟前上香，再去看一个老算命师，对方跟他说我会帮他带来好运，还说在我的手相里看到我命中带子。

“你很特别。”黄告诉我：“我要你跟我一起生下这个儿子。”

我哑口无言，当下就知道我得设法摆脱这个男人，但他到哪里都不



让我离开他的视线，我不知道要怎么摆脱他。

我们开车到市区另一头的另一栋豪华大楼。他带我到一层住了七个漂亮女孩的公寓。

“你看，跟在我身边，你会有很多朋友。”他说：“你不会寂寞的。”

这些女生多半只有十七、八岁，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其中一个女生即将上大学，正在看书。黄躺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几个女生靠过来帮他按摩手脚，我趁机跟着其中一个女生走进厨房。

“我不想留在这里。”我小声对她说：“你可以帮我逃出去吗？”

“你疯了吗？”她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个男人有钱又慷慨。”

那天晚上，黄把我带回那间摆满艺品的公寓。我趁他在另一个房间时，再次拿出手机打给我妈。

“妈，我想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我用朝鲜文对她说：“这个人怪怪的，有好多女人帮他按摩。他说他希望我帮他生小孩，因为他什么都一帆风顺，就是缺个儿子……”

下一秒我反应过来时，黄已经站在我旁边。他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话，但一定听出我的语调有异，所以才从我手中抢走手机。

“你什么都不必担心。”他用中文对我母亲说：“我会帮你女儿弄张身分证，还会按月寄钱给你，一切都会很顺利。”我妈还是不会说中文，除了知道我被绑架，其他的她都听不懂。

黄挂上电话，把我的手机收进他的口袋。

然后他抓住我，我挣开他的手。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说：“我想要工作。”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冷酷无比。

“你知道脱北者被遣送回国会有什么下场吗？”他说：“他们会用铁

丝从这些人肩膀上的肌肉穿过去，串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跑不掉了。我可以今天晚上就把你送回朝鲜，我也可以杀了你，没人会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伸手抓我，我咬了他一口，他狠狠甩了我一耳光，鲜血从我嘴巴渗出。

看到我的样子，他往后一退。

“你知道，我犯不着这么做。”他说：“我要哪个女人都可以，她们都喜欢我，连女大学生也是。我也会让你喜欢上我。”

说完他就锁上门，把我一个人丢在公寓里。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逃出这个地方。我千辛万苦逃出朝鲜，可不是为了来当这个男人的奴隶，我也不是他精心收藏的战利品。弘伟再怎么坏，至少有点人性。但这个男人像爬虫动物一样冷血，我从没碰过这么可怕的人。

我一整晚试着打开公寓的门，却启动了警报系统，惊动了警卫。我被绑架了，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

隔天，黄回到公寓，并且改变了策略。他买了漂亮的衣服和首饰给我，要我试穿。“要什么告诉我，我都买给你。”他说。

“我要你放我走。”我说。

“不行。等我玩腻你之后，你还会求我留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被绑架了多久，可能有一星期，或许更久。

随时有人在监视我。黄不在时，便由他的情妇盯着我。我觉得自己又像以前一样走投无路。在这里就像在朝鲜，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沉重到足以填满整片夜空，把我的灵魂重压在地上，无法动弹。我找不到出路。

黄没再企图侵犯我，但他有时对我很粗暴。我不吃东西，他就硬把食物塞进我嘴里。他有时会威胁我，但下一秒又恢复和善。我想我永远无法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

后来有一天，我跟黄的情妇坐在他的旗舰古董店里，弘伟的李姓朋友走进门。黄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看看是谁来了。

“黄大哥你好。”他说：“幸会。”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黄问。

“谁会没听过你的鼎鼎大名。”李说，然后指着我的方向。“这女孩的母亲很想念她，弘伟要我来代为转达。另外，他也希望她回去。”

“跟弘伟说她不需要他了。”黄说：“是吧，姑娘？”

他看着我，我点点头。我很怕只要我稍有迟疑，他就会杀了我们所有人，包括弘伟和我妈。

“跟他说我对你有多好。”他说。

“他对我很好。”我跟弘伟的朋友说。

黄请他回去。

隔了一会儿，我的手机在黄的口袋里响起，他一直留着我的手机，监视我的通讯。一看到是弘伟打来的，他马上接起。

为了找我，弘伟把沈阳市给翻遍了。后来他联络上我妈，知道情况之后急得快发疯。靠着我妈的帮助，他终于查出我的下落。他跟黄的通话内容，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把她交出来，不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弘伟说：“要白要黑你来选。如果你想跟警察玩，我就带警察去；想跟黑道玩，我就找兄弟过去。”

“你真的要为一个女孩搞那么大吗？”黄问。

“不对，应该说，你愿意为她赔上性命和所有财产吗？”弘伟说。

那通电话之后，黄带我回到那间有警卫站岗和警铃系统的公寓。我知道弘伟有多大能耐，但也相信绑架我的男人不会轻易让步，我决定更换另一种策略。“我知道我错了。”我对黄说：“我不想回弘伟身边，你比他强多了。你何必跟他厮杀呢？他一无所有，你却要冒失去一切的风险。我会告诉他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我说服黄，我只想再见我母亲一面。“我很想念我妈，才会一直闷闷不乐。”我说。

我知道黄是冷酷无情的坏蛋，但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一定也爱自己的妈妈。“求求你让我再见妈妈一面，她就住在沈阳。见过她之后，我会回到你身边，然后我们就别管弘伟了。”

他相信了我的话。隔天他要司机载我去沈阳，但我说不用，他只要把我送上公车就好，这样比较省事。他完全以为自己赢得了我的心，就答应了，甚至把手机还给我。

公车一开出总站，我马上拨电话给弘伟。

弘伟在沈阳的公车站跟我会合。一看到我，他就哭了。

“我的研美啊，你在想什么？”他哭着说：“你根本不懂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他开车载我去我妈住的农场。没人知道我妈在哪里，所以弘伟认为我躲在那里，黄绝对找不到我。

我突然领悟到一件事：我被绑架之后，弘伟才开始想念我。我很惊讶他为了救我，竟然愿意冒那么大的险，跟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硬杠。我想弘伟自己也没料到。后来他告诉我，以前他从没因为爱一个人而冒过

险。

那户好心的农家欢迎我留下来跟妈妈一起住。本来，我们或许会待上一阵子，但是当时是二〇〇八年七月，北京奥运即将在八月开幕。警察在邻近村落挨家挨户查缉非法移民，我们已经听说好多个朝鲜女人被驱逐出境。接待我们的中国家庭担心镇上的人会告发我们，到时候警察也会搜查他们的农场。所以我们打电话给弘伟，他安排我们到我爸长眠的小镇避避风头。但那里的人很快认出我们是朝鲜难民，弘伟又把我们移到他的家乡朝阳。我们三个人一起住了一阵子，但身上都没钱。这期间，我妈联络上我们的朋友明玉（那个一再逃离中国老公的女人），她说她又回到了沈阳，甚至找到了工作。

“什么工作？”我妈问。

“不是什么奇怪的工作。”她说：“你们如果来沈阳，我介绍你们认识我老板。”

我跟妈妈又陷入绝境，而且经常搬家，不光是为了躲警察，也因为弘伟说我爸的鬼魂缠着他不放。

一开始，我爸会出现在他的噩梦中。后来弘伟走进空荡荡的公寓时，甚至会看见我爸在用电锅煮东西，或坐在床上盯着墙壁看。弘伟哭着跟我说，他知道我爸永远不会原谅他对我做的事。现在他知道他不得不放我走了。他跟我说，他很后悔夺走了我的童贞，也为这段时间对我的伤害感到抱歉，虽然他知道一切都太迟了。但他承诺会永远守护我，下半辈子他都会去帮我爸扫墓、上香。

我对他的感觉五味杂陈。我已经痛恨他好长一段时间，总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原谅他，但我的心逐渐软化。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且对我来说，他就像个奇迹。他救回了我母亲，把我爸带来中国，还帮我

把爸爸埋在这里。我知道他也很努力在寻找我姐姐。

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弘伟买了很多金饰给我，我一直藏着。现在我把首饰全部还给他，他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某方面来说，我仿佛是用这些首饰赎回了我的自由。

我谢谢他为我做的一切，然后跟他道别。

我跟妈妈搭下一班公车，前往沈阳。



## 17天上掉下来的面包

我跟妈妈抵达明玉在沈阳的公寓之后，她终于告诉我们，她可以帮我们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她说，我们只要在电脑上跟男人聊天就可以了。

明玉替一个中国“老板”工作。老板租了很多间装设了电脑和网络的公寓，他只是小主管，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层层连成沈阳成人聊天室的地下网络。这个网络的最底层就是走投无路的朝鲜女人，她们住在狭小的房间里，方便她们没日没夜地上网“聊天”。顾客（几乎都是南韩男人）会搜寻不同网站，找他们中意的女人，然后按分钟付费在键盘上输入问题，透过荧幕看女人宽衣解带，不过有些女人只会用话语挑逗他们，不会脱光。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让客人挂在线上愈久愈好，这样信用卡就会按他们的上线时间扣费。大部分的钱都进了老板的口袋。

以前我从没听过网络摄影机，对我跟妈妈来说，这是一种很奇特的赚钱方法。一开始，我试着找餐厅的工作，但没有身分证根本找不到工作。警察到处突袭检查，寻找非法移民，我们能找的工作非常有限。我虽然才十四岁，已经看过人为了存活所做的各种邪恶勾当，其中很多比成人聊天室还糟很多倍。我的遭遇惨是惨，但至少弘伟从没用毒品控制我，或把我送给其他男人。如今我们已经脱离他的羽翼，跟其他可能的悲惨遭遇比起来，聊天室似乎是比较简单的选择。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至少不用出卖肉体。你不属于任何人，而且还可以赚到不少钱。我打算先赚到足够的钱买身分证，一拿到身分证，我就可以去找更好的工作，照顾我妈。

我们开始工作不久，人很聪明又很有办法的明玉就离开了中国老板，自己开起聊天室。她用更高的薪水挖我们过去，我们便跳槽了。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科技程度很原始，但仍然把我们考倒了。我跟我妈以前从没看过电脑，所以得先学会打字，看着字从荧幕上跳出来。

我妈学得很辛苦。每当有顾客打开对话，她都得花很多时间摸索键盘，才能打出“你好”两个字，等她抬起头时，荧幕已经一片空白，客人也走了。

“妈，让我来。”我跟她说，虽然我打字也很慢，但客人似乎不介意等我。我拒绝脱衣服，他们也能接受。我只让他们看我的脸，如果对方很粗鲁或不死心，我会直接把对话切掉。这招对我来说很好用，也让客人对我更好奇。通常我只会打出他们想听的话，但同时我也跟一些人愈来愈熟，甚至有过真正的对话。我的聊天室变得很受欢迎，有时同时会有男人从六、七个网站连过来跟我聊天，我还得小心避免答非所问，弄错对象。

工作愈久，我赚的钱愈多。如果我一直上线，一个月扣掉给老板的七成分红，我能赚四千元左右（相当五百多美金）。

后来我跟妈妈终于能吃饱，不用再天天害怕被强暴，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不自由。聊天室不过是另一种牢房。一离开公寓，我们得频频往后张望，就怕被人认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比较害怕哪一个，是落入中国警察的手里，还是碰见黄或他的手下？我知道他还在找我，而且他不是那种被人出卖会善罢干休的人。

我们住的公寓附近有一家中学。从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跟我同年龄的女生背著书包跟同学玩耍谈笑。我问妈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

跟她们一样？”她不知如何回答。

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我妈认识一个叫惠纯（Hae Soon）的朝鲜女人。惠纯跟一个南韩男人住在沈阳。认识她之前，我跟我妈没考虑过要逃到南韩。但惠纯很熟悉这条管道，还说南韩人会接纳我们成为南韩公民，帮我们找到工作和住处。她也知道逃出中国有多危险。如果被逮到并送回朝鲜，你的人生就完了。朝鲜人到中国找工作是犯法的，逃到南韩则形同叛国，罪加一等，下场不是被送进逃脱无望的政治集中营，就是被处决。

惠纯说她知道一条逃离中国的路线。青岛的基督教传教士可以协助我们从中国逃到蒙古，那里的人欢迎朝鲜难民。到了蒙古，南韩大使馆会接手照顾朝鲜难民。惠纯想去青岛试试看，但她没有勇气单独上路，便邀我跟我妈同行。

听完这个女人的故事，我就知道我们非去蒙古不可。妈妈很害怕，她说我们在沈阳过得不错，离开这里风险太大，一直说服我放弃这个念头。但过去的那股渴望在我体内燃起，告诉我生命不只是为了存活而已。我不知道这一去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我宁可死，也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我应该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被猎捕的动物。我再一次紧握着妈妈的手不肯放开，直到她答应我跟我一起前往蒙古。

惠纯给了我们一名传教士的手机号码。妈妈打给他时，他说他也是脱北者，因为上帝的慈悲才保住性命，得到自由。我妈跟他说我们想逃到南韩，还有我们在寻找失踪的姐姐，她可能在南韩等我们。对方告诉我妈上帝万能，什么事祂都能达成。只要我们向上帝祷告，一切都会没

事。他留下一个号码，要我们联络青岛的人，那里的人会教我们更加认识上帝，也会帮助我们逃到南韩。

妈妈把这段对话告诉我的时候，我们都不懂传教士说的话。朝鲜是无神论的国家，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基督教上帝的事。但我们很乐意相信新事物，只要那能让我们活下去，况且“慈悲”听起来很正面。因此，尽管得到的信息不多，我们再次决定要放手一搏。

唯一的问题是钱。我们虽然存了一些钱，还是不够逃亡所需的花费。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肚子饿的时候，我总是相信只要意念够强，面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我爸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候，也抱持着同样的乐观主义。但光是乐观和努力并不一定会成功，还需要运气。或许那个老算命师说得没错。我的命运虽然波折，但一直非常幸运。

我们正在准备逃亡时，有个我在线上认识的朋友伸出援手，化解了我们的困境。他是南韩的专业人员，三十好几，是我的聊天室常客。我在线上认识的男人大都以为我住在首尔，因为我没说实话。但这个人不一样，他真的把我当人看，所以我跟他说了一些我的真实遭遇。他听了很震撼，才想要帮助我逃亡。后来他飞到沈阳跟我见面，拿钱贴补我们不够的费用。他说只要我逃到南韩之后给他一通电话就好了；我觉得他其实连一通电话都不奢求。他是个寂寞的男人，但心地很善良。

过没多久，我们便准备动身了。妈妈问明玉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但她还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不敢说走就走。

二月初，离开沈阳的时机已经成熟。这趟危险之旅对我们形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咖啡色的花呢外套以便在路上穿，行前我们还到一家韩国餐厅大吃一顿（平常我们绝不会做这种事），甚至

到卡拉 O K 唱歌，不过是那种让人聚会欢唱的普通卡拉 O K。

我不大会唱歌，但我一直很爱妈妈的歌声。小时候，她打扫家里或哄我睡觉时会唱歌给我听。她的歌声是我听过最美妙、最温暖的声音。再次听到她的歌声，粉碎了我这些年来在心里筑起的高墙。将近两年来，我觉得自己的五官都已麻木。我感觉不到、闻不到、看不到、听不到，也尝不到周围的世界。如果不过滤周围的事物、照单全收，我很可能会疯掉。如果我让自己哭出来，可能永远停不下来。所以我努力存活，但是从不觉得开心，也从不安心。此刻，听着妈妈唱起老歌，那种麻木的感觉逐渐融化。对妈妈无止境的爱，还有害怕失去她的巨大恐惧，将我整个人淹没。恐惧的感觉就像身体的痛，把我的胸口挖空。她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她就是我的全部。

我要守住我对爸爸的承诺：保护妈妈的安全，还有找到恩美。那表示，必须想办法逃到南韩。

## 18跟随星星的指引

隔天早上，我、我妈和惠纯坐上公车，展开从沈阳到青岛的漫长旅程。这趟路大约有七百五十哩远，途中随时可能有中国警察把我们拦下来，要求检查身分证。但我们运气不错，两天就顺利到了青岛，没遇到临检。

青岛是个庞大而现代的港口城市，隔着黄海跟南韩遥遥相望。有护照的旅客从这里飞到首尔的仁川机场只要一个多小时，但脱北者得走另一条更曲折的路，才能奔向自由。

到了青岛公车站，有个韩裔中年女子来接我们到一栋公寓。附近是一片不起眼的社区，我们被丢在其中一个（青岛市内至少有两个）由新教秘密教团管理的收容所。那是一整个地下逃亡路线的第一站。脱北者在这里一边接受圣经内容的训练，一边等待前往蒙古的机会。这个传教团的负责人是一名南韩牧师，当地的韩裔女人和中国基督徒会帮忙安排旅程，冒着危险带我们前往蒙古边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宗教团体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往往掺杂了暴力。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扫荡殆尽。虽然经济改革到后来，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开始允许一些教堂公开运作，但仍禁止基督教传教团对非信徒传教，帮助朝鲜人逃到别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听说，如果当局发现青岛教团做的事，牧师和其他人员都会被送进监狱，我们也会被遣送回国。因为这个原因，传教士从不对我们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们三个人跟另外八、九个女性脱北者合住一间小公寓。我们不能



发出太多声音，也不能自己走出公寓，虽然有些人照样出门。每人每天有五元（约六十五分美金）可以买食物。那个韩裔女人每周会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购物。幸好我跟妈妈有钱多买一点食物跟其他人一起分享。

以前我跟我妈从没听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有位脱北者对我们说：“就把上帝想成金日成，把耶稣想成金正日，这样你们就会懂了。”

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只是假装配合。如果要把耶稣当成救星才能逃去南韩，那么我愿意当全世界最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祷告，然后读一整天的圣经。牧师要我们用朝鲜文抄一页又一页的圣经箴言，也常要我们唱圣歌、祈祷和忏悔。理解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这个概念跟我们在朝鲜认知的“敬爱的领袖”很像，一样无所不知，一样会供应我们一切，只要我们对祂忠心不二。我不理解的是，祂怎么会是一个慈悲的上帝。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个上帝存在于南韩，却不存在于朝鲜。

但不久之后，圣歌和福音精神将我融化，我完全接纳了这套传达希望的讯息，同时我也发现我很会祈祷。

我们抵达不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善禧（Sun Hi）。她跟她的中国“丈夫”和九岁女儿兴心住在邻近的省份。之前，我们曾经一起住在弘伟的公寓一小阵子，她跟我妈很快成为好朋友。她们年龄相仿，都是惠山人（虽然在惠山的时候并不认识），而且都在寻找消失在中国人口买卖网里的大女儿。善禧的命运曲折又悲惨，不过她很坚强，甚至长保乐观开朗，我们都把她们母女当作自己的家人。

妈妈把我们的逃亡计划告诉她，还跟她说只要联络传教团，她也能

逃去南韩。善禧和小女儿在丈夫的农场只能勉强糊口，她也很想找机会逃走。她们母女在二月中抵达青岛，加入我们的团体。

可惜那时候我们已经准备搬到另一间公寓。我妈跟个性强势的惠纯处不好，她的反应或许是压力造成的，但她无论如何不想再跟惠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不想跟她同行。我们捐了一些钱给传教团当作谢礼，不久搬到另一间类似的公寓，那里有另一群人等着前往南韩。这群人刚好是预定前往蒙古的下一批人，所以我们会比其他人更快离开中国。

除了我和妈妈，新组员还有三个女人。一个在中国住了将近十年，一个二十出头，一个跟我妈差不多年纪。此外，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和三岁的儿子，这家人的南韩亲戚付了一大笔钱请掮客把他们带出朝鲜，所以他们直接越过边境来到青岛的传教团，之前从没在中国住过，一个中文字都不认得。

我跟妈妈都喜欢这群人，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已经完成圣经的训练，牧师认为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动身。

二月底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时，牧师集合大家召开祷告会，一起赞美上帝、向上帝忏悔。这个仪式对朝鲜人来说似曾相识。我们围成一圈坐在一起自我检讨，祈求上帝原谅我们犯的错。

我们之前跟牧师进行过很多次这样的仪式，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忏悔完后，牧师问：“你没有更多话想说吗？”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转头去看我妈。“你们应该有更多罪想在大家面前忏悔？”

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我跟妈妈用眼神默默传递内心的想法，我们只想得到一个可能：别组有人跟牧师说了我们在聊天室做的工作。

“我们私下跟上帝忏悔就好。”我妈说：“一定要在大家面前忏悔

吗？”

他说“对”，我们只好在众人面前和盘托出，求上帝原谅。

我们泣不成声，牧师于是请其他人先离开房间。

我跟妈妈对牧师说，我们曾经在沈阳的聊天室工作，但我们很后悔。当初那么做只是为了存活，我们认为上帝已经原谅我们了。

牧师严肃地摇了摇头。

“不，你们是罪人，我不能让你们以罪人之身前往蒙古，你们会拖累那些无辜的人。”

我们不断哀求他，向他保证我们绝不会再做那种罪孽深重的事。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后悔。他能不能原谅我们？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他回答：“你们要祈求上帝原谅你们。”

我妈接着说：“你说得对。我们罪孽深重，如果诚心忏悔，上帝还是不原谅我们，那我们也不敢跟其他人同行，连累他们。我们只能继续忏悔，求上帝怜悯。”

牧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念了一段朝鲜文的〈以赛亚书〉：

“上主说：‘来吧，我们来理论！虽然你们的罪污朱红，我却要使你们像雪一样的洁白。虽然你们的罪污深红，我却要使你们跟羊毛一样的白。’”

这段话抚慰了我，我一再为牧师的祷告表达感谢，但祷告结束之后，我为自己为了存活而做的事感到肮脏、羞愧。

隔天，那名韩裔女人告诉我跟我妈，我们可以跟同组人一起走了。

出发之前，牧师又来公寓带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一路平安。他把我拉到一旁说：“在南韩要正正当当过日子。”我听得出来他对我的期望不

高，他认为我的过去会影响我的未来。我要怎么告诉他，我只想要活下去，获得自由。

我们这组人计划晚上徒步越过边境到蒙古。那时刚好是一年最冷的时候，戈壁沙漠可能降到华氏零下二十七度。冬天越境通常比较安全，因为中国边境的巡逻比较宽松，他们不会想到有人敢冒着冻死的危险走这条路。但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抵达边境之前就被逮捕。我跟妈妈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抓。她在身上藏了很多安眠药（就是当初我外婆用来自杀的那一种）；我在花呢夹克的腰袋上藏了一片剃刀，这样他们把我送回朝鲜前，我就能割喉自杀。

动身前一晚，我打电话给弘伟。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我对他的感觉还是很复杂。但此刻，面对这趟生死未卜的旅程，我对过去的事已经比较释怀。我花了太多时间和力气痛恨别人、痛恨别人所做的选择。如今我才十五岁，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对经过我生命的人表达爱和感激。我告诉弘伟，我祈祷我爸能原谅他，不再纠缠他，也祈祷我能原谅他。我还告诉他，我要从蒙古逃到南韩，如果我死在沙漠里，他会是世界上唯一记得我的人。

说完后我哭了，弘伟也因为情绪激动而声音哽咽。

“再见了，研美。”他说：“我祝你一路顺风，请你要活下来。”

这一次他总算得偿所愿。

我们花了四天才抵达边境，那四天很漫长。有个替传教团工作的汉人，陪我们搭火车和公车到边境。他中等身高，看上去四十好几，长相平凡，这样护送没有证件的脱北者出境才不会引人侧目。他不会说朝鲜

文，而我又是组里中文说得最好的人，所以负责帮他翻译，告诉组员如果被警察拦下该如何反应。“如果有人被抓，请不要放弃组里的其他人。”他说：“告诉警察你只有一个人，好让其他人顺利逃走。”

在青岛坐上火车时，大家当然很紧张不安。我们搭了一整天的车，在车上装睡，这样才不会有人找我们说话。到了北京我们换搭公车，车子在山里绕来绕去，中国古代皇帝在这里建造了绵延曲折的高大石墙，阻止北方大草原的蛮族入侵。沿着两线道高速公路进入内蒙古的沙漠高原之后，周围的土地愈来愈平坦、空旷。我们只带了小背包，没有其他行李，背包里也只有瓶装水、干粮和少数个人物品。我们紧张地抱着腿上的背包，四下张望公路上是否有路障或检查站。谢天谢地，都没有。

漫长的路途在二连画下句点。这个边境小镇灰尘漫天，位在广大的戈壁沙漠中间。我们抵达时还很早，带路人四处寻找能让我们躲到晚上的地方，但因为我们的证件不合格，只得到处碰壁。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间收现金、不会问东问西的旅社。

我们在房间里焦躁地等待天黑。我跟妈妈对经营旅社的情侣起了疑心，虽然冷得要命，我们照样开着窗户，这样一听到警察的声音才能马上跳出窗户。太阳逐渐西沉，带路人说他会把我们丢在接近边境的地方，之后我们得靠自己了。由于小男孩的父亲是队上唯一的男人，大家选他当队长，带领大家横越沙漠。传教团的韩裔女人给了我们两支手电筒和两个指南针，带路人教男孩的父亲怎么找到方位。我们要从被放下的地方往西北方走，越过五道铁丝网才会走到一堵很高的围篱，到了那里表示边境到了。进入蒙古后，我们一看到人要表明自己是朝鲜难民，这样才能获救。如果没看到人，我们就得去找铁轨，沿着铁轨走到最近的城镇。



理论上来说，这么做应该可以成功。

有辆计程车在黑夜中驶来，载我们到市郊几哩外的一座工地。小男孩的爸妈叮咛他等一下在沙漠上不能哭，不然会泄漏我们的行踪。幸好他很乖，沿途都没发出声音，不过我们也准备了镇定剂以防万一。

我们的中国带路人给了我们最后的指示，我翻译给大家听：“如果你们望着沙漠，会看到蒙古那边的小镇发出明亮的灯光，朝着灯光走就对了。”他说：“中国那边的灯光微弱许多，别靠近那里。”

四分之一个月亮挂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上，与星星争辉。带路人指着最明亮的一颗星。

“如果跟大家走散了，或是无法使用指南针，只要抬头找到最亮的那颗星星，那边就是北边。”

之后，他送我们上路了。走了几步，我跟妈妈回过头，看见他跪在结冰的地面上，双手合十举向天空。我不禁纳闷：这个人甚至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为什么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跟妈妈感动到流下眼泪。我默默在心中祷告，向他道谢，我们一行人渐渐消失在黑夜中。

周围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没有可供掩护的地方。眼前只有一望无际、一成不变的沙土和石头，一丛丛干草点缀其中。寒风像一头生物，偷偷尾随在我们身后，勔力拉扯我的皮肤、抓住我的脚，拖慢我的速度。我立刻后悔自己没穿防风大衣，只穿了在沈阳买的花呢羊毛外套。传教士要我们尽量减轻行李，但我太死脑筋，连手套和围巾都没戴。我靠着妈妈取暖，看到我直发抖，她把身上的厚大衣脱下来给我穿。我妈的鞋子太薄，不适合这种粗糙路面，所以她一再跌倒。于是男孩的爸爸拿出一双多余的运动鞋给她穿。尺寸太大，但我妈把鞋带绑得很紧，牢



牢固定在脚上。没有他的帮忙，我妈很可能走不完全程。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晚。每当听到声响或看到远处的车灯，大家都会绷紧神经。钻过了第四道铁丝网，我们听到远处传来发动机声，之后便看见一盏巨大的探照灯扫过沙漠。我们马上趴在地上，不敢乱动。男孩的爸爸手里有一支联络用的手机，他拨手机给青岛的传教团，问牧师知不知道那个探照灯是中国人还是蒙古人的？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牧师的回答是：“别被抓到就对了。”

我们一直趴在地上祈祷，直到声音和灯光愈来愈远。我们不敢打开手电筒看指南针，只好看星星辨认方向，连走带爬地横越沙漠。穿过第五道铁丝网之后，我以为苦刑很快就要结束了。但后来几朵云遮住了星星，我们迷失了方向。有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原地绕圈圈，后来终于想到一个方法：大家围在男孩父亲的周围，帮他挡光，让他打开手电筒看指南针，找出正确的方向。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天气愈来愈冷，我开始觉得我们永远走不到了。我想像自己死在这片沙漠上。会有人找到我的尸骨，帮我立坟吗？还是我会从此消失，被人遗忘，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世界上是那么的孤单，是我从小到大觉得最可怕也最悲伤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也开始痛恨金正日这个独裁者。以前我从没想那么多，但此刻我怪他让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我终于允许自己对他有负面的想法，因为即使他能看穿我的心思，我大概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他能拿我怎么办？再杀我一次吗？即使面对死亡，背叛敬爱的领袖可能还

是我做过最艰难的一件事。我已经不在他可以惩罚的范围，但还是觉得不管到哪里，他的手都跟着我，试图把我拉回去。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晚我们在黑夜中蹒跚前进时，她也想着同样的事。

正当我心想情况不会更糟的时候，一群野兽在黑暗中将我们包围。我听到它们擦过地面、呼呼喘气的声音，也看得到它们的眼睛反射黯淡月光所发出的微光。我不知道它们是山羊还是野狼，但我完全吓傻了。

“救命啊！有人在吗？谁来救救我们！”我大声尖叫，完全不管出现的会是中国人或蒙古人。

但完全没人回应。

我已经准备放弃，躺下来等死。我再也走不动了。几个小时前，我开始出现幻觉，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了铁丝网。“妈，你看！”我反复说，但每次走到那里都发现什么也没有。

天快亮时冷到不行，大家都怕会活活冻死。绝望之下，我们用沙漠上捡来的干树枝和干草生了一小堆火，但火实在太小。我们正在讨论把多余的衣物当作燃料，拿来生火，突然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声音听起来好近，我们原本还以为这里是荒郊野外。在冰冷而沉滞的空气里，声音似乎是从两个地方发出来的。其他人都往一个方向跑，只有我跟我妈往另一个方向跑，因为我们认为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几分钟后，巨大的边境围篱在我们前方隐隐浮现。我以为又是我的幻觉，但我们看见铁丝网上的破洞，还有前人钻过去时被铁丝钩破的碎布。就是这里！我们手脚并用从洞口爬过去时，尖锐的倒刺划破我的长裤和外套，像要把我拉回中国。妈妈帮我扯开衣服，一瞬间我们自由了。

太阳在我们背后升起，把我们又长又淡的影子打在沙漠上，我们终

于踏上了蒙古的土地。妈妈抓住我的手，提醒我今天是三月四日——我爸的生日。

## 第三部 南韩

## 19自由之鸟

我们才呼吸了几分钟蒙古的自由空气，一名穿迷彩服的士兵朝着我们跑过来。

他举起步枪，用我们没听过的语言吆喝了几声。这表示他是蒙古人，我们得救了！

“谢谢！谢谢！”我用中文大喊：“谢谢你！谢谢你！”

士兵一直对我们叫嚣，但我欣喜若狂，高举着双手蹦蹦跳跳。他努力绷住脸，但还是忍不住笑出来。

我们队上的其他人把双手高举过头，从远方走过来，后面跟着更多个拿枪指着他们的士兵，气氛顿时改变。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之后，蒙古士兵同时对着双向无线电通话，场面变得很混乱。几分钟后，三、四辆军用越野车轰隆隆地从宽阔的沙漠开过来，将我们包围。

有名高阶军官坐在其中一辆军车上，他命令我们八个人挤进他后方的两排座位。我们一上车，他转过头用不太灵光的中文说：“Hui zhongguo.”意思是：“回中国。”

我呆住了。不应该这样的！我们想都没想便跳下车，只剩我妈和那个爸爸抱着儿子留在车上。士兵试图把我们推掉头上，但我们死命抓着他们的制服边哭边哀求：“救救我们！请不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会被处死的！”

我伸手去摸藏在腰带里的剃刀，随时准备拿出来割断自己的喉咙。我是认真的，今天就是我的末日。

“如果你们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就自杀！”我哭喊着说。

“对！我们宁可死！”另一个女人跟着喊。

士兵一脸惊恐，甚至有点羞愧，最后他们其中一个说：“好吧，那就去首尔。”

这句话安抚了大家的情绪，于是我们坐掉头内，但一察觉司机往中国边哨的方向开，我们又开始惊惶失措。

“不可以！我们不能回去！”我大喊，大家又跟着我哭号哀求。

我们其中的一个朝鲜女人轻推男孩父亲的手肘，说：“快祷告！”他轻声回答：“我正在祷告！”

我一慌就忘了祷告词，但传教士教过我们，无法祷告的话，简短说几个字也可以。于是我在脑中不断默念：“耶稣的血就是我的血。”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感觉用在这个时刻很适合，而且那是我唯一想得到能帮助我们活下去的一句祷告词。此时此刻，我显然无法靠人活下来，所以我要对岩石、树木和天空祈祷，求它们帮助我们离开这里。

妈妈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救自己的女儿。她想过要把我推出车门，这样我就可以在车子开到中国之前逃走。在朝鲜，很多人为了避免被抓，会从行驶中的火车上跳下来。但她又想到汽车跟火车不一样，随时可以停下来，对方能轻易把我抓回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以死明志，幸好最后没有走到这一步。

车子摇摇晃晃开过小镇，开过通往中国边哨的路，一直往前开，最后转进一座蒙古的军事基地。

军车一通过栅门，我们八个人被送到看似营房或监狱的一栋平房。女人被带进一间房间，有名女兵命令我们脱掉衣服，甚至连我们的毛发都检查，目的是看我们有没有藏钱或毒品。她拿走妈妈身上剩下的人民



币。这里的人把我们当犯人对待，而不是难民。不过，他们让我们住有上下铺的大房间，还给我们东西吃。我们在这座军事基地待了一个多星期，那里的士兵常说要把我们送回中国，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说真的，还是只是吓唬我们。

每隔一阵子，会有蒙古军官来帮我们拍照、问我们问题，我被找去帮大家翻译。除了那个小男孩，我是队上年纪最小的，但因为我可以跟蒙古人沟通，便扛起了这个责任。

后来有几名军官带我们搭火车到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们先是换到另一座基地，后来又换到乡下一处安全收容所。我们抵达时，那里已经有二十几名脱北者，每当有人迁出就会有更多人迁入。

男女分发到不同的房间，但房间里没有床，只有铺了毯子的木板。工作人员一星期会烧一次热水让我们洗澡，每次都是男人先洗，跟在朝鲜时一样。因为仍是冬天，大家多半时间都冷得受不了，但是没有人抱怨。对朝鲜人来说，这样的地方很常见，甚至算得上奢侈，但南韩人可能会说这里是囚犯营。

我们不能擅自离开，睡觉、吃饭和工作都要遵守严格的作息表。大人打扫室内，我通常负责打扫外面。大概每周有一天，南韩大使馆会派代表过来问我们问题，要我们写下自己的经历。但大使馆的人不肯说我们还要等多久，也不肯告诉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蒙古和南韩政府之间显然有某种协议，才把脱北者藏在这里，直到把人送往首尔为止。蒙古的官方政策允许从中国来的朝鲜难民前往第三国，但实际的情况又很模糊不清。事实上，脱北者困在一场存在已久的政治经济拉锯战中，动弹不得。蒙古曾经是苏联的附庸国，如今成为一

个市场经济日渐发展的多党派民主国家。它跟南朝鲜在外交和经济上都有往来，跟中国和美国也是，而它处理朝鲜难民的方式，似乎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跟这些国家的关系紧密程度。二〇〇五年，每个月约有五百名朝鲜难民越境而来。二〇〇九年我们越过边境时，这个数字大幅下降，因为中国加强了边境巡逻，而蒙古跟平壤也愈走愈近。带人过境的掮客和传教团眼看情势不妙，逐渐放弃蒙古这条路线，改走另一条路线，取道东南亚前往南韩。

事实上，我们八个人是青岛传教团送往蒙古的最后一批人。我们离开之后一个月，善禧跟她女儿也来到了蒙古。因为我跟我妈跳到另一组，所以善禧、兴心和爱惹事的惠纯被分到第三组，甚至比我们一开始排定前往蒙古的时间还要晚。这对她们来说是因祸得福，因为我们原先待的那一组到了边境之后被中国士兵逮捕，全部遣送回朝鲜。

他们被捕后的两个星期，善禧那组才动身出发。他们跟我们一样，爬过围篱就遇到蒙古的边境卫兵，对方也说要把他们送回中国。善禧真的吞下毒药抵死抗拒，对方只好把她送往医院急救。后来，我们听说青岛传教团不久之后就关闭了，那个韩裔女人和我们的带路人，都因为帮助朝鲜人投奔自由而被捕入狱。

我跟妈妈不知道我们被关在蒙古多久、会不会被送回中国。一天又一天的等待让我们心灰意冷，但是在户外工作有助于转移情绪，因为这样就不会觉得自己被关在监狱里，而且乌兰巴托周围的风景很美。有时妈妈会跟我一起望着远山，想像我们自由了。一天好几次，有闪亮耀眼的银色喷射机低空飞过，从山谷某处的机场飞往别的地方。飞机愈飞愈高时，看起来就像毅然决然飞向自由的大鸟。妈妈看到我盯着飞机看，

就说：“我们会搭那样的飞机去韩国，我们很快就会自由了。”我想像自己坐在那样的飞机上，消失在蓝天中，却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事。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一名南韩代表到收容所接我们，开车载我们到乌兰巴托的国际机场。因为没有证件，我们拿到了印着假名的南韩护照，好让我们通过蒙古的海关和移民局。

南韩代表提醒我们在机场不要说朝鲜文，于是我们在出境大厅等候时一句话都不敢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每次看到穿军服的人，我都吓得魂快飞了（我有时还是会有这种习惯反应）。最后，我们终于被送上飞机。中间没被拦下来，让我松了好大一口气。这当然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坐定之后，我跟妈妈不敢置信地看着彼此，我举手跟她击掌。那是我从韩国电影里学来的手势，我已经准备好要当南韩人了——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等待起飞时，我跟妈妈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的人，正站在人生的某个转捩点上，千头万绪从脑中掠过。我重温了在戈壁沙漠上走的每一步，也想起我们跨过冰冻的河流到了中国，惊险逃过掳客和黑帮的魔掌，最后抵达蒙古的过程。我在脑中看到了爸爸，他仿佛一路陪着我，帮助我活下来，指引我度过危险。我很惭愧没让他尝到自由就看着他死去，现在我要走了，他却不在我身边。我体会到了存活者的羞愧感，因为有这么多亲朋好友死去或困在人间地狱里，而我们却活了下来。但妈妈的快乐，以及很快能找到姐姐的希望（如果她不是已经在韩国等我们的话），减轻了我的悲伤和罪恶感。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迫不及待要看飞机起飞，这样就能亲眼看到之前只在照片和影片中看过的海洋和海平线。但飞机一开始往跑道高速竄

士，我开始严重晕机。接下来三个半小时的航程，我都不敢看窗外，即使飞机朝着南韩的仁川机场降落时也一样。我不想因为晕机，毁了我第一眼看到的自由世界。

根据指示，我们得留在位置上等机上乘客走完。之后，有个国家情报院（南韩的中央情报局）的人上飞机，护送我们走出去。后来又来了更多探员，一起把我们带离机场。这些人帅气又英挺，说话腔调很好听，就像我在盗版片上看到的南韩演员。妈妈不得不戳戳我，免得我盯着人家不放。

下了飞机，我仿佛踏上另一个星球。我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灯光明亮、宛如洞穴的白色走道。电动步道像魔毯一样往前滚动，带我们到主要航厦。从另一个方向滑过去的时髦南韩女孩穿着漂亮的皮夹克、迷你裙，耳朵上别着糖果色的耳机。看见她们，我好想钻进地洞里，藏起我身上的破旧花呢外套和缝缝补补的牛仔裤。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地方，穿得像个乡下穷女孩，感觉好丢脸。

到了电动步道的尽头，我不敢踩上光滑的大理石地板，那看起来像冰冻的河流一样滑，我怕自己会滑一跤。我在厕所逗留了很久，大家都在等我。我以为自己在中国看过现代厕所，但眼前所见还是让我目瞪口呆。马桶光滑又干净，我还以为是给人洗手的地方。一排洗手台的水龙头在人走过去时神秘地打开，接着又突然关上。我怕丢脸，不敢问人要怎么使用，只觉得自己又笨又矮。所以说，还没正式踏进南韩，我就觉得自己好失败。

情报院的英挺探员迅速带我们八个人穿过机场的后走道，坐上一辆等着我们的巴士。

我们到的第一站是医院。我在那里做了生平第一次的身体检查。看着医生用那么多现代仪器帮你检查感觉很怪，但最怪的还是护士小姐竟然要我尿在杯子里。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她们给我的杯子很好，我才不想拿来尿尿！

报告很快出来了，我顺利过关，没有肺结核，也没有传染病。我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踏上下一步旅程。

国家情报院是一个管制出入、戒备严格的机关，离首尔约一个小时内车程。我们一抵达，身上的家当就被收走，每个人拿到一个装满衣服、洗发精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大袋子。亲切的欢迎仪式到此结束。这地方一看就知道比较像监狱，而不是难民收容所。安置我们的人动作粗鲁，说话也是，连对小孩也不例外。我跟在蒙古一样被带到一个房间里脱光光彻底搜身，我再次觉得受到羞辱和侵犯。以这种方式展开自由生活，真教人沮丧。

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剔除冒牌难民，例如想移民到南韩的韩裔中国人，还有冒充脱北者的朝鲜间谍。这层考量是合理的，这些年确实有几十名脱北者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但这在两万六千名通过国情院检核、如今在南韩定居的脱北者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情报院的探员对我们说，我们要先接受质问和调查才能进入南韩。我跟妈妈得决定要向他们透露多少事实。自从在青岛跟牧师坦承我们曾在聊天室工作，看过他的可怕反应之后，我们很担心泄漏自己的过去。我们认为这些南韩人知道的愈少，对我们愈好。所以我们把我十三岁就被卖到中国，还有我当过弘伟的情妇的部分拿掉，另外编了一个故事。但故事太复杂又难记，后来我妈决定还是照实讲比较容易。她只隐瞒了



她跟爸爸离婚的事，因为在她的认知里那一直是演戏，不过是为了在爸爸坐牢期间方便她变更居住地。跟爸爸保持婚姻关系（即使他已经过世），是她对爸爸表达尊敬的方式。

搜完身，我们一行人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头挤满二十几个刚抵达的脱北者，大家躺在地上铺的毯子上。那里的人给了我们每个人纸笔，要我们写下自己的详细资料。交出资料后，我们可以聊天、睡觉，或是看闭路电视（但只有朝鲜文配音或有字幕的迪士尼频道）。我从电视上认识了海底的生物、热带的荒岛，还有非洲的鳄鱼。我甚至第一次看见婴儿怎么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大。那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但非常有教育性。那里的伙食也很好。我们吃了很多点心和饼干，还可以排队领新奇又美味的食物，比方以前我从来没吃过的咖喱。有些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刻薄，但大部分的人非常亲切和善。我们每天有几个小时可以运动、伸展四肢，除此之外，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看着旧人迈向新的阶段，新人进来递补空出的位置。

我们从认识的人那里听过许多可怕悲惨的故事。听说明玉有一个在聊天室工作的朋友花钱从东南亚逃到南韩，但还没到泰国就淹死在氾濫成灾的湄公河上。我跟妈妈原本也想走那条路线，后来因为太贵而作罢。这趟逃亡之旅没有绝对安全的路线，我们能活着抵达已经非常幸运。

在集体等候室待了约二十天后，我跟妈妈被移到较小的房间，跟一个带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一起住。她跟我妈说，她眼睁睁看着丈夫被捕，却为了保护小孩不得不假装不认识他，为此她非常地内疚。妈妈说她做了正确的决定，试图安慰她，但晚上睡着之后，她都会呼喊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个多礼拜，终于轮到我们接受调查。我跟妈妈被移到单人房，每间单人房都配有小床、桌椅和一套小卫浴。吃饭时间到了，会有人送食物进来，顺便把上一餐的餐盘收走。

负责问我话的探员是个中年男子，长得很高，说话有种温柔的腔调，一开始我觉得很迷人。但他问的很多问题让我觉得很别扭，跟在青岛时一样。

一开始，他问我在学校学些什么，还有一些只有朝鲜学童知道的事，例如少年先锋队的入队誓言。他要我画出邻里街坊的地图，还问我们家在朝鲜是做什么的。有时我会被带到他的办公室回答问题，有时他会打电话跟我确认我妈说的事。我知道这是必要的程序，但这弄得我神经兮兮，尤其是他要我谈在中国发生的事的时候。

调查快结束时，他问我：“你身上有刺青吗？”

我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你是妓女吗？”妓女在中国经常可以从手臂或背上的刺青辨认出来。这个男人觉得自己有权利问我这样的问题，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这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他一定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曾在聊天室工作。此刻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他刚从鞋子上刮掉的脏东西。在他眼里，我比昆虫还不如。

“没有，我没有刺青。”我说。

“你确定？”他又问。

“没有就是没有，为什么你就是不能相信我？”

“你知道我可以叫个女的进来，把你的衣服脱光检查。”

“你查啊！要查现在就查！”

“好好好，放轻松。”他说：“我相信你。”

探员试图转换话题。“所以到南韩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毫不迟疑地说：“我想读书，然后上大学。”

他惊讶地哼了一声，说：“我想很难。”接着补上一句：“但我想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我在心里暗想：犯人才需要第二次机会。我知道自己不是犯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下来。但我的心已沉到谷底，我发现自己在这个地方毫无希望。我觉得自己很肮脏，彻底迷失了方向，就像之前听牧师指责我们的罪恶时一样。如果大家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这样对待我，那么我势必得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在南韩可以立足、出人头地的人。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都在努力存活，我在朝鲜撑了过来，在中国也用另一种方式活下来，但到了这里，我却怀疑自己有没有力气活下去。我觉得好累。

回到牢房般的房间，我看着窗外。我原本以为到了这个国家就能获得自由，但现在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地狱。只要把手腕架在尖锐的金属窗台上，深深划一痕，我的生命就会像一场突来的风暴猛烈炸开，然后快速流逝。

但我想起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我跟爸爸一样，发誓不找到姐姐，死也无法瞑目。我想活着再见到她。

从中国逃到南韩期间，我跟我妈问了我们认识的所有人有没有看过恩美，但没人看过她。我们一到国情院，就把她的名字给了国情院的探员，但他们没有她的纪录。我大受打击，但还是没有放弃希望。如果她还在中国，只要让她知道我们在哪里，她就会想办法来找我们。

六月初左右，包括我们在内、共约一百三十名刚到南韩的脱北者准备好要离开国情院。我们都通过了国家安全检查。离开的前一晚，工作人员为我们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欢迎我们展开新生活，也祝我们好

运，他们知道这样的鼓励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的下一站是教导朝鲜人成为南韩人的安置中心。

## 20美梦与噩梦

他们在统一院安置中心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唱国歌。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毕竟这是朝鲜人一辈子精益求精的技能，其他事情比唱国歌困难多了。

统一院在首尔以南约四十哩，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统一的大院”。

这片以围墙隔离的红砖建筑和绿色草皮是南韩统一部在一九九九年创建的园区。统一部本身是为了南朝鲜统一而成立的内阁部会，内部方案都是为了帮助脱北者融入现代社会。假如朝鲜的两千五百万人民有朝一日能加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这势必是一件大工程。

南韩跟朝鲜分开发展已经超过六十年，连语言都出现了差异。某方面来说，对于从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韩国走出来的时光旅行者来说，统一院就像一个新兵训练营。脱北者从小在没有提款机、大卖场、信用卡或网络的世界里长大，南韩人使用很多他们不熟悉的俚语，日常用语也充斥着英文，甚至还有Konglish（韩式英语）这个专有名词。举例来说，南韩现在称手提包叫han-du-bag-u（来自英语的handbag），称购物叫syoping（来自英语的shopping）。我很惊讶这里的人购物纯粹是为了好玩，还发现了很多外来语：打印机、扫描机、沙拉、漢堡包、披萨、诊所等等。这些对我来说不只是新字汇，也是进入一个崭新世界的密码。

这些新东西令人困惑也令人振奋。在我们进入竞争激烈、数码化、民主化的新家园之前的三个月，统一院的人员尽可能把我们该会的东西教给我们。

抵达统一院之后，我们这群从青岛来的人被分到一二九队，也拿到在这里期间要穿的运动裤、T恤、连帽运动服和跑鞋。这里原本设计一次只能容纳两百名脱北者，那时候却挤了约六百人，全是女性和十八岁以下的小孩。成年男性被送往另一个安置机构。我们四、五人睡一间房间，吃饭都在公共餐厅一起吃。

妈妈和其他成年女性要学习怎么到银行开户、使用信用卡、付房租和登记投票，我跟其他青少年和小孩则在教室里为加入严格的南韩教育体制做准备。首先，他们为我们做了学力程度测验。我已经十五岁，但很久没上学，数学只有二年级的程度，读写甚至更差。

我得重新开始上学，而且要从头开始。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很不适应课堂生活。坐在椅子上感觉不舒服又别扭，上的课又让人头昏脑胀。课本上不再用“美国坏蛋”来当加减法的单位，换成了可爱又鲜艳的东西，例如苹果和橘子。但我还是不会背九九乘法表，连英文字母这么基本的东西都不会。除了朝鲜文以外，我唯一认识的其他字母是我们在朝鲜用来拼俄文的字母。现在要学新的字母对我来说很吃力。

统一院的老师花很多时间，教我们认识封闭的朝鲜以外的世界。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世界上有很多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而朝鲜是全世界最贫穷也最专制的国家之一。老师每天都挑战我们从出生就被灌输的根本信念。有些观念比较容易接受，比方我可以相信金正日住在豪宅里过着优渥的生活，而人民在挨饿，却无法相信一九五〇年引发朝鲜战争的人是他的父亲——伟大的领袖金日成，不是邪恶的美国佬和南韩侵略者。长期以来，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把朝鲜当作帝国主义侵略行

动的受害者，一直是我身分认同的一部分；要放弃有如父亲的声音般根深柢固印在我的脑海、深入我的骨髓的世界观，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再说，如果过去我相信的都是谎言，我要怎么知道这些人说的就不是谎言？政府的人对我来说，都不可信任。

在统一院里，我们还学习了南韩社会的一些规矩。例如，老师说在这里不能打人，打人不但要赔很多钱，还可能去坐牢。男生听了很震惊，我倒是觉得很好。朝鲜和中国都没有这类法律，如果有人打我，我从不期待他们会受处罚。我以为我比别人弱小，所以也无可奈何。南韩的司法制度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保护弱小不被强者欺负，以前我从未想像过这种概念。

我不知道其他脱北者有没有同样的烦恼，但对我来说，课程中最难的就是在班上自我介绍。大家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老师教我们先介绍自己的名字、年龄和家乡。接着，可以告诉大家自己的嗜好、最喜欢的歌手或电影明星，最后再谈谈“你以后想做什么”。叫到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呆掉。我不知道什么是“嗜好”，老师说就是做了会让自己开心的事，但我想不到那样的事。我人生的唯一目标应该是让领袖开心。况且，又有谁在乎“我”长大要做什么呢？在朝鲜没有“我”，只有“我们”。这种练习让我又别扭又沮丧。

老师发现我不知所措，便说：“如果觉得太难，那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颜色。”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

在朝鲜，什么都要死记硬背，大多数时候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当老师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时候，我努力要想出“正确的”答案。从来没人教过我怎么使用“批判思考”，教我运用理性判断来分析一件事为什么比另一件事好。



老师对我说：“没那么难，不然我先说好了。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好，轮到你了。”

“粉红色！”我回答，听到正确的答案令我如释重负。

在南韩，我学会了讨厌“你认为呢？”这个问题。谁在乎我怎么想？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始为自己思考，才了解为什么我的想法很重要。经过五年的“自由”练习，现在我知道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翠绿色，我的嗜好是看书和看纪录片。我再也不会抄袭别人的答案了。

统一院的老师提醒我们，跟南韩学生竞争非常辛苦，我相信他们这么说是一片好意。南韩的教育成果在全球培生指数中夺冠，英国第六名，美国第十五名。我们听说南韩学生很拼，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念书，为了超前同班同学，其余时间也排满补习。老师告诉我们这点，是希望我们对公立学校的生活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剥夺了我的希望。因为还没开始，我就几乎想要放弃。

我从来不知道“自由”会是那么残酷而艰难的一件事。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由就是可以穿牛仔裤，看我想看的电影也不用担心被抓。现在发现，我必须不断思考，那样好累人。有时候我会怀疑，若不是经常吃不饱，留在朝鲜还比较好，因为只要把思想和选择都交给国家就行了。

什么事都要负责任真的好累。在中国，我是负责赚钱养活妈妈的人。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重新当回小孩。刚到统一院时，我跟妈妈和另一对母女同房，女儿跟我差不多年纪。那个妈妈说我太成熟、太独立，说我应该更像小孩一点。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内心的自己已经有一千岁那么老。

我讨厌别人不喜欢我的感觉，故意在那些妈妈面前装小，努力融入其他青少年，但我不知道自己装得成不成功。我们每天都会见面，一起去户外教学，但其实我觉得很孤单。老师带我们游首尔，参观战争纪念馆和汉江，教我们怎么买票、坐地铁。周围的嘈杂声、机器、灯光闪烁的广告看板，还有到处可见的汹涌人潮让我好紧张。但我满脸堆笑，假装专心，外表的我是个乖小孩，内心却常陷入交战。

有一天，我站在餐厅里和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朝鲜小孩聊天，其中有个男生说了一个带着小孩的年轻女孩的八卦。

“朝鲜女生都不可信。”另一个男生说：“她们都曾经被卖掉，那个女生想瞒也瞒不住。”

“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这么跟他们说：“卖掉是什么意思？”

只要提到中国，我就会像这样闪躲。我跟妈妈从不谈过去的事，即使私下也不谈。我们只要看着对方，不说也知道彼此在想什么：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我们的窃窃私语。我妈也得面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新世界的种种挑战，但她的心态比我健康。只要不用为了活下来而痛苦挣扎，对她来说，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努力忘掉悲惨的过去，向前迈进。我想抹除我的过去，但一睡着，那些恐怖回忆又会回来找我。我做的梦都是噩梦，而且同样的主题一再重复：水在我四周流动，我必须尽快涉河逃走。每次都有人在后面追我，但无论如何我都逃不掉。有时，我会尖叫着惊醒过来，过一会儿才认得床上的毛毯，想起自己是安全的，我活下来，也逃出噩梦了。

但有时，即使在大白天，我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朝鲜，这一切会不会只是梦。

我一天得捏自己很多次，总觉得自己随时会从梦中醒来，回到冷冰

冰的惠山家里，跟姐姐一起躺在地板上望着窗外的月亮，想着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带着食物回家。

有时我捏得太大力，会把自己捏到淤青流血，因为我需要感觉到痛，才能确认这里的生活是真实的。有时我这么做只是想确认自己还有感觉。麻木感在我体内蔓延，像个冷漠的同伴从远方看着我，无法参与这个世界。

朝鲜没有“忧郁症”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类用语，所以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或者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心理辅导”这个概念对我很陌生，统一院的人说要帮我“心理辅导”时，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南韩的脱北者有将近七成五有某种情绪或心理的障碍，实际数据我想应该更高。住在统一院的人都表现得像正常人，但过去的痛苦经历和未来的不确定感一点一滴吞噬我们的内心。

南韩早期把投奔自由的朝鲜难民视为民族英雄，脱北者常因此收到丰厚的奖赏、津贴和奖学金。但一九九〇年的大饥荒过后，大批难民涌入南韩，安置机构的负担愈来愈重。事实上，脱北者的人数在二〇〇九年达到高峰，共计两千九百一十四人。

过去来到南韩的脱北者多半是男性专业人员，如今约百分之七十五的难民是来自北方省份的贫困女性，例如我跟我妈。难民得到的安置照顾愈来愈少，限制也愈来愈多，但这对我们来说，仍是适应新家园的重要支柱。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统一院为一二九队举办了毕业派对。我跟妈妈终于拿到大韩民国的公民证。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以

为我们总算通过了迈向自由的最后一道关卡。但几乎一走出统一院的大门，我就开始想念那里。现在我踏上一个充满选择的国度，光是超市卖的米，就有十五种牌子让我选，我已经有点想要回到一个凡事只需听从指示的地方。

展开新生活之后，我发现原来自由有让人痛苦的一面。

我跟妈妈拿到一笔安置补助费。包括接下来五年的住宿及其他费用，总共约两万五千两百三十四美金。感觉上是一大笔钱，在发现那是一般南韩家庭一年的收入之后，就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脱北者得卖力工作才能追上南韩一般人的收入，很多人没能追上。安置人员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搬离拥挤的首都，可以拿到多一点补助，于是我跟妈妈答应了。我们搬到了牙山附近的工业小镇，在首尔以南，坐火车约要两个小时。

我们分配到一间公寓，房租由政府支付。他们帮妈妈开了一个帐户，还拨给我们一笔津贴让我们展开新生活，但我们不是一次拿到所有的钱。据说有些中国掮客会追踪逃到南韩的脱北者，跟他们收之前的欠款。也有一些南韩人会诈骗脱北者的安置补助费。这种事很常发生，因为刚到南韩的朝鲜人对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还一知半解。

朝鲜没有白纸黑字写的合约，所以统一院的人一直提醒我们，这里凡事要写成白纸黑字才算数，一旦你在纸上签名，就要担起责任，不能反悔。但过去的习惯难以改变，新的习惯又难以适应。南韩政府发现，如果把拨款的时间延长，我们至少不会一次被骗走所有的钱。不过，他们要是看过我们在牙山住的公寓就会发现，我跟我妈没有多余的钱可被骗。

我们住的地方位在小镇外围的山丘上，走一小段路就能看到几家小

店，还有能载人到闹区的公车路线。这里的房租很便宜，住满靠政府补助过活的房客，包括老人、孤苦无依的残障人士、几名应该送到精神病院安置的精障者，还有我们。

我们住在一个附厨房的小房间里，地上的草席就是床，阳台充当储藏室。屋里爬满蟑螂，住户会在电梯和大厅尿尿，我们隔壁住了一个疯子，日夜不停地大呼小叫。幸好另一边的邻居是个好心的老妇人，她把她不用的碗和漂亮盘子送给我们。我们从二手店买了一台小冰箱，其他家具都是从停车场上的垃圾堆捡回来的。其他房客把不要的衣服和家用品都丢在那里，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台灯、厨具、用过的床褥，甚至一台小电视，我跟妈妈都不敢相信我们运气怎么那么好。这里的人常搬进搬出，所以每个礼拜都会出现很多新宝藏。我们觉得南韩人丢掉的有用东西甚至比中国人还多。

南韩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店里有我们买得起的水果。在朝鲜，柳橙和苹果都是贵死人的奢侈品，到这里之后，妈妈很喜欢买水果回来，切成一片一片跟大家分享。她这辈子吃了很多苦，但是总能找到值得她心怀感激的事物，而且常常在不同事物上发现笑点，包括她自己。举例来说，我们常摸不清楚周围的新奇产品是做什么用的。有一次，妈妈把我的香水当作口气芳香喷雾，拿起来就往嘴里喷。等她终于停止咳嗽、不再骂我之后，开始噗嗤大笑。我们两个笑到停不下来，笑到喷泪。

开始新生活不久的某个晚上，我一醒来听到我妈在咯咯笑。

“妈，怎么了？”我问她：“什么事那么好笑？”

“是冰箱，研美！”她说：“我刚听到它自己启动了。”

## 21求知若渴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多认识一些真正的南韩人。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人都是脱北者、南韩探员，还有受过特训的工作人员。我也很想多学一点电脑，所以我决定去公寓附近的商店看看，我发现那里有一间上网的店。一般网咖谁都能进去，这间店比较像私人俱乐部，按时付费就能在里头打电动、上网跟朋友聊天。我把头发绑成马尾，打扮得整整齐齐才走下山丘。

那间店位在二楼，从一道肮脏的楼梯走上去就到了。那里给我的感觉很复杂，店里有七彩的灯光，一排排闪亮的电脑，后面坐着神情恍惚的年轻男人。

我鼓起勇气推开玻璃门，柜台的中年男子抬头看我走进去。

“我想要用电脑……”我说。

一听到我的口音，他就知道我不是南韩人。

“我们这里不接待外国人。”他说。

“喔，我是朝鲜来的，但现在是南韩公民了。”我大受震撼，感觉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不，你是外国人。”他说：“这里禁止外国人进入。”

我转身跑下楼，一路跑回公寓，感觉伤心透顶。

隔天，我只想蒙着被子窝在床上，但妈妈要我换上衣服。已经九月初了，新的学期开始，我该去学校注册了。

我的学力测验把我编入南韩八岁小孩的年级，但我的年纪几乎是他们的两倍大，难免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如果我想上公立学校，就得上当



地的中学。我也可以选择专门给脱北者读的私立学校，但我想要尽快融入南韩的生活。

那所中学是一栋现代的砖楼建筑，上面挂着恭贺该校学生赢得学业和体育竞赛的布条。妈妈陪我去见校长，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上大家有多困难。“几年前也有一个朝鲜男生来读我们学校，”他说：“但他一直跟不上大家，后来就放弃了。”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我也一样希望渺茫。

“而且我们学校的制服很贵。”校长又说：“我们得帮你找件二手制服，再请你母亲修改一下。”

之后我被带去见新同学。所有女同学都穿着光鲜亮丽的制服，只有我穿的是社工给我的旧制服。我试着跟几位同学攀谈，但她们看看我就走掉了。后来，我听到有些女生在说我的事，也不管我会不会听到。

“那个像动物的家伙在这里干嘛？”有个人问。

“她的口音是怎样？”另一个人问：“她是间谍吗？”

放学后，我跟妈妈一起走回家，之后再也没回去。

那件事过后，我变得很怕人，一步也不肯离开公寓。只要走出门就冷汗直冒，心脏狂跳，感觉好像快死掉。只有深夜出门，我才觉得自在，因为那时街上都没人。妈妈会陪我走到附近小孩玩的小小游乐场，我会坐在秋千上前后摇晃，一边听妈妈说她今天发生的事，或是听她唱老歌。

“你要有自信一点，研美。”她说：“为什么这么怕别人看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在家里躲了一个月之后，我知道我非强迫自己走出去不可。即使很

多南韩人觉得我没有未来，即使他们认为我又笨、又落后、又不可信，我还是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要想办法证明给他们看。第一步就是去上学。

爸爸死前跟我说过他的遗憾。他一直希望我继续念书，拿到好成绩。他知道我想上大学，甚至像我们的很多亲戚一样当上医生。但是自从他被捕之后，那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现在我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了！

我在统一院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派不上用场。但有一句我一再听到的话，深深鼓舞了我：“在民主社会里，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一开始我不相信。在朝鲜不是这样的，除非你出身成分好、人脉广，不然再努力也没用。但我知道我可以努力，只要想到努力就有收获，我便充满了干劲。当时我还不知道“公平”这两个字，也不懂这个概念，但总觉得这是对的。我必须立刻开始往目标迈进；时间宝贵，不能再浪费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我进入天国梦想学校（Heavenly Dream School）就读，这是一所专收朝鲜年轻学子的基督教寄宿学校，校址在不远的天安市。南韩给脱北者读的特殊学校几乎都是由基督教徒经营，而且选择不多。这所学校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所。

我有很多进度得追赶。我的目标是在同龄学生从学校毕业时，拿到国、高中的同等学力，然后去上大学。天国梦想学校大约有十五名青少年（人数上上下下），有些是我在统一院就认识的女生，而我不是那种很受欢迎的学生。我下定决心要摆脱身上任何会泄漏我是脱北者的痕迹，所以跟人说话时，我都练习用南韩口音说话。那里的女生觉得我很奇怪，跟大家又疏离。老师说我不够“坦白”。我对于花时间读圣经、上

教堂没兴趣，但其他人都把那当作重要的事。我在学校想做的事只有读书。我渴望学习，稍微分心都无法忍受。我在学校的绰号是“学习机器”。

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自己的房间念书。以前在朝鲜看故事书的乐趣重回脑海，只是现在能看的，不再只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冒险故事。

这段时间，妈妈很庆幸我去上了寄宿学校，这样就有人保护我，照顾我的三餐，因为她打算去中国一趟。

我们才离开统一院没多久，我妈跟中国的几名掮客联系上。他们派了一个女人回惠山打听恩美的下落。我们想知道恩美是不是跟我们认识的许多女性一样，在中国被逮到，以致被遣送回国。但恩美失踪的两年半以来，没人听过她的消息。

所以我们在中国人口买卖圈放出风声，悬赏一万美元打听恩美的消息。同时间，妈妈还去申请南韩护照。我们刚到牙山的头几个月过得很拮据，因为我们把钱省下来拿去找我姐姐。我妈一拿到护照，就订了飞往中国的班机。

很难想像妈妈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单独踏上这段旅程。她几乎不会说中文，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中国旅行。即使现在有了南韩公民证，也没人知道她会不会又被绑架或卖掉，甚至落入朝鲜间谍的手中，把她抓回朝鲜处死。尽管如此，她抛开了恐惧，坐上飞往观光大城大连的飞机（因为机票比较便宜），之后再一个人搭好几个小时的巴士到沈阳。

这段期间，她借住在我们以前聊天室老板明玉的家里。我们躲躲藏藏的时候，一直不敢跟爸爸那边住中国东北延边的亲戚联络，害怕即使

是打个电话都会让警察找上门。这一次，妈妈透过爸爸的姑姑服务过的银行找到了他们，但那里也没人听过恩美的消息，我们知道之后很沮丧。

在中国待了二十天后，妈妈回到南韩，极其灰心。我们找不到我姐，但我们相信有一天她会找到我们。况且，我妈这次回来也不是毫无收获。当初到青岛投靠传教团之前，因为不希望逃亡期间身上携带会泄漏身分的东西，我们把家当留在沈阳某个安全的地方，其中包括一小盒家族照片，那是我们仅有的爸爸、恩美，还有家乡亲人的影像。现在照片跟着妈妈回到南韩，重回我们身边。

这趟中国之行还有一件好事。过去，明玉一直害怕被捕、被送回朝鲜凌虐处死而不敢逃亡。但妈妈跟她说南韩有多好，这里的政府如何帮助我们。“你看这个！”她拿着护照在朋友面前挥舞。“去那里就能拿到护照，到哪里旅行都不用害怕了！你就自由了！”

那本护照给了明玉冒险逃亡的勇气。我妈和我打了几通电话，安排她经由泰国逃到南韩。她在几个月后出发，终于抵达南韩。

我在天国梦想学校没有待很久。事实上，我妈十一月底刚从中国回来，我就休学，搬回公寓。我觉得从学校课程学到的东西不够多，也不喜欢那些额外的宗教活动，而装出一副信仰虔诚的样子也让我很别扭。此外，那些传道内容有时 would 让我想起青岛的那位牧师，以致觉得自己很肮脏又罪孽深重。

一回到家，我整天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我吸收书本的知识，就像其他人呼吸氧气一样。我看书不只是为了求知或好玩，也是为了生活。我一个月只有三十美金可以花用，扣掉基本开销，我把剩下的钱都拿去买

书。有些是新书，有些是二手书店的旧书。即使肚子饿的时候，书对我来说都比食物来得重要。我到后来才知道公共图书馆的存在，现在想来觉得很难置信，但我们刚到南韩时，确实很像生活白痴。

我从译成朝鲜文的童书开始看起，接着再看介绍世界国家的图画书。我买了有关希腊罗马神话和世界历史的书，还读了林肯、罗斯福、希拉蕊的传记。我对美国很感兴趣，也特别爱读传记，因为里面都是人们如何克服难关或偏见、最后出人头地的故事。这让我觉得，即使没人相信我，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还是能克服困难。

我把十二年的教育塞进接下来十八个月的生活里。我报名其他几所特殊学校，帮助我拿到国、高中的同等学力。即使是那时候，自己进修对我还是最有效率。我向自己发誓，一年要读一百本书，后来真的办到了。

我借由读书填满自己的脑袋，将过去的悲惨回忆挡在门外。但我发现书读得愈多，思想就愈深，眼界也更宽，连情感都不再那么浅薄。南韩的字汇比我过去知道的字汇丰富很多，当你有更丰富的字汇形容这个世界的时候，思考复杂事物的能力也会跟着提高。在朝鲜，政府不希望你思考，也痛恨细微的差别，所有东西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例如，在朝鲜你唯一能描述的“爱”是对领袖的爱。我们在偷渡进来的节目和影片上听过“爱”的各种用法，但在朝鲜的日常生活中却用不到，不管是对家人、朋友、丈夫或妻子都一样。但南韩有各种表达爱的方法，有对父母的、朋友的、大自然的、上帝的、动物的，当然还有对情人的爱。

之前在国情院等待移送统一院期间，有时他们会带外面的人来请我们填问卷、做访谈。有个女人跟我聊到“爱”的话题。她说如果你对植物



说“我爱你”，植物会长得更健康。也就是说，让你关心的人知道你对他们的爱，是一件重要的事。她鼓励我们当场对坐在旁边的人说“我爱你”。那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一项练习，但那次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方式，可以表达对朋友，甚至植物或动物的爱。所有东西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透过学习才能内化，即使是基本的人类情感也不例外。

我渐渐发现，除非有种语言在脑中发展茁壮，不然人无法真正的学习和成长。我仿佛真的感觉到脑袋逐渐苏醒，过去漆黑荒芜的地方如今出现了新的路径。经由阅读，我学会了活着的意义，以及身为人的价值。

我读了《麦田捕手》、《苍蝇王》、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这类的文学经典，而且深深爱上了莎士比亚。不过，乔治·欧威尔的《动物农庄》才是我真正的转折点。那像是在一片沙漠中发现了钻石。我总觉得欧威尔好像知道我从哪里来、经历过哪些事。他笔下的动物农庄其实就是朝鲜，而他描写的就是我在朝鲜的生活。我在那些动物身上看到了我的家人，包括我外婆、妈妈、爸爸，还有我自己，那些脑袋空空、新来的猪就是我。把朝鲜的恐怖统治浓缩成一则简单的寓言，解除了朝鲜对我的箝制，也让我获得自由。

住在统一院时，已经在南韩闯出一片天的脱北者有时会来跟我们分享经验。其中有个人教了我们一个跟南韩人做朋友的小秘诀：弄清楚时下最热门的电视节目和当红明星，当作跟南韩人聊天的话题。所以连看电视、电影对我都成了一种学习。我把演员姓名和电影电视情节背下来，抄下所有歌唱团体的团名，还听了很多流行歌，并且记下七〇、八〇和九〇年代的热门歌曲。

除此之外，我还读了社会名流的报导，记住他们的八卦绯闻和身家



背景，这样聊起天来才像土生土长的南韩人。那些名人的婚礼和名牌礼服让我大开眼界。我不知道什么是“设计师”，但现在学校有电脑教室可以让我上网查询。“名流”的概念对我来说很陌生。南韩的俊男美女受到如同朝鲜领袖一般的仰慕崇拜，不同的是，在南韩你可以选择自己崇拜的偶像。

我的朝鲜口音渐渐消失，我说话愈来愈像道地的首尔人。我也学会了怎么打扮、用餐、像南韩人那样聊天。如果有不认识的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会回答“牙山”，让他们相信自己想相信的。我尽可能跟过去拉开距离，从不跟之前在中国认识的人联络。妈妈跟后来也到南韩定居的善禧和明玉经常往来，但我没有。我想跟过去一刀两断，那段过去对我来说已经愈来愈不真实，像一个模糊的梦境。

妈妈说我整天关在家里读书很不健康。她鼓励我回寄宿学校上学，所以二〇一〇年春天，我又进入另一间专收脱北者的基督教学校，在那里拿到中学同等学力，之后再转去天国梦想学校的首尔校区，完成高中学业。我还是不喜欢上课，大多数时候都自己念书，但考试成绩还不错。

二〇一一年四月，我跟妈妈来南韩才两年，我就通过了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那对我来说是一大肯定。我想起之前那些不看好我的人：青岛的牧师、质问我的探员、打发我走的校长，还有跟我说这一天遥不可及的很多老师。他们对我能力的质疑反而激励了我。拿到同等学力也证明了一件事：我的人生也有公平的一天。努力果然会有收获。

我妈不敢相信昔日惠山那个学习迟缓的孩子，竟然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力。但她提醒我，朝鲜人都说：“小孩聪不聪明，要长大才知道。”她不是那种会到处张扬她有多以我为荣的妈妈，但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

我妈在适应南韩生活的过程中，也有自己要面对的考验。她做过不少刚来南韩的脱北者常做的帮佣工作。她到一家简餐咖啡馆洗碗打扫时，认识了一个在附近澡堂工作的男人。后来他们开始约会，他帮她在澡堂找了一份卖零嘴的差事。不幸的是，他是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男人。我原本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直到有一晚，我在首尔的天国梦想学校接到牙山医院打来的电话。

“你妈妈受伤了，”护士说：“你得过来接她。”

我穿上衣服跑去搭地铁，坐早上约五点第一班开往牙山的火车，赶回我们住的公寓。到了之后，我看到走廊上血迹斑斑，我们公寓也有一大摊血。邻居跟我说他们大吵了一架。我妈的男朋友拿一只厚重的金属锅打她的头，她昏了过去，他也不管她的死活就跑了。邻居打电话报警，警察才把她送到医院。

我可怜的妈妈模样凄惨，全身包满绷带，还有严重的脑震荡。我在家里清理血迹时，她自己办了出院，因为我们付不起医药费。我们没钱叫车，坐公车又会害她恶心想吐，她便自己走路回家。看她走进门时那么憔悴，连路都走不稳，我心都碎了。即使到了南韩，生活对我们还是很不容易。

我妈从头到尾没对男朋友提告。警察侦讯过他，也想起诉他，但善良的妈妈原谅了他，要警察放了他。我知道自从跟朝鲜警察周旋过后，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人经历那种折磨——即使那个人差点杀了她。她不知道南韩警察有另一套做事方法。

那次之后，妈妈试着要跟男朋友分手，但对方偷偷跟踪她，三不五时跑到公寓来威胁她。两个月后她放弃抵抗，又跟他重修旧好。但他有暴力倾向，还是继续打她。有时我会收到她的简讯：“如果我今天晚上

死掉，凶手就是他。”

我妈吃了那么多苦才得到自由，好不容易到了南韩，却要活在恐惧之中。想到这里，我简直快发疯。但是她拒绝提告，连警察也保护不了她。

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才对。如果警察不能保护她，那么就由我来吧。我可以去读法律，当上警察，甚至检察官。在朝鲜，警察是拿走你的钱、把你抓进监狱的人。在中国，每次看到穿制服的人我就害怕不已，因为那里的警察会当场逮捕我。我从小到大未曾受过警察的保护，但是在南韩，保护人民是警察的责任之一。于是，我选择投身我最害怕的一种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查过一些资料后，我发现首尔的东国大学有南韩数一数二的警察行政学系。我决定去申请那所大学。

## 22上电视

东国大学坐落在首尔市中的陡峭山坡上，可以从四面八方俯瞰这座城市和南山公园的森林。这所大学于一九〇六年由佛教徒所创，不过收的学生不限任何宗教信仰，校训“摄心、信实、慈爱、度世”反映了这所大学的佛教渊源。

这些听起来是我可以接受的信条，尤其是最后一项。获得自由之后的头两年，我把时间都用来打开自己的脑袋、接收这世界的各种可能。现在我安全了，但我无法不去想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其他人仍在受苦，而我姐姐依旧下落不明。我能活着逃出来，享受他们无法享受的自由，我想一定有它的理由。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清楚表达这个想法。

目前我更迫切的任务是申请上这所有名的大学。脱北者的学费一半由政府支付，一半由校方资助（但成绩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学费对我不是问题。但我知道，光是我不寻常的求学背景就是一个问题。我跟其他脱北者虽然可以不去考南韩有名的长达八小时的大学修学能力试验，但我还是得通过其他严格的考试，口试也包括在内。订于二〇一一年初夏的口试，就是决定我能不能进入这所大学就读的关键。

那天我紧张得不得了，早上五点就到校园，坐在长凳上吹冷风等待口试。校园中庭的尽头有尊大佛像，我进去口试之前，特别到佛像面前祈祷。

投靠中国青岛的传教团那段期间，我皈依了基督救，但我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从小除了对领袖的崇拜，我没有其他宗教信仰，我的心灵仍在寻求可以依靠的地方。尽管有种种反证，我仍然相信有股仁慈的力

量在指引着这个世界，一个推着我们往善而非恶的方向走的慈爱力量。我相信耶稣是那个力量之一，佛陀也是，还有我们在绝望困顿时呼唤的神灵都是。爸爸也在那里给我力量。所以当我站在佛像面前，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对爸爸说话，请他指引我。我还是觉得跟他有强烈的感应，只要我呼唤他，他就会带给我力量。那天早上，我深刻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很明显还没准备好进入大学就读，面谈的教授也看得出来。我必须说服他们我有留下来的价值。

“大家好，我叫朴研美，出生在朝鲜的惠山市，不久之前才来到南韩，教育程度几乎是零，但这两年我进步了很多。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能力，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我对自己的自信感到惊讶，教授们看起来也是。

“目前为止你都表现得很好。”一名教授说：“不过，你受过的正规教育很少，也没学过英文，但我们学校要有英文成绩才能毕业。”

另一名教授说：“我们都知道朝鲜学生上了大学多半会半途而废，你怎么向我们保证你不会？”

我抬起头，看着他们说：“没错，我的程度没有其他人好，但我可以向他们学习。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正在社会上学习，所以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给我机会，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的能力，让学校以我为荣。”

八月时，我上网查录取通知，发现我考上了东国大学的刑事司法学系。

我捂住脸哭了出来。终于有人愿意相信我了！

南韩学校的新学期从三月初开始，所以上大学之前，我有七个月的

假期。因为还没有正式从首尔的天国梦想学校毕业，我继续留在宿舍上课，一边为上大学做准备。除此之外，我也到两元商店兼差打工，还到一家高级饭店的婚宴厅帮忙布置、收盘子。我不认为对方如果听出或看出我是朝鲜人会雇用我，所以我都让他们以为我是首尔人。

我已经准备好忘掉过去，以南韩大学生这个崭新的身分重新开始。但二〇一一年年底，我接到南韩教育放送公社（EBS）某个电视节目制作人的电话。他想访问脱北者，并经由统一院的某个人听说了我。我答应跟他见面，也跟他说了我横越沙漠逃亡的过程，还有我正在寻找消失在中国的姐姐。谈完之后，他说他正在找口齿清晰、志向远大的年轻脱北者来上他的节目，不知道我有没有兴趣？

我突然慌了手脚，立刻拒绝了他。

“但那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目，全世界都能看到。”他停了一下又说：“或许能帮你找到姐姐。”

我从没想过这个可能。南韩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各地都可以透过网络收看。如果我在电视上说出恩美的故事，说不定她会看到电视，然后想办法联络我们，让我们帮她逃出来。

另一方面，公开身分对我也是一大风险。很多过去认识我们的女人现在也到了南韩，她们知道我在中国为了生活做过什么事。如果她们出面揭发我，我的法律或司法生涯梦就会化为乌有。

我跟妈妈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们决定，如果有机会找到恩美，冒多大的险都值得。

我花了两天录像。多半是拍我跟另一名年纪较大的脱北者在海边或游乐园散步，边走边谈我这一代朝鲜人（已经接触到外国的影片）和她那一代朝鲜人（跟我们有不一样的思维）之间的代沟。后来，他们带我



们到一所脱北者经营的手风琴学校，拍了我聆听他们拉手风琴、唱故乡老歌的画面。一股巨大的悲伤涌上心头，我在镜头前泪流不止。我跟他们说，小时候在惠山，恩美也会拉手风琴，但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我很想念她。

这集节目在二〇一二年一月播出。每次有陌生的电话号码响起，我就会跳起来，希望那是恩美从中国捎来的讯息。但好几天过去了，还是令人失望不已。

我从二〇一二年三月开始东国大学的课程。这所大学就像摊开在我面前的知识盛宴，我狼吞虎嚥，就怕自己速度不够快。第一年，我修了英文文法和会话、犯罪学、世界史、中国文化、韩国史和美国史、社会学、全球化、冷战等课程。我自己还拜读了西方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例如苏格拉格和尼采。所有的一切对我都很新奇。

我终于能够思考“吃饱”和“活命”以外的事，也因此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完整的人。我从来不知道知识能带来快乐。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有一大桶面包可以吃，现在我开始怀抱更远大的梦想。

然而，大学生活某些比较实际的层面却让我碰壁。第一堂课，教授要我们分组上台报告。找到组员之后，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台报告，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人负责电脑排版和设计，其他组员要我负责“找资料”。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意思。目前为止我多半是自学，我发现我得尽快学会用电脑和找资料，不然一定跟不上大家。所以，除了上课的作业以外，我也上网自学电脑的基本用法。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的小公寓，但是我在公寓里的时间很少。学期间，我几乎以大学里的现代图书馆为家，那是一栋玻璃帷幕建

筑，有一排排吸引人的书和高速网络。那里成了我的游乐场、我的饭厅，有时还是我的卧房。我最喜欢晚上的图书馆，因为比较少会让我分心的学生。想休息的时候，我会散步到外面的小花园，坐在那里的长椅上就可以俯瞰这座城市。我常去贩卖机投钱买一小杯咖啡，坐在那里望着首尔都会区的灯海。有时我会想，这个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灯光，而这里以北才三十五哩外的地方，一整个国家却笼罩在黑暗中。即使是凌晨，这城市仍然充满活力，到处可见闪亮的信号灯、闪烁的电塔、繁忙的车流，流动的车灯就像血管里输送的鲜艳血球。一切都紧密相连，同时又如此疏离。我会想：这里有我的立足之地吗？我是朝鲜人还是南韩人？还是两个都不是？

讽刺的是，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一堂课是“了解朝鲜”。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详细地去认识我出生地的政治经济体制。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在课堂上让下巴掉下来，更难以相信大饥荒之前，朝鲜的配给制度曾经每天发给多数人七百克的谷物。我小的时候，全家人一个礼拜能买到那么多就要偷笑了！这堂课教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杀害或肃清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人。我震惊无比，觉得难以相信，尽管如今我不再相信金正日可以用念力控制天气，头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

上课时，我经常坐在第一排写笔记、问问题，却从没跟这堂课的教授说过话。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是从朝鲜来的。

我猜得没错，东国大学几乎没人看过我上电视坦承自己是脱北者的那集节目，我也从来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来历。系上同学知道我的背景，但外系生就不知道了，我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是朝鲜人。只要我放弃寻找恩美，或许可以继续过着这种假装成另一个人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E B S 的节目播出不久，我接到另一位制作人的电话。她正在制作一齣名为《现在去见你》的有线电视节目，想邀请我上节目。

当时，这是一个谈话兼才艺表演的节目，轮流邀请年轻漂亮的女生上节目唱歌、跳舞、演搞笑短剧、跟名人对谈。和其他节目不同的是，所有来宾都是脱北者（后来加进了男性和年纪较大的女性）。目的是增进一般人对脱北者的认识，打破大家对朝鲜人古板、冷酷又无趣的刻板印象。节目上会取笑朝鲜的某些生活层面，还有脱北者对南韩的偏见。但因为主事者是电视台的娱乐部门，而非教育部门，所以语调轻松又戏谑，就跟色彩缤纷的摄影棚一样。许多玩笑都很愚蠢，访谈也经过大量剪接，但那也是它的魅力之一。

《现在去见你》很快在南韩有了广大的观众。这些人原本对朝鲜的认识少得可怜，但根据调查，看了这个节目之后，观众对脱北者的观感比过去更正面。节目最后，往往会让一名来宾对仍在家乡的家人朋友说话。这是最感人、最催泪的一段，常让台上那些满脸堆笑的漂亮女人黯然心碎。

一开始我很抗拒上节目。我还是期待 E B S 的节目会捎来恩美的消息，但几个礼拜、几个月过去，我知道我必须站上更大的舞台，才能让姐姐看到我，而《现在去见你》似乎是最佳的选择。我还是担心过去认识我的人会在电视上认出我，但我不去想这种可能，硬着头皮接下节目。这好像一直是我的强项。

第一次到摄影棚的时候，我请制作单位隐藏我的真实姓名，心想这样一来可以保护我在朝鲜的亲戚，二来也可以维护我的隐私。

制作人问了我的家庭背景，我跟他们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时好时

坏，但我们发达过一段日子。我说以前我在朝鲜可以看影片，玩任天堂，而且我爸曾经是党员，我甚至去过平壤。制作人和编剧访问的其他女人（那时候节目才录到第三集）多半来自北方省份的赤贫家庭，每个人都挨过饿、吃过苦。对他们来说，我们家的生活十分优渥，他们正需要这样的人作为对照。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想起过去吃的苦，自然就没有详细交代爸爸被捕后的生活，还有我跟姐姐守在惠山冰冷的家中，没东西吃，没灯光照亮阴森黑夜的往事。我也没必要说出跟姐姐在山里漫步、摘叶子、烤蜻蜓来填肚子，还有我们走路去上学、尽量不去看路上尸体的事，更不可能提在中国的遭遇。

准备好正式录像时，我就变成了养尊处优的朝鲜大小姐艺珠，晃着女学生绑的马尾，穿上洋装和高跟鞋，让化妆师把我改造成朝鲜的灰姑娘。我轻松学会了唱歌跳舞，也很高兴能跟名人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只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一路飘送到中国。

上过一集节目之后，制作人再次邀请我，有阵子我成了节目上的常客。

每次录像之前，制作人和编剧会用电子邮件寄给所有来宾当集主题的问题。到了录像棚，我们会念一遍根据我们给的答案写成的剧本。有一集我被冠上“朝鲜的芭黎丝·希尔顿”的称号。我还得上网查，才知道谁是芭黎丝·希尔顿。后来妈妈也去上节目，他们放了几张我们的家族照，有张照片中，她打扮得很时髦。“其实我妈才是芭黎丝·希尔顿，”我说：“她住在朝鲜时，甚至拿过香奈儿的手提包！”我当然没说那些手提包是中国的二手仿冒品，也没说我们的富裕生活其实没撑太久。但我跟妈妈都努力说出我们认为观众想听的答案。那就像是我不为了

讨好老师，也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一样。

尽管如此，跟节目上的一些女人比起来，我们确实过过好日子。即使是最穷困的时候，我们都比在火车站上跟人要剩菜剩饭、从没用过肥皂或吃过肉的流浪儿好。摄影棚里的一些人经历过活生生的梦魇，甚至更惨。不知道是因为我还不愿意相信金氏王朝的残酷邪恶，或是不想承认自己是朝鲜人，有时我会觉得一起录像的这些“姐妹”夸大了她们受过的苦。

“她觉得其他人在说谎。”我妈在其中一集节目中跟主持人这么说，至今那一集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有时研美录完影会问我：‘我真的是朝鲜人吗？’有时候我听不懂其他姐妹说的话。”

我们都困在自己的角色里。但妈妈说得没错，我确实不了解别人受了多少苦，而上这个节目改变了我，因为我“看清了更多朝鲜的真相”。

后来我开始认真倾听其他女人诉说的故事。她们的故事让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更具说服力。她们就像上台作证的证人，一个一个控诉了把我们视如粪土的冷酷政权。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唤醒我更多的记忆，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应该长生不死的金正日在二〇一一年过世，他的小儿子，也就是身材肥短的金正恩继承了父亲的独裁政权。我曾经像神一样崇拜的金氏父子的种种恶行摊在全世界眼前，他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

可惜的是，上了南韩的热门节目也没能帮我找到姐姐。我流着眼泪在节目最后对恩美喊话，求她如果听到，无论在哪里，一定要跟我们联络，但还是毫无下文。



## 23 奇异恩典

回想起来，以为自己可以一面以脱北者的身分上热门电视节目，一面以南韩大学生的身分如常过活，未免太过天真。我去录像时都用假名，还会化妆，以为不会有人认出我。但我在东国大学的教授和朋友后来都认出节目上的人是我，有些人很惊讶也很失望我没对他们坦承自己的身分。老实说，我对我是谁、我希望自己是谁的问题仍然很疑惑。有时我走在路上会被人认出来，这通常会吓到我，直到发现对方是粉丝，而不是朝鲜间谍或我过去认识的人，才会恢复镇定。

没过多久，上课、录像、上网自学的三重压力渐渐让我喘不过气。我忙到没时间睡觉，也常忘了吃饭。东国大学的刑事司法系除了修课，还有体能和军事训练。学期刚开始时，我几乎每天都要跑步和运动。我的体重掉到三十六公斤以下，而且经常头晕。由于身体负荷不了，我不得不暂停训练。但我的体重还是一直掉，期末考时我昏了过去，被送进急诊室。医生说我压力过大又营养不良。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把自己累死。

因为必须放弃体能训练，我能选择的执法种类可能因此受限，但我想我应该可以继续读法律。愈了解司法体制，我对它的兴趣愈浓厚。然而，无论我选择什么科系，显然都要具备英文能力，但我进步得实在太慢。所以七、八月暑假期间，我报名了在菲律宾宿雾岛举办的英语夏季研习营。

我把上节目的通告费省下来当作旅费，所以这趟旅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送给自己的礼物。一开始我有点迟疑，但有一些朋友鼓励我去。



能出去看看这世界又能学习，让我非常兴奋。不过，营队里都是南韩人，我练习英语的机会不多。我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以为我是南韩人。我吃了很多芒果，坐在浅滩上看着鲜艳的热带鱼在脚趾间游来游去。我还是不会游泳，但有时我的新朋友会背着我涉进深水，就像小时候，姐姐在鸭绿江背着我下水一样。

我开始想，我们姐妹会不会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

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公布在网络上。我在本科系的九十名学生中排名三十三名，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我自己，因为刑事司法系是全校要求最严格的科系。隔年我的成绩持续进步，到了二〇一三年春天，我已经爬到班上的第十四名。我的成绩不只向校方证明脱北者也可以跟南韩人竞争，也向我自己证明我办得到。我终于摆脱了种种限制，面向无限宽广的生命。

二〇一三年的夏天，我决定暂时放下学业和录像，让自己放个假。对于恩美的事，我跟妈妈只能听天由命，但我们仍然抱着她还活着的希望。我妈有了新的交往对象，对方人很好，也有自己的承包事业。妈妈总算摆脱了之前那个暴力男友。现在她过得比以前开心，生活也稳定多了，我也比较放心离家好几个月。

我读了美国民权斗士的传记，包括金恩博士和罗莎·帕克斯，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其他人争取自由的人。我深受这些故事吸引，那种“化小我为大我，才能活出生命意义”的精神也引起我的共鸣。但妈妈早就体认到这个事实。她常跟我说，为别人付出才会快乐，无论你多穷困都一样。她也认为，如果有东西能够付出，就表示自己的生命还有价

值。除了为家人所做的牺牲，我到目前为止都活得非常自私。如今，与其专注于自己的需求，把每分每秒都用来提升自己，或许我应该让自己变成有益于他人的人。

我还在首尔的天国梦想学校就读时，青年使命团（来自德州泰勒市的基督教青年团体）曾到我们学校讲道，提到一个为期五个月的访贫志工团（包括十二周在德州进行的圣经研读课）。这份工作似乎是我报答当年冒着危险帮助我们逃到蒙古的青岛传教团的一个方法。即使我没钱，英文又不好，也能藉这次机会去美国，看看这世界。我仍然不算虔诚的基督徒，但我期待跟这个献身宗教的青年团体一起工作，自我挑战。

当飞机在休士顿的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触地降落时，我有点恶心想吐，但这次不是因为晕机，而是因为我来到了敌人的领土！大家排队下飞机时，我脑袋里都是大鼻子美国大兵拿刺刀刺向朝鲜无助母亲的影像。童年的宣传画面仍盘据在我的脑海，我从小被灌输的情感仍会无预警地跳出来。我来看这个邪恶国家的人民干什么？但环顾一眼机场，我的恐惧消失无踪。周围有牵着小孩的父母、吃着薯条的路人、一群群穿着球衫的青少年。我跟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说着相异的语言。我很讶异，谎言在真相面前竟然那么快就失去了力量。不到几分钟，我深信多年的谎言就这样彻底破灭。

我转机飞往泰勒，那是位于达拉斯东南方约一百哩的小城市。整座机场看起来跟仁川机场的候机室差不多大，我不禁想，这是美国吗？我还以为美国很大。有名南韩传教士来接我，开车载我横越绵延不绝的田地。后来我们开进青年使命团的校园大门（这里本来是一座牧场），再

继续往前开。我渐渐觉得美国果然很大。一个多小时后，我跟一群学生一起到附近的沃尔玛超市买食物，更加觉得美国大得惊人。那是我逛过最豪华的商店，而且大到不可思议，店里的商品也好大。我抓起一大桶上面印着慈祥老奶奶的蓝色包装燕麦片。我一定要试试看一些橘色的乾酪通心面，以前我从没吃过，而且用微波炉加热就能吃了，真好玩！我买了一袋几乎跟我一样大的玉米片，还买了工作服和一双以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买得起的爱迪达球鞋。

目前为止，我对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牧场，数十名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如泰国和南美）的年轻人，因为不同的课程聚在一起，包括我参加的门徒训练课程。我们在这里“向上帝、向世界、向彼此学习”。我常跟另一个年轻的脱北者和几位南韩传教士在一起，所以说话对象很多，只可惜很少用到英语。但一有机会跟美国人聊天，我就会练习。我发现我真正应该学的是西班牙文，因为初级训练结束后，我们一行约二十人要前往哥斯达黎加执行两个月的任务。

我们先坐飞机到哥国的首都圣荷西，再搭巴士到沿岸的捕鱼小镇戈尔菲托。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慈善传教团，除了传福音，也提供需要的人实际的帮助。我们会去照顾妓女和毒瘾患者，还有捡垃圾、打扫贫民窟，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当时正值夏末的雨季，晚上几乎跟白天一样热，有些人直接睡在牧师家的阳台上，到了星期天，牧师家成了教堂。我们睡在睡袋上（通常因为流太多汗弄得湿答答），虽然有蚊帐，但我第一次被蚊子咬得那么惨，两条腿红肿发炎，难受得要命，我还兴起放弃回家的念头。

但后来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我发现自己尽管难受，却不再为自己祈祷，反而第一次开始为别人祈祷。这让我体会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这种感觉在我心里一点一点长大。我读了一本充满力量的书，书名是《雨啊，请你到非洲！》，作者是著名的韩国女演员金惠子，也是人道主义者，她曾在一九九〇年代走访埃塞俄比亚的饥民营，后来更成为世界展望会的亲善大使。她走访非洲、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纪录，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教了我慈悲的意义。

还没读过她的书以前，我以为朝鲜是世界上唯一还在受苦的国家。即使有很多脱北者公开谈论朝鲜的饥荒和残暴政权，却只有少数女人承认自己曾被强暴或买卖，小孩更不用说了，这种事拿出来太不堪。所以我以为我是唯一有过这种恐怖经历的人。但现在我从书上得知，世界各地都有女人或小孩遭遇类似的苦难，我并不孤单。我也因此发现，过去的我眼里只看得到自己的痛苦。然而，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为他人的痛苦发声。根据我的了解，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因为从来没有陌生人为我发声。

我之所以选择青年使命团，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服务的是最贫困、最常被遗忘的社群。但我来了才发现我不是为其他人而来，我是为自己而来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哥国男女或许以为我是为了他们才来舀饭、捡垃圾，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

借由帮助别人，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有慈悲之心，只是我不知道也不会表达。我学到一件事：如果我能同情别人，或许我也可以学会同情自己。我心里的伤痕终于开始愈合。

哥国的任务结束之后，我们飞回美国，继续前往佐治亚州的亚特兰

大市服务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服务的游民收容所在我眼中有如宫殿。游民在这里有床还有笔电，甚至有冰箱可以冰汽水，平常也能自由来去。但游民在那里并不快乐，也没有希望，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回报别人。这令我很吃惊。

我们带给游民热狗，帮他们打扫房间。结束后，我跟一位游民分为一组聊天。我会的英文还很粗浅，只能靠简单的字汇和肢体动作跟他说我的故事。他知道我来自一个叫朝鲜的地方，经历过一段疯狂的逃亡之旅。我把自己又饿又怕、被警察追赶的窘境演给他看，当我发着抖做出匍匐前进的动作，说“沙子、沙子、沙子！”的时候，他知道我终于横越了沙漠。我很惊讶他听完我的故事竟然哭了。我跟他说，我只想要一个得到自由的机会，就像他在美国这里一样。

对方给我的情感回应打开了我的心防，让我发现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也让我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希望。原来光是诉说我的故事，也是一种付出。

那天我还学到另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横越的沙漠。别人的或许跟我的不同，但我们都得横越沙漠，才能找到此生的意义，得到自由。

我们的活动在十一月结束，团里有个朋友邀我和另一个朝鲜男生到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家过感恩节。崔以莎（Esther Choi）是韩裔美国人，父母约在三十年前从南韩移民到美国。能到她家过节，我觉得很荣幸。我跟他们家很快打成一片。在美国的韩侨因为离家很远，更珍惜家乡的古老文化。比起我认识的南韩人，他们更像朝鲜人，他们甚至还使用我

很熟悉的旧字汇。

那是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感恩节。我很喜欢因为感恩而一起过节的概念。以莎的母亲打算烤一只大火鸡，还要煮一桌韩国菜，包括我最喜欢的韩国泡菜。感恩节前几天，我跟以莎和她母亲一起坐车到她们亲戚家的菜园摘白菜。在车上时，我的手机响起。

是妈妈从南韩打来的，她听起来很激动。

“研美！你姐！我找到你姐了！”

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但我赶紧深吸一口气。之前曾有几个人为了拿到奖金，骗我们说在中国找到恩美。如果这次又是骗局，我们的希望又会破灭。

“妈，你说找到她了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就在这里，在南韩的国家情报院，那里的人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高兴得叫出声来，以莎和她妈妈都以为出了什么事。我跟妈妈在电话里边说边哭，不敢相信、但又希望这是真的。妈妈说明天国情院特别准许她去见恩美一面，也就是我们刚到南韩被拘留的地方。到时候她会带着手机，让恩美跟我通话。

我已经将近七年没见到姐姐或听到她的声音，看来我得尽快赶回南韩。我们先开车回家，拿机票到机场改时间。我本来打算再多待几个月，到美国各地看看，但现在回家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千头万绪在脑中奔流，有如溃堤的水坝。这些年来，我为了不让失去姐姐的痛苦打倒我而筑起的高墙，在一夕之间粉碎。突然间，我的感受回来了，无论好的坏的我照单全收。我能做的就是拼命抓住，不让自己被淹没。

隔天我什么都吃不下，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几个小时。后来电话响



起，我终于听到姐姐的声音。我心中的重担终于卸下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很快就会回去见你了。”一分钟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告诉她。

“好，到时候见。”她用细小的声音说。

那个声音里有我熟悉的东西。那是爸爸从监狱请病假回家之后的声音，是囚犯的声音，是怕说错话受罚而小心翼翼的声音。那是我自己的声音，是过去的岁月发出的回音，提醒着我，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花了将近三天搭飞机、候机、转机才回到家。通常脱北者要等调查结束才会免除隔离状态，但国情院的好心探员特别破例，让我进去见恩美，“确认”她的身分。他们带我走进一间探访室，她就在里面。我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的姐姐，跟过去一样有着细致的心形脸、一样的小手，而且是活生生的姐姐。我们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握着对方的手一直哭。我在心里对爸爸默祷，我想他一定在天上某个地方微笑地看着我们。我们终于找到恩美了。

恩美的故事属于她自己，而她的隐私应该受到尊重。我只能说，她在中国期间从没看过我上电视，也不知道我们从朝鲜逃了出来，而且一直在找她。原来我们曾经离得那么近却互不知情，真教人扼腕！如我们所料，我跟妈妈为了找她准备逃出朝鲜的时候，她跟朋友被藏在惠山郊区某个人口贩子的家中。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我们只隔着薄薄的一道墙。对照笔记之后我们发现，我跟妈妈在沈阳工作时，恩美也住在同一省。我们是那么的近，中间却仿佛隔着一整个世界。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要遇到对方的机会是如此渺茫。

后来，恩美终于发现经由东南亚逃到南韩的路线，她就这样靠着自

己的力量逃出来。结果她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救她。

恩美从统一院结业后，也搬进我在东国大学附近租的公寓一起住。她找了一份兼差工作，开始准备同等学力的考试，就跟我之前一样。恩美从小功课就比我好，我想她应该比我更快追上进度，果然没错。她在大约三个月内就考到中学同等学力，七个月内就取得高中同等学力。然而，跟我们团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恩美看起来封闭又疏远，好像心里没有容得下我或妈妈的空间。那种感觉我们很清楚，所以都愿意耐心等待。总有一天，恩美会打开心房，接纳我们。

## 24回家

韩国人很喜欢新年，一年要庆祝两次。一次是国历新年，午夜烟火齐放迎接新的一年；一次是一月底或二月初的农历新年，更多烟火和庆祝活动再次炒热过年的气氛。过年是我们跟家人团聚、反省过去、许下新年新希望的日子。二〇〇七年，我跟妈妈逃出朝鲜就不再庆祝新年，因为想到那一天只会伤心。但二〇一四年的新年不一样，恩美回来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各种计划。

首先，我想回学校完成学业。起初我选择刑事司法当主修，是因为想加入警察执法的行列，帮助妈妈摆脱之前的暴力男友。但在大学里，我的心胸变得更开阔，对司法的认知也更宽广，现在我想要转读法律。我不期待自己一年内就能为没有发言权、没有希望的朝鲜人（过去的我）争取权利，或站上国际舞台为全球的司法正义发声，或是成为朝鲜政府指控的“人权傀儡”。我也从没想过我会说出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但我很快会发现，想要真正自由，我得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

崭新的一年平静地拉开序幕，而我今年的新年新希望是加强英文能力。虽然跟传教团住了好几个月，我的英语对话能力仍有待加强。于是我报名了首尔的密集英语家教班，他们会帮脱北者跟外籍志工配对，一组一组练习对话。我一口气申请了十个家教，家教老师会规定我要念哪些东西，内容从莎士比亚到主张废奴、本身也曾是黑奴的费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无所不包。道格拉斯写给前主人的大胆信件不禁让我揣想，如果我有勇气写信给金正恩，我会写出什么样的

信。或许我会跟道格拉斯一样，告诉他我是人，不再是他的财产。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没在念书或上家教的时候，我会听英语有声书和TED的演讲，即使睡觉时也不例外。我下载了全部十季的美国喜剧影集《六人行》。随便问我一个关于主角罗斯或瑞秋的问题，我都能答得出来。根据我的家教老师说，我唯一的缺点是美国腔愈来愈重，而且开口闭口都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俚语。

二〇一四年三月，东国大学的新学期刚开始，我的英文能力大增，应该能顺利拿到警察行政系的学位。偶尔我还是会去录像，但恩美回来之后，我失去了上节目的动力。而且，我发现另一种可以更直接为朝鲜人争取公平正义的方法。

二〇一四年二月中，我受邀到首尔的加拿大枫华国际学校演讲，主题是朝鲜，而且是英文演讲。家教中心的主任说，这样可以增进我自己外语能力的自信。我不是很确定，但心里又想，试试看又何妨？

我绑起头发，穿上海军蓝的正式洋装，迎接我的第一场正式演讲。我对台下学生说了一些我的个人经历，还有我从小如何被洗脑、剥夺自由，以及活在恐惧和饥饿当中。我跟他们说我是朝鲜的新世代，也就是过去的经济制度随着金日成过世而瓦解的“黑市世代”，而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正慢慢为国内带来改变，或许改变还不够大，却足以在我逃出朝鲜之后，让我对留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和广大同胞怀抱希望。

演讲最后还有一个小时的问答时间。有名学生说我的故事“激励”（inspire）了他，我很快查了手机才知道这个英文字的意思。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故事可以“激励”一个人，但显然真的可以。

二〇一四年初之前，大多数人对朝鲜的印象都来自朝鲜狂妄的核武威胁，还有发型可笑、行径乖张的朝鲜领导人。但二〇一四年二月，联合国发表了朝鲜的人权报告书，指出朝鲜国内诸如滥杀、强暴、刻意造成饥饿等等侵犯人权的恶行。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威胁要以侵犯人权罪对朝鲜领导人提起公诉。然而，促成这篇报告的三百多名证人多半匿名，其他人也不一定能清楚说出他们的故事。国际社会突然间亟需一些具备英文能力的脱北者，为至今仍困在沉默和压抑的高墙后面的数百万朝鲜人发声。

我在加拿大大学的演讲为我带来了更多邀约，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上台或接受媒体访问，邀请我的单位从澳洲到美国都有。同年五月，我跟凯西·拉提格（Casey Lartigue Jr.）在《华盛顿邮报》合写了一篇文章。那年春天之前，我其实还不太清楚“人权斗士”扮演的角色，但突然之间，大家都跟我说我成了人权议题的风云人物。我知道自己不够资格当谁的发言人，更何况是朝鲜全体人民。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像一列驶向未知的火车，我想跳车也没办法。也许当时的我以为，只要跑得够快，过去就追不上我。

六月，我飞去洛杉矶参加研讨会，隔天就得飞回首尔考期末考，连去参观好莱坞的时间都没有，虽然我很希望能遇到李奥纳多，告诉他《泰坦尼克号》对在朝鲜长大的我意义有多么深重。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负责追踪我和我妈的南韩警探的电话。脱北者抵达南韩的头五年都会分配到一名警官，负责帮助他们安置。我们的警官通常只想知道我的行程表，看我过得如何，但这一次不一样。他说他奉命来确认我的安全，因为传闻朝鲜政府正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他没有说这个消息从何而来，只提醒我说话要小心一点，不然可能

会招来危险。

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吓唬我，对方确实达到了目的。我从没想过朝鲜政府会把我看成值得观察或有威胁性的危险人物。警探也找过我妈，当然也吓到她了。她要我马上停止所有捍卫人权的疯狂活动，质疑我为什么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先完成学业，拯救世界等以后再说？但我愈想愈生气。我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朝鲜，结果他们还是想办法要控制我。如果任凭他们摆布，我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由。

上半学期，我在东国大学的成绩仍维持中上，我很想好好读完这个学期。二〇一四年九月我回学校上了几个星期的课，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那年十月我接受了欧洲的几个邀约，其中之一是代表南韩参加在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年度青年领袖峰会。各国的青年领袖齐聚一堂，就像联合国。介绍我的人英国记者及人道主义者周柳建成，他因为担任中国央视主播而闻名亚洲。会前我们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谈自己的生活，我跟他细说一些我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打算在台上谈中国人口买卖市场的残酷，但是我无意揭露自己也是人口买卖的受害者。

主办单位要我们穿上代表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于是我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飘逸韩服走上台，在会场上一千三百名代表、来宾和媒体的面前，发表简短的演说。

周柳建成介绍我之前，我对于自己即将发表的演说紧张不已。我跟乌克兰和南非等地来的青年代表一起坐在台上，我很担心自己代表国家在这个论坛上发言不够强而有力。为了转移我的恐惧，我在心里练习把international（国际）和execution（处决）这些词汇的音发对。当周柳建



成开始叙述我的故事时，泪水滑落他的脸颊。我伸手安慰他，他反而哭得更厉害。他说到我妈为了保护我让自己被强暴，还有我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中国的荒山野外时，我也跟他一样泪流满面。

情绪失控一直是我最大的恐惧。有时我觉得愤怒就像我体内的一颗硬球，我知道如果不把它藏好，它说不定会爆发，到时候我也控制不了它。我担心自己一旦开始哭便会停不下来，因此一直以来都把这些感觉压抑在内心深处。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是他们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因为我把自己受过的伤藏得很好。但那天在都柏林，我却把过去的创伤摊开在大家面前。手握着讲稿走上讲台时，我已经泣不成声，几乎说不出话。

听众站了起来，我看到在场所有人都哭了，大家都在等我平复情绪。

我放弃了原来的开场白，只想对大家说，我来不是要为自己说话，而是要为朝鲜人民发声。但是我一紧张把英文给忘了，只好先深呼吸，从头开始。

“朝鲜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演说开始。我告诉现场的听众，在朝鲜你可能因为打了一通非法国际电话而被处决。我还告诉他们，小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话要小心，因为即使是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我们在窃窃私语。

“逃出朝鲜的那一天，我看见原本看上我的中国掮客强暴了我妈。”我说，任凭泪水滑下脸颊。我告诉他们，朝鲜难民在中国有多么脆弱无助。“有七成朝鲜妇女和少女成为人口买卖的受害者，有时候只以两百美金的价格售出……”

我打开了一扇门，站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带到

哪里，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横越戈壁沙漠的时候，比起死亡，我更害怕被遗忘。我怕自己死在沙漠上也没人知道。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名字，没人会在意我是死是活。但是你们听了我的遭遇，你们在乎我经历的事。”

所有听众再度站起来，跟我一起流泪。我环顾四周，我知道公平正义充满了这个房间。至少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朝鲜人民的希望。

然而，我还得横越另一片沙漠。

演讲结束后，我好不容易撑到活动完毕才躲回旅馆，瘫倒在房间里。等到我终于打开手机，才发现信箱已经被世界各地的访谈邀约塞爆。接下来的事，对我来说就像一场龙卷风。奇怪的是，我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仿佛我体内的生存机制自动打开，让我跟这一切保持情绪上的安全距离。一半的我看着另一半的我完成了剩下的演出。

我在欧洲三个礼拜期间做了几十个访谈，过了一阵子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我甚至答应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我站在伦敦朝鲜大使馆外的影像，那次的可怕经验吓得我几乎说不出话。以前我从没带过翻译同行，也没想过记者可能听不懂我说的话，或是我可能听不太懂他们的问题。此外，我也相信只要更改一点逃到中国的细节，就可以继续隐瞒自己曾经被买卖的事实。我想如果其他方面实话实说，就不会有问题；只要我的经历是真实的，细节应该不重要。大多数时候，我都在重复以前说过的话，就像即兴演出的爵士乐手，每次都在相同的旋律上做些变化，浑然云齿酣H正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

都柏林的演讲过后不到一个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回忆录。一个刚

满二十一岁的女孩写回忆录？确实有点怪，尤其我还有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一旦开始动笔，我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如果我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要怎么呼吁他人面对朝鲜的真相，面对逃到中国后落入掳客和强暴犯手中的朝鲜女人的真相？

我在十一月回到首尔。我跟妈妈和姐姐彻夜未眠，讨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有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我跟妈妈都没告诉过恩美，我们自己甚至从来没讨论过。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故事，这样挺身而出值得吗？我很确定，如果大家知道我的过去、我为了活命曾经做过的事，他们看我的眼光绝对会跟以前不一样。南韩虽然有子弹列车、现代化建筑和流行音乐，却仍是一个期望女人遵守妇德的保守社会。我无法想像我的故事一旦曝光，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再说，说出来又怎么样？有差吗？有人会听吗？有人会因此想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吗？

我跟妈妈和姐姐边说边哭，聊了一整晚。妈妈曾经希望我清醒一点，放弃人权运动，但这段期间，她也有了一些转变，现在她看出我们的故事潜在的影响力。

“你要告诉全世界，朝鲜就像一个大型的囚犯集中营。”妈妈说。她希望其他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逃出朝鲜、被卖到中国的朝鲜女人遭遇了什么样的事。“研美，如果你不站出来替她们说话，还有谁会站出来？”她说。姐姐也这么认为。

天亮时我做了决定。我要把我的故事完完整整地写出来，不再隐瞒自己曾被买卖的事实。如果我希望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这就是我唯一的选择。

一旦决定写出我的秘密，我才终于真正感觉到了自由。过去就像一片沉重的天空压在我身上，把我钉在地上动弹不得，现在我挣脱了桎

桔，又能正常呼吸了。

开始写回忆录之后几个月，有一天我打开笔电，按下链接，荧幕跳到YouTube上由朝鲜宣传部制作的一段影片。两名国家电视台的播报员对着镜头播报新闻的同时，有张我的大头照出现在荧幕上。背景响起阴森森的音乐，好像恐怖片的配乐，底下的标题是“从垃圾堆里长出的毒菇”。朝鲜媒体的无耻谎言和蛮横威胁在西方常受到耻笑，这一则其实也满可笑的，只不过语气很严肃，而且针对的是我和我的家人。

我的警探说得没错，朝鲜政府确实一直在监视我。二〇一五年初，朝鲜政府上传了两部影片，指控我是骗子和“人权运动的傀儡”。

他们调查了我的访谈，攻击我引述的内容前后不一。反驳不了我说的话，他们就捏造我和我的家人的谎言。他们指控我妈不守妇道，我爸是人口贩子，因为他曾经帮助邻居逃到中国。因为某些匪夷所思的原因，他们还想办法证明我捏造了我爸的死亡过程，甚至找了一名医生说他在朝鲜的医院死于癌症，不是在中国。

最可恶的是，他们把我们的亲朋好友找来诋毁我和我的家人。我已经有八年没见到二伯、二伯母和堂表兄弟姐妹，看见他们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对我来说很慥目惊心。朝鲜的宣传人员甚至找到我们以前在惠山的邻居金锺爱，就是曾经帮助我跟姐姐度过孤单绝望夜晚的好心邻居。听到他们说我们的坏话虽然难受，但至少我知道他们还活着。

二〇一五年年年初，我在纽约度过。我受邀到巴纳德学院旁听一门课，学习人权的相关知识，但我还是计划有一天能拿到学位。某天下午，我正在快速浏览脸上堆积如山的交友邀约时，有个熟悉的笑脸掠

过我眼前。我像个卡通人物，本来要从悬崖边拔腿逃走，突然间煞住脚.....然后看到了她。莹子！我小时候在惠山最好的朋友。自从逃出朝鲜之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

“是我认识的朴研美吗？”脸书的讯息跳出来。我的手抖得好厉害，几乎看不清楚荧幕。是！是我！我立刻回她讯息，她传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原来她也逃到了中国，然后跟恩美一样经由东南亚逃到南韩。她在国情院接受调查时，发现我还活着，而且到了南韩，终于透过社交媒体找到我。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我欣喜若狂。我们立刻重续过去的友谊，现在我们经常在网上聊天。

我一直希望朝鲜有愈来愈多人能找到自由之路。我妈一直很喜欢当初在惠山想娶我的春健，甚至试着找寻他，想帮助他逃出朝鲜，却得知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我们离开朝鲜不到一年，春健全家人就消失了。根据当地的传闻，朝鲜政府把农作物歉收怪到他父亲（他是农业专家）头上，把他送进严酷的政治犯集中营，春健和他母亲则被流放到北方省份的偏僻小镇。

之前春健曾经说会等我八年，八年之后他就会找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否还活着、还记不记得我。虽然我已经展开了新生活，我还是希望他有一天能逃到南韩。他跟朝鲜的两千五百万人民一样，都应该得到自由。

二〇一五年春天，我母亲跟她的男友一同回中国寻回爸爸的骨灰。

他们在羊山镇的山丘上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八年前的半夜我把爸爸的骨灰抱去偷偷掩埋的地方。看来一直有人在帮爸爸扫墓，甚至还在旁边种了树，那棵树就像卫兵在一旁站岗。弘伟没有忘记他对我的

承诺。

我妈带着爸爸的骨灰回到南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我希望有天能实现爸爸的遗愿，带他回惠山，把他葬在他父亲和祖父的旁边，在山丘上俯瞰鸭绿江。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到祖母的坟前上香，告诉她南朝鲜统一了，朝鲜再度合而为一。



# 志谢

谢谢这本书的共同作者：Maryanne Vollers。没有你，这本书不可能完成。你对我展现的不只是智慧和风范，还有对朝鲜人民及全世界人类的由衷关爱。能跟你共事、结为好友是我的一大荣幸。

我深深感谢企鹅出版集团了不起的出版团队。谢谢英国无花果出版社的Juliet Annan和Anna Ridley；美国企鹅出版社的Ann Godoff和Sarah Hutson。

特别感谢Karolina Sutton、Amanda Urban、Matthew J. Hiltzik和Carlton Sedgeley。

Thor Halvorssen Mendoza，你是我在这个新世界里找到的大哥哥，从你身上我看到如何挺身捍卫正义，抵抗世界各地的霸权。谢谢你当我的良师益友，教我那么多有趣的新词汇。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谢谢人权基金会的成员Alex Gladstein、Sarah Wasserman、Ben Paluba和John Lechner。

谢谢“自由在朝鲜”（Liberty in North Korea）的朋友和良师益友：Hannah Song、Sokeel J. Park、Justin Wheeler、Blaine Vess、Kira Wheeler、Tony Sasso。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帮助我了解这个新世界，也教导我担任朝鲜人民发言人所代表的意义。你们的建议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自由鼓吹者。

感谢凯西·拉提格从一开始给我的鼓励和支持，还有让我的生命彻底改观的几位英文家教老师。

感谢Jang Jin Sung帮助我了解黑暗彼岸的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存

活下来。谢谢Henry Song、Shirley Lee，还有同为脱北者和自由捍卫者的朝鲜家人给我的温暖和鼓舞，包括Joseph Kim、Seong Ho Ji、Park Sang Hak、Jihyun Park，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谢谢周柳建成和我一起为我的同胞哭泣。你的鼓励在我低潮时曾是支持我的所有力量，没有你的支持和信任，我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Joshua Bedell：你的善良和宽容无边无际，感谢你用无比的耐心教导我、指引我。

谢谢我的英国接待家庭Charlotte、Adam、Clemency、Madison、Lucien Calkin，还有我的好朋友Jai J. Smith。也要谢谢Bill Campbell和我在蒙大拿州的接待家庭。

还有我的好朋友Alexander Lloyd、Cameron Colby Thomson、Daniel Pincus、Jonathan Cain、Daniel Barcay、Gayle Karen Young、Sam Potolicchio、Dylan Kaplan、Sam Corcos、Parker Liautaud、Axel Halvorssen、Uri Lopatin、Peter Prosol、Masih Alinejad、Tommy Sungmin Choi、Matthew Jun Suk Ha、Wolf von Laer、Ola Ahlvarsson、Ken Schoolland、Jennifer Victoria Fong Chearvanont、Malibongwe Xaba、Li Schoolland。

谢谢青年领袖峰会的Kate Robertson、David Johns、Ella Robertson、Melanie York、Mathew Belshaw，以及所有的青年领袖代表，我很荣幸能成为这个杰出社群的一员。你们对朝鲜人民的支持和关怀，给我莫大的希望和力量挺身反抗世界上的霸权。你们的努力每天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世界妇女高峰会的Tina Brown、Karen Compton，还有会上激励我拿出勇气为正义、自由和平等而战的所有女性。

感谢周末复兴会（Renaissance Weekend）的Philip Lader、Linda LeSourd Lader、Dustin Farivar、Eric O'Neill、Christine Mikolajuk、Kerry Halferty Hardy、Frank Kilpatrick、Linda Hendricks Kilpatrick、Yan Wang、Justin Dski、Ben Nelson、Mark A. Herschberg、Katherine Khor、Stephanie A. Yoshida、Janice S. Lintz。

感谢《现在去见你》（*Now on My Way to Meet You*）的制作团队，以及我在东国大学的教授，以及警察行政学系所有在我遇到困难时帮助我、鼓励我的朋友。感谢指导朝鲜难民的所有老师和志工。

特别感谢Judd Weiss、Suleiman Bakhit、Todd Huffman、Katy Pelton、巴纳德学院校长Debra Spar、学务长Jennifer G. Fondiller、Sue Mi Terry、David Hawk、Greg Scarlatiou、Curtis Castrapel、Beowulf Sheehan、Esther Choi和她的可爱家人、Christian Thurston、Daniel Moroz、Cat Cleveland、Eunkoo Lee、Ryung Suh、Justice Suh、Madison Suh、Diane Rhim、Joshua Stanton、Sunhee Kim、Jieun Baek、Felicity Sachiko、艾拉厨房的Paul Lindley、Google Idea的CJ Adams、Austin Wright、John Fund、Mary Kissel、米诺瓦大学的Michael Lai。

有些人我基于隐私和安全的考量更改了他们的名字，包括我亲爱的好姐妹莹子，感谢她。也要谢谢中国的传教团、南韩的牧师，以及名字无法出现在这本书上、但烙印在我心中的人。

给我母亲边谦淑：当你的小孩是我最大的福气和荣幸。没有你的爱和牺牲，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们一起跨过了冰冷的河流和冻结的沙漠，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无需言语表达。无论是我被绑架时或获得自由之后，你都是我活下去的动力。是你鼓励我、给我力量，让我继续为改变祖国而努力。

给我的姐姐恩美：你是我的一切，也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奇迹和喜悦。感谢你宽大的心胸，还有小时候为我做的牺牲，在我们相依为命的那几个月保护我、安慰我。你就像我的小妈妈和最好的朋友。姐姐，谢谢你经过漫长的七年岁月再度回到我们身边，带给我们快乐，我以你为荣。你是我的明灯，我爱你胜过生命！

给我父亲朴津识：你是我的英雄，我好希望你在这里，跟我一起享受自由。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所以只要对你说“我爱你”、“我好想你”，这样就已足够。

给我母亲的伴侣Woo Yang Mang和我姐姐的男友Lee Hong-Ki：谢谢你们为我们家带来幸福。

给还在朝鲜的亲朋好友：拖累你们我非常内疚，只希望有一天你们会了解我说出真相的原因。我保证我会努力不懈，尽我的力量打击你们日复一日承受的不公不义，但愿有一天，我能以自由之身回到家乡，再次见到大家。

给世界各地透过社交媒体为我加油的朋友：我无法在有限的篇幅里一一感谢你们，但我的感谢胜过千言万语。因为你们的每个笑容、每个手势、跟我一起流的每一滴眼泪，我才有勇气分享过去从没想过要说出口的遭遇。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当我对人性失去信心的时候，幸好有你们听到了我的声音。因为你们在乎，我们才有办法一起开始为这世界带来改变。

# Table of Contents

推荐序一：在黑暗的隧道里看到微光 / 阿泼

推荐文二：里头的每颗字砖，都入过荒境，也得过侥幸 / 吴晓乐

前言

## 第一部 朝鲜

1 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

2 危险的历史

3 燕配燕，雀配雀

4 斑斑血泪

5 敬爱的领袖

6 梦中的城市

7 最漆黑的夜晚

8 朝鲜之歌

9 黑市世代

10 中国的灯火

11 姐姐失踪

## 第二部 中国

12 黑暗的彼岸

13 与魔鬼交易

14 生日礼物

15 骨灰

16 绑架

17 天上掉下来的面包

18 跟随星星的指引

## 第三部 南韩

19 自由之鸟

20 美梦与噩梦

21 求知若渴

22 上电视

23 奇异恩典

24 回家

志谢